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之鑫　朱　民
李　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　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　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　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月刊）

刊名题字　曾培炎

全球化 2017 年第 7 期（总第 72 期）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题·

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　刘奇葆（005）

汇集智慧　凝聚共识　共建智力丝绸之路　曾培炎（008）

“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　郑必坚（010）

对“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充满期待　亨利·保尔森（012）

赞美“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萨尔塔吉·阿齐兹（014）

从三个角度看“一带一路”　陆克文（016）

推动“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互联互通　伊日·帕鲁贝克（018）

·本刊专论·

“一带一路”创造经济全球化共赢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020）

“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战略　郑永年（039）

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李晓西　林永生（055）

·国际经济·

美国在互联网产业的布局与政策趋势　李　丽　李勇坚（067）

融资支撑助力国际产能合作的对策研究　张继栋（079）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宏观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及改革趋向　刘向东（091）

·产业经济·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有效性研究　卢欣生　李晓彤　张文强（107）

·名人观察·

“一带一路”为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张国庆（116）

·权威观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0）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6）

Maiook 麦格网
电子阅读　扫一扫

CONTENTS

Creatingthe "intellectual Silk Road" hand in hand *Liu Qibao* (005)
Collecting wisdom, pooling consensus and jointly buildingthe intellectual Silk Road *Zeng Peiyan* (008)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Zheng Bijian* (010)
Looking forward to the huge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012)
Praising the spiri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014)
Looking 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ree angles *Lu Kewen* (016)
To promote the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018)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reates a win-win new real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sk group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enter* (020)
"Two legs and one lap": Xi Jinping's new strategy for great powers *Zheng Yongnian* (039)
To memorize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Li Xiaoxi and Lin Yongsheng* (055)
The layout and policy trends of the US Internet industry *Li Li and Li Yongjian* (067)
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ing support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Zhang Jidong* (079)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and the judgment of reformtrend and direction *Liu Xiangdong* (091)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Lu Xinsheng, Li Xiaotong and Zhang Wenqiang* (107)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Chinese solu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Zhang Guoqing* (116)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

刘奇葆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深刻阐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全面总结了过去四年“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明确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擘画了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美好蓝图。

一、智库有人类“思想工厂”的美誉，“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全球智库的积极参与“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是此次智库交流的主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很多智库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形成了许多共识。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建设“一带一路”，出发点立足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的成功，在于秉持合作共赢

---

*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由中宣部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办的“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邀请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智库负责人、前政要和专家学者约 200 人共聚一堂，分享观点，交流看法，共襄“一带一路”建设盛举。本期刊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上刘奇葆的主旨演讲和曾培炎等六位中外嘉宾的演讲。

的理念，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和现实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能够把各方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合作共赢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没有谁大谁小，也没有谁先谁后，有的只是平等和自愿。我们坚信，世界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

建设“一带一路”，推动力来自市场机制。“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早期收获。在市场化的框架下，有关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金融、产业投资等领域合作扎实推进，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一批旗舰项目、示范项目先后落地，中欧班列搭建起“新亚欧大陆桥”。“一带一路”是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合作体，遵循的是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各类投资兴业的企业是舞台的主角，只有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带一路”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建设“一带一路”，生命力在于包容普惠。“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彼此尊重、求同存异、相互提携，共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这正是“一带一路”影响越来越大、参与越来越广的原因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打造均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努力扩大就业，促进收入平衡，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凝聚共识，为“一带一路”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提供智力支持。

把“一带一路”建设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愿景下来思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契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为中国梦与世界梦架起互联互通的桥梁。“一带一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丝路精神结合起来，深化研究、阐发内涵，使其成为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指引，成为我们凝心聚力、携手合作的定海神针。

把“一带一路”建设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来谋划。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持续，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波浪涌动，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开放共享，致力于政策、道路、规则的互联互通，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各国发展结合起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启新型全球化进程，推动

经济全球化创新发展。建议智库就此开展深入研究，提出有效对策思路、方法路径，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践，助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把“一带一路”建设放在国际关系演进的大格局中来研究。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性变革之中，国际秩序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一带一路”创造机遇、促进发展、通向共赢，必将有力促进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智库可以加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准确阐发，使“一带一路”的理性声音始终占据舆论主流，助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把“一带一路”建设放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野里来把握。建设“一带一路”，就要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成为增进各国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的价值追求，也给我们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了智慧滋养。同时，我们也愿意学习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我们建议，智库学者把研究“一带一路”与研究中外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世界各国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一带一路”前景广阔，聚智聚力的任务仍然艰巨。衷心期待以这一平行主题会议为平台，坦诚对话、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在切磋交流中共同培育智慧之树、共同分享智慧之果、共同建设“智力丝绸之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汇集智慧　凝聚共识
共建智力丝绸之路

曾培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放眼世界，高屋建瓴，纵贯历史，继往开来，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愿景。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当今时代，智库已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重大决策与国际事务中都显示出智库的智慧和力量。为此，论坛特别设立智库平行主题会议。思想是智库的灵魂，智慧是智库的产品。希望聆听大家的真知灼见，从中找到契合点，将我们的闪光思想汇聚成一条“智力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增添亮色。我就智库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谈几点体会，与大家讨论。

第一，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的内在发展规律。古丝绸之路在亚欧大陆上交汇，曾经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贸易的繁荣和东西文明的交流。在科技创新、通信物流发达的今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将亚欧大陆串联起来，为地区和全球可持续增长开辟了新空间。这是历史的总结延续、现实发展的客观必然，顺应了当今各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举。三年多来，“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了相关国家经济文化的交融发展，得到了广泛支持，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智库可以用全球视野，依照各国的国情，在纷繁复杂的世象中，以深邃的洞察力，解读分析历史大势，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内在的发展动力和规律，不断丰富其内涵和理念。这对于凝聚共识，汇集各方力量，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探索提炼“一带一路”合作治理新模式。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建立的全球治理模式，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及各国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时至今日，全球化进程所遇到的问题表明，现行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明显滞后。针对全球化中效益效率与公平包容的矛盾问题，“一带一路”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原则、新理念，开始为大家所认知和赞同。在践行这些原则理念的过程中，智库可以扮演探路者的角色，将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措施、合作模式、共赢发展等成功案例，分析总结，提炼经验，并将行之有效的做法积极加以推介。这些经验模式，也将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努力为“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一带一路”途经的广大地带历史悠久，地域广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东端连接着经济活跃的东亚地区，西端连接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地区。如何将东西两端的资金、技术优势与沿线国家的资源、人口优势结合起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将经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能，使发展成果惠及各国民众。这是一篇宏篇巨著。智库可以集众智、汇众力，共同搭建合作新平台，探索发展新路径，开辟增长新动力，助推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

第四，发挥“一带一路”的“第二轨道”作用。智库的专业性和独特性，使其在社会有广泛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发展阶段不同，利益诉求多元，矛盾问题也复杂交错。政府间、企业间的合作需要外部的助力。智库可以发挥“第二轨道”的作用，搭建起智慧与政策的桥梁。为政府决策、经贸合作等提供智力支撑，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对接，沟通情况信息，协调有关分歧，合理引导社会舆论。这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二轨”作用，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今天的会议五色交辉，八音合奏，是各国智者和思想家的盛会，搭建起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在座的各国著名智库，都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愿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中方智库，愿意与各位同行加深合作互动，使智库优质的思想产品成为“一带一路”不竭的智力源泉。相信大家的智慧光芒，将使这条“多彩丝绸”更加熠熠生辉！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

郑必坚

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恰逢其时。恰逢一股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旗号的反全球化潮流在一些发达国家泛起之时；又恰逢世界各国关注经济全球化走向，热议经济全球化命运之时。因此，我愿意在这里谈三点看法。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 40 年发展，正呼唤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有关经济全球化的争论，不自今日始。而当前之所以格外引起广泛关注，显然是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讨论有关。发端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至今 40 年。40 年经济全球化，40 年经济大发展；40 年经济全球化，40 年问题大积累。这就叫做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事情就是这样：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确实带有明显的缺陷，经济虚拟化为投机经济打开了宽敞通道，产业空心化造成国内就业困难，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促使民粹主义急剧上升，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暴露，以至爆发出来，而且影响及于全世界。

如何应对？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找出路；另一条路线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之下，通过社会生产力包括存量和创新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合理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系统改革，以“三通过”，推进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前一条路线，退回到经济全球化出发前的原点，显然不是出路。后一条路线，积极面对并妥善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打开新局面，才是正确的抉择。

总之，面对转折点的形势，要求我们大家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第二，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带来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共同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将以新的动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条件。“一带一路”提出不到四年，已经获得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盛况由何而来？考察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变动的总图景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一轮经济全球

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新现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7 年到 2018 年全球经济将有望实现 3.6%的年均增速，比过去两年 3.2%的增速稍有进步，这显然是利好消息。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的结构，又可以发现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要快于发达经济体，可能达到 4.6%，是发达经济体 2%的增速的两倍以上。再联系这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历史对比，就更加发人深省。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1980 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之比是 64∶36，2007 年是 50：50，预计到 2018 年将倒过来，变为 41∶59。是否可以说，这就意味着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将可能在 21 世纪第二个、第三个以至第四个 10 年，在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的进程中，进一步集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大发展和发达经济体再发展，从而打开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

总之，“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通过长周期、大变动、新动能，以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要求。

第三，“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根本历史特点，是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正在由海洋经济全球化大步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一轮又一轮，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基本上都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现在则不一样，内陆经济将在打开“一带一路”的奋斗当中，以巨大体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个主体。“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现代网络金融产品等等新老工具，建设物流大通道、资本大通道、科技大通道、文化大通道，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全面带动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跃升，和欧亚大陆从东到西以至联通非、美大陆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经济全球化阶段的最大历史性特点可能就在这里。

“一带一路”提出之初，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转移过剩产能，有人说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还有人甚至说是新殖民主义，还有说排除欧美。凡此种种，都是以“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看问题，而没有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本质是“合作”，是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合作共建”战略构想。当然，我们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这件大事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应当确立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由此而决定了我们要合作，而且一定要长期合作。

总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强劲动力和重要标志。

（作者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对“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充满期待

亨利·保尔森

首先感谢我的老朋友曾培炎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论坛。我和曾理事长的合作已经超过五年，我们两家机构——国经中心、保尔森基金会，首先建立了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伙伴关系，然后通过两个机构合作开展的项目应对公共领域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正确推进城镇化。或者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在不损坏环境、不破坏环境功能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更宜居？这个问题等于在很大程度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也正是中国在 2013 年提出的宏伟的“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心。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过去 25 年来的一系列互联互通的倡议相契合，正是这些互联互通倡议改变着亚洲的面貌，但“一带一路”不止于此，它将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进行了系统化提炼，极大促进了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我多年从事投行工作、身为高级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经验来说，我认为无论从哪里开发项目都颇为不易，回报也往往不如人意。事实上，各个国家和各个项目的条件风险和经济现状各有不同，所以“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项目也不能用单一的概况性标准来衡量，而是要根据项目对相关国家的发展、增长、就业和未来机遇的贡献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巴基斯坦的发电项目与亚洲的道路项目就不能放在一起来衡量。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基础设施开发做出的新的重要承诺，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此前同类大型项目所遇到过的挑战。

在我看来，促进互联互通这个目标尤其值得重视，我很赞赏中国将这一点提到更高地位上的做法。“一带一路”为长久以来对经济互通和融合的争论带来了新生，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和印度响应中国的倡议，着手促进互联互通，提出本国的基础设施开发倡议，对此我毫不意外，我也对日本和印度的类似倡议表示支持。很显然，所有这些各具特色的倡议都具备促进繁荣和扩大机遇的潜力，尤其是亚洲，从历史上来看，亚洲曾是一个高度融合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洲再度走向经济互联，与亚洲在走入现代之前的

历史是一致的。想一想，亚洲在上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里是欧美市场的进口地，但如今亚洲本地贸易已经占到亚洲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一带一路”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流动，促进中资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投资，进一步推动这一格局的改变。

面对如此巨大的变革，世界各国无疑都将密切注视“一带一路”的一举一动。我认为中国应该欢迎这种密切审视的目光，并且这为中国以最高的建筑标准、环保标准和财务透明度标准规划全球一流的项目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证明自己能否以及如何发挥全球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提出的双边倡议，与我在前面提到的世行倡议和新创建的亚投行倡导的多边协议有所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提出和推动的倡议都会受到外部机构的严格审视，不仅要考察项目的意图，最终也要考察项目和采购制度。我在高盛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件好事，这不单单针对中国，所有的倡议无论是单边还是多边，出资方提出的，包括采购等在内，都要公平透明。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对外部参与方越公开透明，全球各地的公司和供应商，甚至美国的公司和供应商越会积极参与。

我知道美国也是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之一，美国支持“一带一路”的资本都具有参与的实力，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贡献，所以我希望美国的公司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当中保持开放心态，寻求参与的机会。同样，我也大力提倡中国能将“一带一路”向全球开放。习近平主席通过“一带一路”系统化推进中国的各项提议迈出了重要一步。我很赞成，这些做法不但可以促进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我很高兴能够来北京参加这次盛会，我对“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充满期待，我希望借此机会加深了解，与此同时，我也会和大家一样关注项目发展和规定。

我支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更多的对话和讨论，这也是我愿意和其他智库一起参与讨论的原因之一，智库是开展客观性分析和独立研究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应予以鼓励，中国也不例外。本次高峰论坛就是一次极好的阐释，说明严肃认真、坦诚公开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高兴能够与各位一起参加这次论坛，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对“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了解。

（作者为美国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赞美“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萨尔塔吉·阿齐兹

“一带一路”理念是当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性倡议。通过聚焦道路、铁路、海陆、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政策金融贸易的互通，我们观察到很多史无前例的现象，这一倡议是世界人民共同希望实现共同繁荣和共赢合作的先兆。从发展的意义来说，这一倡议的真正影响将体现在思想、理念和文化领域，而智库正是这些要素的富裕之地，因此，智库对话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重要的组成部分。

巴基斯坦赞美“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正如大家早上听到的共同伙伴关系的概念和自愿基础上的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中国已经构建了必要的合作机制，传播其知识、技术和金融资源，使之成为现实。本次论坛参与国要为推进这一倡议发挥作用，使“一带一路”的真正潜力变为现实。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有幸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个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正取得良好的进展，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实现联通，同时，几个发电和配电项目也已启动。瓜达尔港口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基石，数个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巴经济合作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工业合作和工业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正在向中巴经济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技术和其他支持。天然气和石油终端设施将在巴基斯坦各地分配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将输送能源到中国西部地区。通过互联互通这个重要的旗舰项目，不仅将加强国家、而且是区域性的发展。

第二，当我们在实施这些项目时，学术界学者专家和智库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信息交流、相互学习和联合研究，实现理念互通，将有益于分享经验和教训。刚才曾理事长已经指出了很多我们可以用来探讨的一些领域，巴基斯坦愿意和各国智库分享经验。这本身就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而巴基斯坦的智库已经与中国的同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将有助于实现双方对愿景的共同理解和聚焦两国人民的互补性，而且远远超过金钱的重要性。当然，巴基斯坦非常愿意和智库分享经验，我们现在已经和中国同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关注两国人民的互补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智库需要共同利用智力资源，

通过集体智慧，我们可以探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因素，聚焦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首先，古丝绸之路的复兴始终是数十亿欧亚大陆人民的激情梦想，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这一梦想成真的愿景，这一再现和重振民族联系纽带的理想追求具有坚实的历史和文明基础，智库需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和文明联系，并连接今天的现实。无论是在技术上、金融上，还是在文化上。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当我们目睹全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在这个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地缘政治、反全球化情绪，以及对于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的保护主义壁垒、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做出反击。

第三，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由东方推动亚洲价值观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但是这种多赢的合作，旨在东西方的和谐发展。现在这个全球化不仅仅是金融或者是金钱意义上的全球化，是由亚洲的价值观来引导的，智库可以确认的东西方共同的合作目标和优先事项。但是东西方都应该通过这样的合作来实施和谐的发展，并不是说这意味着全球化的一个终结。所以，我想智库可以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优先事项。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非常广泛的机会，这也是智库要完成的任务。全方位探索各种可能性是智库必须履行的义务，无论是贸易、金融、基础设施还是技术，各方面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因为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和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国与参与国发展政策和优先事项自然会有所不同。所以，智库可以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举措如何与各国发展协调一致。

最后，智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议程保持密切关注，这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在倡议中的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举措，在根据实际经验确保其基本原则的连续性，以及确保其积极影响方面智库将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民心相通可以提供跨文化联系的机会，增进对彼此关心的事项、核心利益敏感问题的理解，然后找出我们的共同点。在具体方向来说，我建议举办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智库的年度会议，这样的聚会为学术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实践者摆脱日常工作，构思集体智慧，提供一个良机。因此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全球专家库，这些专家可以帮我们全面发掘“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

总之，在当今密切联系的世界，我们的聚焦点还是给我们后代留下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多赢合作的世界，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为奠定这样一种人类遗产的基础所做出的努力表示祝贺。

（作者为巴基斯坦总理外交事务顾问）

从三个角度看“一带一路”

陆克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看见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我从三个角度谈谈“一带一路”：历史的角度、现在的角度和未来的角度。

第一，历史的角度。今天习近平先生谈到了“一带一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说得对，很有道理的。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百分之百同意他所说的话。中国上下五千年，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文明。比方讲，我们记得 1793 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回信，他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是有不少例外，比如连接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古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首要目的在通商，也有文化的交流，例如佛教和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来马可波罗也从这里来，两个世纪后郑和下西洋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末的时候，李马东（音）住在中国继续东西方交流。到了清朝后期情况变化了，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再后来日本也侵略了中国，实在来讲，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中国与世界互动最好的时候是中国主动开放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是外敌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认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主动对外开放，促进不同国家与文明的融合，如果实施得当，“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东西方交融合作的新桥梁。

第二，现代的角度。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比较紧张，可是我们应该认识到 1945 年以前的 1/4 个世纪里，世界大战爆发了三次；但是过去的 1/4 世纪里，没有世界大战爆发。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设计了一整套国际规则和系统，禁止侵略他国，结束西方残酷的殖民主义，促进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以法律途径和平解决领土纠纷，以贸易规则来避免贸易战，维持金融稳定，保护知识产权，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也成立全球治理系统，包括联合国系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还有许多国际开发银行，实在来讲这些大部分都是西方主导的，肯定不算是理想的，但是还可以。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现行国际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建设者，也是贡献者，这都是好事。2016 年 11 月，“一

带一路”倡议选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 年 3 月，安理会第 2344 号决议也谈到了“一带一路”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这都是好的发展趋势，也都是东西方一起贡献世界秩序的积极信号。有时候我担心，我们忘记建立世界秩序的困难，也很担心我们会忘记世界秩序，有许多脆弱，如果单边军事行动、国家保护主义突然爆发，世界会很快陷入混乱。

第三，未来的角度。实在讲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我保持乐观，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要悲观那非常容易，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好些问题越来越紧迫，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在兴起，还有对于气候变化的否认，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抵制这些蔓延。所以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在达沃斯的讲话印象很深刻。习近平支持全球化，他支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他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这都是好事，全世界都会关注中国在这三方面的作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一带一路”的未来我们很乐观。“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欧亚大陆和全世界都有很多积极意义，“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经常来往、互相合作和学习的新路。在此基础上，更高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也可能展开，在亚太地区我本人一直呼吁建立亚太共同体，为美、中、俄、印和其他地区国家建立长期共同安全、概念、系统等等。在更大的范围里，“一带一路”也为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基础，实在来讲我们不应该让战略思维对立，很多时候我们互为补充。中国的传统哲学，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孙子兵法》，看到了《武经七书》，看到了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也看到了天下大同，一阴一阳不矛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在国际现行秩序里发展“一带一路”、多边机制化。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也有高标准的期待，环境保护的高标准、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劳工保护的高标准，还有共商共建共享的高标准，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才能是变革性的结论。

我今天从三个角度看“一带一路”，一个是历史的角度，我看到古丝绸之路带来通商和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冲突和战争。第二个是现代的角度，我看到“一带一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应该不断促进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第三个是未来的角度，我看到“一带一路”的成功可以帮助数十亿人脱贫，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可以创造全球合作的可能，这些都需要很高的智慧，中国的智慧，西方的智慧，全世界的智慧，这也需要我们互相理解消除误会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新一代的世界公民，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为东西方的互利共生找到中庸之道。

（作者为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推动“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互联互通

伊日·帕鲁贝克

过去 10 年中国一直成功地坚持了发展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即使是现在中国的增长率企稳在 7%以下，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高速的增长了。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和财富发生了很大的增长，得益于全球新的强国的崛起，在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西方国家和日本占到全球财富的 75%，现在不到 50%，而且他们的比重还在不断地下降。现在中国及其所在的地区到 2030 年会达到 G7 国家的水平。西方参与比如说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冲突，比如说还有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导致了很多的移民涌入欧洲，他们来自亚洲和非洲，现在欧洲正在经历移民危机的阵痛，利比亚的解体，尤其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冲突，也导致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这会影响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疲弱，移民危机还有军事干预的失败，还有恐怖主义袭击，都在西方发生，但是中国尤其专注于实施开发自己的经济。美国和欧盟每年都投入 8000 亿美元用于发展军事，但是中国在投资方面大概是 1500 亿美元。坦率来说，投资军火很多钱都是打了水漂的，但是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保持在非常合理的水平，所以这些开支有时候被说的言过其实了。如果西方能够把同样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发展，那么很多西方国家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比如说给大家提供饮用水、建立必要的公路和铁路、帮助发展中国家等等。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中国为现有的国际秩序提供了非常好的积极意见，能够和西方更好的合作，尤其是美国。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影响，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目前并不是特别的大，与中国的经济是不相称的，现在已经表明西方也愿意改变这样的情况。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也不是按西方意义上的联盟，各个参与国，包括中国，都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态度，而不是霸权。金砖国家希望能够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建立一种规则，新的规则，这在金砖国家发展银行成立的过程中体现的是最清楚的，所有的成员国，他们在金砖银行的影响力是同等的，而且在金砖银行的最高管理机构里面，包括所有成员国家的官员。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如今亚投行已经成为了西方金融机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替代，目前的贷款已经达到了 1000 亿美元，中

国是最大的股东，之后是印度、俄罗斯和韩国。所以中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能够坚持各个国家之间的平等，而且中国已经展现了在全球提供资金的卓越能力。

目前为止，亚投行已经提供了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中欧、东欧，以及巴基斯坦。让亚投行特别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有很多欧盟成员国，最大的成员国加入了亚投行，包括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与此同时，像美国还有澳大利亚，以及韩国这些国家，现在都表示要加入亚投行。所以新丝路的建设是由中国的国家主席在 2013 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那它北端是从中国通过哈萨克斯坦、波兰到西欧，南线是通过中国、伊拉克、土耳其等等。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从中国的海岸出发，经过印度尼西亚，然后经过新加坡，还有其他南亚国家，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希腊，目前是 400 亿的资金。未来这个投资的规模可以达到 1 万亿美元，这些项目的目标都非常的宏大。中国希望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希望在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能够从海上丝绸之路中收益很多，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一些其他中亚的国家也能够从中受益，而且“一带一路”可以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的联系，可以使得亚洲的其他国家享受到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利益。而且现在人民币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国际重要的货币，从中国的边境到中亚，到俄罗斯，还有其他地区，非洲的东部都将获得更多的投资，会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强劲，而且经济更加的有效率，会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中产阶级的崛起。通常中产阶级的崛起能够使得国家的经济更加的稳定。到 2050 年，我相信在中产阶级的这个人群将达到 30 亿人，那么这是增加人们购买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可以为增长带来更多的动力，包括促进货物和服务的贸易。

因此，对整个“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和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的强劲，可以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也能够推动国际的合作，可以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紧张的气氛，而且它能够在全世界很大的一片地区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一带一路”的项目可以使得亚洲和欧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强劲，还可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凡是对合作感兴趣的国家，而且愿意勤劳工作的人们，都能从合作当中受益。

（作者为捷克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

责任编辑：沈家文

·本刊专论·

“一带一路”创造经济全球化共赢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

摘要：“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是推动建立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且精彩的实践。通过打造更加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将创建全球贸易大通道和核心枢纽，创造巨量投资需求，贡献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并推动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一带一路”重心要从形成共识转移到实施落地上来，推进沿线各国在战略与规划对接、推动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沿线贸易体系、加强智库交流合作等方面通力合作，收获早期成果。

关键词：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　区域发展　全球治理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四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逐步对接，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产能合作、各类园区和重大项目合作快速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沿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执笔人：陈文玲、徐占忱、张茉楠、颜少君、梅冠群。

线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程度不断加深。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上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系统回顾了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史，总结了“一带一路”四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概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指引。

“一带一路”推进 4 年来，切实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新理念，主动与沿线国家进行开放式合作，主动寻找和放大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群体的重叠认识和重叠价值，以共同认知、共同理念和共同行动创造了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和物质财富，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国家人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模式、树立了新标杆。“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共同携手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有利于塑造一套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和新规则，创造经济全球化共赢发展的新境界。

一、“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样性文化，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一带一路”成为在新全球化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超越血缘、家庭、社群、民族和国家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追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集成和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千万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框框内。”“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地融入了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五个方面。

利益共生意味着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在利益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共损共荣特点，其共同利益体现为利益各方的“正比相关”，即他者的利益事实上成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尽管命运共同体中每一成员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成员的利益更多地具有互补和互利的意义。“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利益，不仅保证了个别成员利益的

实现，而且成为每一个成员利益发展的源泉。“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利益同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联结起来，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同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结合起来。“一带一路”的方向就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一个利益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情感共鸣是共同体成员之间自然产生的心理认同。情感共鸣表明“一带一路”既具有地缘关系中特有的某些天然情感要素，同样需要后天的情感沟通和提升。2000 多年古丝绸之路下的文明交往，近百年来为自身独立和发展的抗争，新时期追求自身发展的不懈努力，都会使各国找到共同的情感共鸣点。中国强调“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当然这并意味着不是邻居就不能成为情感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多创始成员国不是中国的邻居，但“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价值共识是命运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是各国最基本价值共识的出发点，由此扩展开来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共同反对那种为了个体利益损害共同体利益的利己主义行为。命运共同体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但各方能够本着求同存异、包容互谅、沟通对话、平等交往的原则来化解矛盾。“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消除疑虑和隔阂，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完全可以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来源。

责任共担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和运行的伦理保障。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发展让“地球村”越来越小，今天任何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都不应脱离人的自我责任和对同伴的责任，不应脱离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责任共担要求命运共同体建立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和伙伴关系，而不存在支配和贬低。“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应该是命运共同体维护者和促进者，这里不能有“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是“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发展共赢是命运共同体内生的共同目标，命运共同体中的发展是福及全体、惠泽各方的，摒弃了“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旧思维，强调“双赢、多赢、共赢”，“一带一路”说明世界应是共谋发展的“大舞台”。那些总怕别人发展会损害自己利益，总担心别人崛起会导致自己大权旁落，动辄对别国发展实施遏制、围堵和孤立的冷战思维和做法，与今天全球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沿线各国需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增长“稳定器”和“推进器”，“一带一路”建设为实现共同发

展、共享发展创造了新空间，是中国倡议、各国愿望与世界期盼的“和鸣”。“一带一路”正成为新全球化形势下各国追寻历史脉络和文化基因，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培养基”，成为推动实现各国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模板。“一带一路”将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圆梦路”。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憧憬与愿景

当前，全球增长、贸易与投资格局酝酿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各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新的国际合作思路与范式，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共同愿景，不仅有利于沿线各国贸易投资，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区域之间板块的东西贯连，实现亚欧共通，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愿望，为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积聚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动能，创造跨越太平洋和跨越大西洋的财富流动，以及构建更加开放、自由、包容的全球贸易新体制和新型全球治理框架做出创新性贡献。

（一）“一带一路”建成后的前景展望及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贯通亚欧非大陆，既连接欧洲等发达国家，也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等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一带一路”是多赢、共赢、开放、多元的合作，旨在盘活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将有望形成全球互联经济体和新型贸易网络，有望建立全球经济新循环。为此，我们做了两个情景的预测：一是现有“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预测；二是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展前景预测。

第一，未来 10 年有望贡献全球 60%的经济增长。从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市场和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源和劳动力短缺，提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收入，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为各国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创造了新的需求。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 4.7%，显著高于全球 2.8%的年均增速，GDP 总量将由目前的 23 万亿美元增加至近 40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由目前的 31.1%提升至 38.2%；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的进一步拓展，未来 10 年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区域 GDP 总量将达到 62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

的 60.4%。此外，随着人口规模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65 国将创造 1.35 亿个就业岗位，占全球新增就业的 45%；如果含欧盟成员国则占全球新增就业的 46%。

第二，未来 10 年将创造近 250 万亿美元投资总需求。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 10%～15%的基础设施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能大规模进入发达国家以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一带一路”顺利实施，关键之一在于创造全新的、风险可控且可操作的投融资方式，使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产生较强的“外溢效应”。按照模型测算，未来 10 年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加速期，用于基础设施升级、数字技术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公共安全与医疗、气候变化与生态监测、跨区域或洲际通道建设的投资将大大拉动区域投资增长，良好的基础设施系统会大大提高各国分享繁荣和提高效率的能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预计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65 国累计资本形成总额将达到 110 万亿美元，到 2027 年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 50%；若包括欧盟成员国则累计形成资本总额接近 150 万亿美元，到 2027 年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 65.3%，如果进一步按各国资本存量和折旧率估算，未来 10 年大约将创造 250 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需求。

第三，有望成为全球新的贸易大通道与核心枢纽。目前，中国已是近 130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一带一路”将充分激发中国以及西亚、中亚、东南亚、北非、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体量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全面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在促进互联互通，降低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加速资源要素流动，以及双向贸易循环影响下，根据模型测算（不含欧盟成员国情形），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速将达到 5%左右，到 2027 将达到 20 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好的贸易合作基础。2015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接近 1 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 1/4。未来 10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将实现较快增长，到 2027 年将达到 1.7 万亿美元左右；根据模型测算（含欧盟成员国情形），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将实现较快增长，到 2027 年将达到 35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将实现较快增长，到 2027 年将达到 2.5 万亿美元，亚欧经贸深度融合将形成全球新的贸易通道和贸易枢纽。

第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支撑点。“一带一路”愿景让发展红利惠及包括贫困国家，为共享全球化红利提供机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 GDP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6.4%，其中有 27 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不足 2000 美元，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8.3%，面临严峻的扶贫减贫任务。同时，由于人口、土地、资

源等要素并未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远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未来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可观。“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有高度契合之处，将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17 项大类和 169 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联合国语）。特别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与农、林、牧、渔方面的合作联系十分密切，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粮食安全，缩小发展差异，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而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社会环境的投资指南、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倡议等，将为建造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2016 年 11 月 17 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第 A/71/9 号决议，将“一带一路”上升为联合国推动的重要战略，成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发展共同体的全球新倡议。

（二）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扩大和深化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单枪匹马不如并肩作战。“一带一路”从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强烈意愿出发，将全面对接东盟、欧亚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欧盟、非盟与阿盟等六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生产与消费两大市场，将有助于推动新模式下区域乃至全球化繁荣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第一，“一带一路”有望形成开放市场伙伴关系。目前，中国是大多数“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将中国优势产能、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与第三国发展需求相结合，通过扩大开放形成连贯统一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等，将能够在“一带一路”区域容纳更大规模的分工并促进专业化水平，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第二，“一带一路”有望形成创新伙伴关系。当前，全球创新资源过度集中，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全球创新红利。如何促进创新融资和创新科技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流动，把创新作为“一带一路”新动力，关系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和可否形成核心竞争力。根据相关预测，未来 10 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更多的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通过双向产业转移实现技术链接、资本链接和产业链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16＋1 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区域科技创新伙伴关系提质升级，将

成为全球创新驱动的新兴力量和新崛起的全球区域创新中心。基于现实和长远的共同利益构建双边、多边创新伙伴关系，开展多层面、多维度全球创新合作，推动全球创新环境的平等与利益共享。

（三）逐步构建“五位一体”的新型“全球互联经济体”

未来世界正步入互联互通全球网络体系。根本而言，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现在全球 40%以上的 GDP 创造都来自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一国或区域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更取决于国际互联的程度，互联互通程度越高，增长动力和跨境要素流动性就越强。“一带一路”作为跨区域联通，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规章融合等多个领域，有助于硬件基础和软性制度安排上实现统一。将通过纵贯欧亚大陆的贸易大通道、产业大通道和物流大通道，把碎片化的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沿线国家相互贸易与投资的增加、产业转移的加速，藉此打造“商流、物流、人流、资本流、信息流”五位一体的新的全球链接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新型全球互联经济体”。

第一，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亚欧大陆两端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从黑海沿岸到中国西部地区间的广袤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单一，成为亚欧大陆的“发展洼地”。这些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经济发展。其中，亚洲的 12 个内陆国，即中亚 6 国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蒙古、老挝、尼泊尔、不丹，由于地处封闭区域、缺乏海运渠道，导致其跨国或跨区域运输成本较高。据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的研究显示，一般而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 10%，GDP 将增长 1 个百分点。另据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2021—2030 年，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东盟各国 GDP 累计增加 42.08%，东亚各国（“10＋6”）GDP 累计增加 5.87%。“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将是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开拓全球跨境基础设施市场。未来“一带一路”的空间延伸将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条经济走廊，以及包括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和关丹港、印尼雅加达港和比通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和吉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法国马赛港、德国汉堡港和不莱梅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等在内的“多国多港”主骨架，形成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协调配合，在波

罗的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等重要海域形成交汇，增强亚欧贸易通道连通能力。通过区域内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信息网无缝链接，形成“海陆空”国际多式联运网络和完全、高效、便捷、可持续的亚欧一体化互联互通体系。

第二，形成跨区域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将依托其强大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的集聚能力，成为经济全球化核心和联通新节点。据预测到 2030 年全球超过 70%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随着人口、财富和人才向全球最重要的城市聚合，一些大城市群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望形成一批超级城市和城市群落，成为资源集聚、产业集聚和市场集聚的重要载体。

第三，形成跨区域自贸区网络。面向 21 世纪的经贸合作将朝着彰显规则化、跨区域、多边化和机制化等共性特征发展，坚持非约束性、开放和自愿原则，以缔结双边、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其所形成的跨区域自贸区网络产生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一体化框架下的联动效应，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方式。践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高标准与高质量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规则，逐步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海合会自贸区、上合组织自贸区、亚太自贸区（FTAAP）等形成“新链条”，以“开放的诸边模式”探索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双边和区域内自贸区繁荣，不仅能够在新生的贸易、投资协定中灵活创新规则，而且由点及面地推动投资和贸易规则一体化的完善，形成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最终还将提升亚欧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亚欧大陆乃至亚欧非的经济整合。

第四，实现规则、规制和制度体系“软联通”。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 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 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 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 14.05%与 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视原则和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 50%，全球 GDP 预计将增长 4.7%，贸易量将增加 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报告表明，2021—2030 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 GDP 累计增加 31.19%，东亚各国 GDP 累计增加 7.76%。

（四）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

全球价值链代表先进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力，当今约 70%的全球贸易通过全球价值链展开，世界正在步入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主导下的网络体系，通过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实现资源、生产、服务和市场的链接。作为众多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重要节点、跨境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跨境物流集散中心等，不仅支持跨境产业布局调整、产业链条式转移、国际产能合作、构建新的区域生产网络，而且促进亚洲新兴市场与“欧盟 2020 创新战略”以及“德国工业 4.0 战略计划”对接，通过技术链接、产业链接和资本链接，将会形成“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促使一带一路更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升级。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代表，以智能增长和绿色增长为基本方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和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力重组，不仅促进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重构，克服因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过度依赖，也通过重新定义生产与消费关系，克服跨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分割化问题，为全球经济开辟新的增长道路，为新型全球化发展集聚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势能。

（五）率先形成面向下一代惠普贸易体系—E 国际贸易

“一带一路”有望发挥先发优势和联通优势，积极支持和推动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数字产品以及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电子认证、在线交易、信用体系、数字贸易等向下一代普惠贸易—E 国际贸易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率先实现向下一代贸易方式转型。其长远目标是从物理互联、制度互联、消费互联、产业互联等方面，构建一个以互联、开放、普惠、共享（C－O－I－S）为基础的全球普惠贸易体系。当前，伴随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加速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交叉、交融、交汇，新经济对各国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小企业将成为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到 2019 年亚太地区数字消费额有望从 2015 年的 7 万亿美元增至 17 万亿美元。目前，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 50%是跨境数字贸易，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在内的数字贸易增速更是达到了 GDP 增速将近 4 倍。随着互联互通深度展开，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将有望推广至“一带一路”地区，改善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帮助减少跨境电子商务的障碍，促进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贸易的融合，逐步形成亚欧数字大市场。

（六）有望创造全球多边融资市场

在全球金融体系内需要形成规模巨大的资产池，成为一种用于为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在内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永久资本”。亚洲及亚欧区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仅亚洲储备资产规模就约占全球储备资产的 2/3。“一带一路”通过将本地区储蓄和储备资金引导投入生产性领域及基础设施投资上来，有望创造规模庞大的融资市场。

根据亚开行公布的主要亚洲国家相关数据推测，2010—2020 年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财政预算，投资占 GDP 的比例为 5%左右。据此测算，亚洲国家每年在基建领域的财政投入约覆盖近 6000 亿美元的投资需求，每年融资需求缺口约为 1800 亿美元。而目前已经建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融资机构依然难以满足巨大的融资缺口。因此，主权财富基金、特别提款权融资、公共产品融资债券，以及公私合作（PPP）模式的联合融资方式，可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动员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将本地区的大量储蓄资金引导至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来，促进跨境相互投资，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未来“一带一路”将形成规模巨大的全球多边投融资市场体系，包括以亚投行为主的银行信贷支持体系，“一带一路”国际债券市场体系，PPP 投融资体系等。

（七）最终形成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框架

当前，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已经处于历史十字路口。“一带一路”如此大规模的跨区域合作倡议，历史上鲜有先例可以遵循，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风险分担、利益协调和规则标准的对接等各类问题也会产生，客观上需要新型治理框架的构建，着力在培育制度和规则性公共产品的能力上下功夫，双管齐下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一带一路”基于包容性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多边主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既有覆盖面广的整体性制度，也有次区域制度组织的支撑。既有约束性的硬制度，也追求坚持弹性、柔性的软制度。

“一带一路”以“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基石，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行动原则，推动建立国家之间、区域之间、跨区域之间的新型全球治理框架。“共商共建共享”植根于三大发展理念：一是以参与国诉求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需要、参与意愿及国情差异。二是以市场机制为立足点，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合力构建和维护规则透明、良性竞争、政策稳定的营商环境。三是以互惠共赢为基本点，通过提供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建立共同决策机制，互相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公平分担风险和分享利益，奠定长远发展根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将重点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机制

作用、基础设施融资制度、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风险与稳定互助等方面在内的公共产品，构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复制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重心要从形成共识转移到实施落地上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在战略对接、建设规划、行动方案编制、共建沿线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互联互通网络、完善“一带一路”建设机制、加强沿线智库合作等方面通力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进一步进展，收获一批早期重大建设成果。

（一）沿线各国共同启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尽早收获一批典型示范项目

为进一步凝聚合力，将“一带一路”建设分阶段、分步骤、有序稳步地推向前进，我们建议沿线各国共同启动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的编制工作，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对接，尽快签署一批合作备忘录，推进重大项目储备库建设，形成重大项目滚动实施机制，尽早收获一批建设成果。

第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经济合作发展有共同的诉求和期盼，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外，沿线一些国家及相关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版本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如欧盟“容克计划”、俄罗斯“欧亚联盟”、英国“北方动力”计划、印度“季风计划”、巴基斯坦“愿景 2025”、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波兰“琥珀之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沙特“2030 愿景”、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等等，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异曲同工、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未来相关国家应共同努力推动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充分对接，大家朝着一个统一的、共同商定的目标“齐步走”，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进一步凝聚合力，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发展格局，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沿线各国应共同启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编制工作。“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理有序推进，必须规划先行，沿线各国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的合作编制工作。规划编制要坚持求同存异，充分尊重沿线每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沟通协调解决意见分歧；要坚持权责明确，明确各国任务分工，重大投资建设项目要明确建设任务、建设主体、建设工

期、投资方式；要坚持有序推进，率先推进一批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和全局带动力。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沿线各国应在交通、能源、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共同制定专项规划，丰富规划层级，细化规划内容。根据“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沿线各国应共同开展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建立对“一带一路”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行动方案的动态评估机制，每隔两至三年，对上一阶段的规划执行情况、建设进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对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编和调整。

第三，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库。重大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沿线各国应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库，将涉及“一带一路”的重大交通、能源、通信、文化、民生、国际援助及国际产能合作等各领域的重大项目囊括其中，使其成为“一带一路”项目选择的主菜单。项目入库可采取提案制，沿线各国可单独提出或多国共同提出重大项目入库申请，经专业机构前期论证和科学评估后可进入项目库。库中项目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扶持项目和重点推介项目，项目库可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及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开放，政策性资金优先向入库项目倾斜。重大项目储备库将采取滚动实施机制，项目开工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逐年进行调整，并要定期对重大项目建设进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情况进行评估，对多次未通过评估的项目要从项目库中剔除。

第四，共商签署一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为进一步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应积极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围绕编制对接规划、共建重大项目、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形成文件并推动落地。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前期工作扎实的重大项目和合作议题抓紧启动实施，尽快形成一批标杆性工程和典型合作示范项目，与沿线各国、各国际组织围绕“一带一路”积极磋商合作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相关协议或备忘录，愿率先投资建设若干“一带一路”重大示范工程，为各国开路搭桥、摸索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早日开花结果。

（二）沿线各国共同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体系，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近 10 年，世界经济尚未走出阴霾，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疲软乏力。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日益激烈，封闭保守、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时有推出，这为原本脆弱的全球经济

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方，沿线各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共同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第一，加快推进沿线国家双多边自贸区建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启动了欧盟、东盟、中国—东盟、中国—瑞士、中国—新加坡、中国—巴基斯坦等一批多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于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合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中国—斯里兰卡、中国—以色列等一批自贸区谈判也正在积极推进。当前沿线各国应积极推进各类双多边自贸区建设，已签署协定并启动的双多边自贸区可结合各国国情努力打造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正在谈判的自贸区协定应积极加快谈判进程，必要时可考虑创新谈判规则，推动尽早达成关键共识和早期收获；共同开展一批新的双多边自贸区谈判，推动各国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自贸区建设；沿线各国也应积极推进同域外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如推进沿线各国与域外国家的双边自贸区建设、域内外国家共同推进 FTAAP 等。

第二，欢迎沿线各国在国内选择部分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开发特区。目前中国已在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地开展了一批自由贸易区建设试点，实际成效明显，在开放型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欢迎沿线各国结合自身国情在国内选取一些园区、开发区或专门划定一片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开发特区试点，先行先试实行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和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方式，搭建新的开放平台，各国自由贸易开发特区之间实行对等开放、制度对接，这对于各国逐步探索适合自己的开放模式、提升开放型经济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愿将自由贸易开发特区建设的试点经验向沿线国家分享，欢迎各国来到中国自由贸易区试点调研考察。

第三，沿线各国共同开展“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沿线各国应在已建成和未来将逐步建成的双多边自贸区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机制整合，探索建立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但标准更高、合作程度更紧密、沿线各国全部参与其中的“一带一路”自贸区。考虑到沿线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对高标准经济规则的接受程度不同，该自贸区可从标准规则相对较低的 1.0 版开始做起，未来逐步提高标准，升级版本，力争早日建成全球最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欢迎有意愿的域外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中来，深入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沿线各国顺应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多轮产业转移浪潮，全球制造业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转移到北美，二战后又进一步转移至东亚特别是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工厂”。随着中国发展水平提升、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中国的一些产业也正在沿“一带一路”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走出去”，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大幕正在拉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顺应这一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基于各自比较优势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

第一，构建沿线国家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产业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不相同、比较优势差异较大，当前这一差异主要以沿线国家之间的最终产品贸易形式体现，各国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总体尚未实现。各国应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各环节整合，积极承接来自沿线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推动不适应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流程向沿线其他国家转移，提高中间品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基于各自比较优势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一带一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形成共建、共赢、共享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跨境经贸合作区。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了 56 个跨境经贸合作区，合作领域涉及加工制造、资源能源、商贸物流、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跨境经贸合作区模式对于推动企业跨境投资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更多跨境经贸合作区，通过专业化园区运营，整合各类生产要素，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入区投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而以点带面、聚点成片，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

第三，沿线国家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沿线国家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不仅有助于开发国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经贸市场，也有助于帮助第三方国家提升发展水平，是一件各得其所、互利共赢的好事。“一带一路”两端的东亚和欧洲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间广大腹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愿与欧洲国家一道率先开展对中亚、南亚、中东、非洲腹地等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开发，推动中国与欧洲的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要素流向腹地地区，帮助“一带一路”腹地国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第四，沿线国家共同适应、参与、引领信息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革命。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与成熟，围绕信息这一经济要素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业态，信息要素融入传统产业彻底颠覆了一些传统经济模式，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而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共同开展对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

的系统研究，共同探索建立新经济的监管模式和引导性政策，创造新的经济规则和标准，建设“网上丝绸之路”“信息丝绸之路”“数据丝绸之路”，共同适应、参与、引领信息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革命。

（四）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实现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沿线各国应共同努力提升“一带一路”交通、金融、能源、信息、文化等领域互联互通水平，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以互联互通代替逆全球化的“孤岛经济”，塑造全球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

第一，共同打造通达互联的“一带一路”交通网络体系。交通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沿线国家应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关键通道、关键节点、重点项目和工程为抓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以内陆港建设为重点，拓展高铁和铁路国际运输通道，继续打造“中欧班列”品牌，推动建设泛亚高铁、中亚高铁、欧亚高铁；共同推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拓展联通沿线国家的重要海上航线，以重点港口群建设为重点，建设国际海洋运输大通道。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推动沿线国家“第五航权”开放，进一步密集中欧、中国—东南亚航线网络，加强中国与南亚地区城市间的空中联系。也能通过落实“中非区域航空合作计划”，形成覆盖亚非欧大陆的航空网络体系。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交通标准的对接和统一，形成沿线国家统一的铁路和公路标准体系，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

第二，共同打造自由互联的“一带一路”金融网络体系。金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沿线各国必须深入开展金融合作，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持结构、创新运用方式，为“一带一路”长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要进一步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各国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银行等投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等多双边基金的重要作用。要加大沿线国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要推动沿线国家债券市场开放和发展，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他国发

行债券，支持沿线国家面向全球发行“丝路债券”，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沿线国家要构建稳定的货币体系，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中国愿在沿线建立更多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出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与更多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结算协议。沿线国家应积极构建跨区域的信用体系，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各国现有信用评级体系的改进与完善，研究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信用评级体系与标准，逐步建立客观、公正、合理、平衡的“一带一路”信用体系。

第三，共同打造稳定互联的“一带一路”能源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储量极为丰富，同时也是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市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需国大部分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沿线国家应密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沿线国家可成立“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大宗能源产品交易平台，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掌握全球能源产品定价权，避免能源价格大涨大落对供需双方造成损失。沿线国家应共同推进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建设一批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及加工转化合作带和示范区，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沿线国家应加强能源互联网建设，可考虑共建一批火电、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基地，推进中国与中亚、西亚能源通道建设合作，加快中俄天然气管道建设，提升中俄油气管道运输能力，推进中国与俄罗斯、东南亚、中亚跨境电力通道建设，加快联网步伐，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油气丝绸之路”“电力丝绸之路”和“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第四，共同打造安全互联的“一带一路”信息网络体系。信息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一带一路”建设要把信息互联放在突出位置。沿线各国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动沿线各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中国与中亚、东盟地区的跨境光缆建设和改造升级，规划建设中国—印度洋—欧洲跨境光缆并接入洲际海底光缆，完善沿线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要在沿线选取适宜地区建设若干大型国际数据中心、信息平台、信息港，形成强大的信息数据交换能力、路由能力、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面向沿线国家提供高速、低价的国际通信和互联网服务。要共同构建和完善沿线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法制建设，建立多边、民主、透明、安全的信息治理体系。

第五，共同打造多彩互联的“一带一路”文化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并通过交流形成了多彩绚烂的丝路文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多彩多样的现代文明，沿线各国要在

传承古丝绸之路交往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各国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创造新的文明。各国应共同精心打造一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项目，深入开展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宗教历史、体育旅游、卫生健康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论坛、展览、演出活动，共同举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联合译介、出版相关书籍，拍摄、播放有关影视片，支持各国青年往来、学术往来、志愿者派遣、非政府组织交流，广泛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通过文化交流推进民心相通，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感情认同、发展认同和道路认同，形成代表人类进步和正义的和平观、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

（五）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性安排，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逐渐突破各国体制机制割裂的藩篱，逐步推进相互对接的制度性安排，并做出重大制度创新，形成一些新体制、新规则、新办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第一，建立域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机制。世界各国、国际和地区组织，只要有意愿都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共同致力于允许新成员国、新成员组织加入的开放机制建设。中国愿与世界上有志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一道，共谋盛举，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第二，建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组织协调机构。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可共同成立专门的“一带一路”组织协调机构，该机构由沿线各国政府派出代表组成，主要负责“一带一路”规划和实施方案制定、建设进展评估、重大项目选择、相关信息统计发布及相关重大问题协商等，并制定“一带一路”年度建设工作安排，该机构可在北京设立机构秘书处，形成联合工作机制。

第三，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军事冲突激烈、恐怖主义问题严峻、分离分裂主义势力猖獗，对安全稳定建设“一带一路”构成威胁。沿线各国应共同建立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对话框架，围绕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安全问题沟通协商，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凝聚相关方最大共识，逐步拓展利益契合点。沿线各国应共同建立常态化的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联合反恐演习、海上合作巡逻、重大灾害救援演

习、地区维和演习、网络安全应急演习等，进一步深化各国安全互信，不断强化安全合作水平，建立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安全力量。

第四，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一体化通关为重点，改革海关监管体制，优化作业流程，合作建立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沿线国家海关应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互认；应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形成统一的运输规则，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加强沿线国家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扩大双向免签范围谈判，方便沿线国家人民友好往来。

第五，建立沿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强参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沟通，形成趋同化、协同化和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各国应藉此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沟通，统筹兼顾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减少相关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不均衡性，将政策负面外溢效应降至最低，以支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

第六，建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常态机制。以 2017 年北京“一带一路”国家高峰论坛成功召开为契机，建议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每年一次的形式持续办下去，沿线所有国家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高级别官方论坛。2017 年北京“一带一路”国家高峰论坛为首届论坛，2018 年和 2019 年的第二届、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可考虑在“一带一路”的主要起点城市中国西安和厦门举办，未来可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主要国家、重要城市举办。

（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智库交流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认可和支持。智库在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沿线各国智库应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密切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真知灼见，用智慧、理性和深邃的思想力，构筑更具引领性的共识、议题和方案，进一步凝聚沿线各国的共信、共识和共知，面向未来，创新、扬弃、联通、协同，让站在人类道德和道义制高点上的思想光芒普照大地。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智库是一国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应特别注重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建议全球智库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智库和相关机构可通过这一网络开展围绕“一带一路”的双边或多边联合研究，共同举办有关研讨活动，相互交流“一带一路”研究成果，共同发布研究报告，促进各国智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依托“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沿线国家智库可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组织开展“一带一路”顶层设计谋划和“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制定，组织设计策划“一带一路”全球智库论坛，组织围绕“一带一路”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组织跟踪沿线国家社情民意，对苗头性动向性问题进行疏导，对公众关切的重点问题主动回应，对舆论曲解的热点问题有效引导，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可行性论证、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等服务。

第三，共同发布沿线智库“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大数据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要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智库的资源优势和专业能力，整合利用各国数据平台的信息资源，打造面向政府和社会的“一带一路”大数据库，让大数据和科学之光普照“一带一路”的现在和将来。“一带一路”大数据库可由国别库、区域库、理论库、实践库、项目库、资讯库等若干部分组成，囊括了沿线国家基本概况、经济产业、政策法规、规划计划、项目工程、文化交流、社会舆情等多种信息，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多元化、常态化、可视化的大数据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和未来建设需求。目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社科院、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等中国智库已合力打造了“一带一路”大数据库的 1.0 版，中国智库愿与沿线各国智库一道，链接沿线各国政府、智库、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数据信息，进一步丰富完善大数据库的内容和功能，使“一带一路”大数据库更好发挥作用。

第四，共同发布沿线智库“一带一路”年度研究报告和年度贸易投资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智库应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研究，共同组建联合研究团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舆论等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每年定期发布“一带一路”年度报告，对“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问题进行年度总结，为各国政府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每年定期发布“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报告，通过对沿线国别、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跟踪研究，形成对沿线国家投资营商环境变化的动态跟踪，为企业投资、项目落地提供指导。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战略

郑永年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战略，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是“一带一路”战略，一个圈就是周边外交。新型大国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将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对中国来说具有好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战略从根本上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影响中美关系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对中国而言，周边外交是最重要的，其中，南海问题中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钓鱼岛问题需要维持现状，台湾问题有足够的方法可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若处理不当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应把握机遇继续推行“自由贸易”。同时，要处理好大国关系、解放思想、积极争取大国地位，做好一个新型大国。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一带一路　周边外交　全球化

作者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一、习近平的“两条腿一个圈”新型国际战略

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会根据形势进行调整，但方向到现在为止没有大变化，还是继续努力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主导的中国外交有很大变化。海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而走向了“有所作为”。但笔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邓小平同志实际上也是“有所作为”的，而不仅是“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同志“有所作为”才有中国的今天。如何理解十八大以

来的“有所作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席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战略：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大国的外交，主要针对美国，当然也可以应用到俄罗斯、欧盟或者未来的印度等大国关系中；第二条腿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就是“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中国的周边外交。

（一）第一条腿：新型大国关系

从总体形势看，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最主要的。中国领导层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笔者一直强调，中美关系是中国现在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如果不出问题，不仅中国不会出问题，美国不会出问题，整个世界也不会出大问题；中美关系一出问题，整个世界都会陷入混乱。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两根支柱，哪根都不能倒，美国倒了或者中国倒了，国际关系的“天”就要塌下来，整个关系都会崩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内部都存在反对力量，即中国有反美力量，美国有反中力量，但是两国的领导者都很清楚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各自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被这些力量所左右。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来的。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代，美国不是那么乐于接受，但也没明确反对此概念。这个概念提出多年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美国也是因为这个概念而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要好好地处理。奥巴马在美国执政 8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执政以后，这些年都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处理两国关系。再早一点，在胡锦涛同志任中国国家主席时期，中美关系基本也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的；甚至更早至邓小平时代，就是沿着这个逻辑的，即中美关系不能搞坏，只能搞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若认清楚这一点，以后跟美国打交道就会有很大的空间。美国现在最大的利益是不要失去中国，或者说美国国际关系最大的利益就是把中国留在体系内。如果失去了中国，美中关系可能也会变成以前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状态，美国可能只是半个世界的霸主；而把中国拉在体系之内，同时中国又承认美国的地位，那么美国是整个世界的霸主。

（二）第二条腿：“一带一路”战略

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个倡议。这个倡议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夹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间。中国也一直在说，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一点事情。当然以前也在做，例如中国跟非洲的关系、跟拉美的关系。不过，这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路线更明确了。“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展项目。

（三）一个圈：周边外交

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周边外交。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复杂。美国的地缘政治最简单，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这两个经济体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接壤国就有十几个。如果周边不稳定，中国就很难崛起。不管中国有多强大，如果被周边困住，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些年，针对周边外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后来扩展到“世界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奥巴马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基本上，中美两国是在这个概念构架内来处理关系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又会如何呢？

（一）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人们一直在说“不确定性”。问题在于怎么看待“不确定性”。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我们有“确定性”，但这个“确定性”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使中美关系“坏”下去，无论是她的“重返亚洲”“平衡中国”战略，还是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都对中美关系不利。当然，她也会做一些调整，但不会改变她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大局面。而特朗普执政当然是“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是件好事情。“不确定性”既可以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坏。不过，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笔者的评估是中美关系现在产生了好的“不确定性”，良好的机遇较多。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特朗普？如果大家每天都关注美国主流媒体，会感觉特朗普简直就是个“疯子”，中国国内很多媒体也受美国主流媒体影响较大。最近笔者在新加坡演讲时表示，我们大大低估了特朗普，因为不喜欢他就拒绝认识他、拒绝了解他。实际上，很多人的心态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特朗普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有。他做了半个世纪成功的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很多年以前，美国的未来学家就已经提到特朗普会是未来美国一代新型领导人。总体而言，是时势造英雄，现在美国确实需要出现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了。美国的民主、经济制度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早应进行改革。但是人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因为美国有很多方面的“政治正确”。“政治不正确”是很麻烦的事情。在美国，民主制度不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批判，因此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特朗普看到了这些，看到了美国既

得利益虚伪的一面。所以，他参加选举的伊始就有比较好的策略，“我就不跟你玩这一套，我就是玩体制外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要跟体制接轨，尽管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他从来没有跟共和党有很好的沟通，充其量只是借用了共和党的名义。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里，第三力量是不太可能当选总统的，他必须借助共和党。他很聪明，不讲内政，只讲外交关系。他表现得不错，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

（二）中美关系为什么重要

世界未来的秩序如何维持、如何改革，还是要看中美关系。其他国家可以发挥作用，但界定不了国际秩序。从国际关系产生以来都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制定好国际关系的规则，小国家来服从且大都是搭便车。未来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世界将是一个乱世状态。

首先是美国本身的变化。美国仍然是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其军事力量，但也确实不如以前。相对而言，与其自身相较，与崛起的中国相较，美国确实衰落了，不像二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那么风光了。当时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没过多少年美国开始走下坡路了。第一，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美国目前还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速很快。第二，美国的软实力即民主自由，也与以前不同。二战以后，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软实力非常强大，很多国家都仿照学习。错误的是，美国到处推行民主，在中东、北非、中亚等各处推行。结果，美国的民主变成了一种负能量，因为美式民主到处“水土不服”。美国文化的内部创新能力很强大，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强。唯独其军事力量依然强悍，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有国家可以超越。第三，与中国有关的因素。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能一直充当“世界警察”，是因为它的世界“税收”能力，令其他国家交税、交“保护费”。为什么二战后像日本那样的盟友能交给美国很多钱呢？主要是因为有前苏联这个“敌人”的存在。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9·11”以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开始把中国塑造成敌人。其实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没有“敌人”美国很难收“保护费”，很难向其他盟国收税。但因为“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没能把中国塑造成“敌人”。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日本、欧洲国家交给美国的钱越来越少。而特朗普很聪明，他对其盟友说，“你只有多交钱，不交钱我不保护你”。他说了很多次，尽管不见得会做，但这反映出美国人的心态和美国盟友的心态。这些盟友也没有明显的“敌人”，因为中国显然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的“敌人”，中国一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他

国家很难像对前苏联那样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是中国智慧的地方，也是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精神之优势。

其次，欧洲是美国最大的盟友，不过现在欧洲很忙。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还是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是由内部问题引起的。但欧洲的内部问题又会成为欧洲的总体问题。英国已经开始正式的脱欧程序，但是英国脱欧以后欧洲民粹主义思潮会如何发展？人们现在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法国会发生什么？欧盟可以负担得起英国的脱欧，因为英国在欧盟里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伙伴。但是，欧盟绝对承担不了法国的退出，如果那样，欧盟就会面临解体。欧盟内部的各个国家，民粹主义都非常强大。法国如果脱欧，不仅是欧盟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欧洲会不会回到一战、二战以前的状态的问题。因为一旦欧盟解体，欧洲国家之间将失去平衡。所谓“国际平衡”的概念是从欧洲产生的。如果法国退出欧盟，就会构成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竞争，也许欧洲的秩序就要重建。

再次，中东可能 30 年都无法建立秩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东秩序是近代以来受欧洲影响慢慢建立的，现在这个秩序被破坏了，即使美国完全退出，俄罗斯不影响它，它自己本身也无法建立秩序。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可知，没有外敌的时候，他们的各个教派也是争斗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建立秩序。

最后，冷战以后唯独比较好的就是亚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但不巧的是，因为只有亚洲是好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力量都往亚洲转移，美国、欧洲、俄罗斯都强调其在亚洲的存在。前几年，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法国也提出了类似概念，英国、俄罗斯也想来。世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国防军事都会往哪个地区倾斜。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思维，因为亚洲是经济中心，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不仅美国不会放弃，其他国家也都会向这里聚集。亚洲非常重要，这表明中国的外交压力在未来很多年里会非常大，会越来越难，直到真正的崛起。如何重建亚洲秩序或者亚洲国际秩序，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

三、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从根本上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非常重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事情，“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大项目。许多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做雷锋，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这个看法很片面，不是全部。“一带一路”战略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不过，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与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并不矛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两者是正相关的。

目前，中国人均 GDP 大概是 8000 多美元，任何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都必须开拓海外市场，欧洲、美国都是如此。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是做法不一样。以前西方国家实行的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像鸦片战争，中国不开放，英国的大炮就来了。今天的中国能这样实行殖民地主义吗？中国实行不了帝国主义，也实行不了殖民地主义。美国搞占领，中国能吗？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在新时期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海外市场拓展。中国有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还有技术。中国所有资本的技术含量仍然很低，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资本。但无论是中国的产能、资本还是技术，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中国的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和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正是这些国家发展所需要的。

西方有些人一直说，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地主义？这是歪曲事实。西方国家实行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死了无数人。过去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人家的大门，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用钱打开人家的大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成人死亡，这怎么是新殖民地主义呢？中国在非洲做的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西方国家以前也做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但那是为了把原材料运出去。中国为非洲国家盖医院、学校、体育馆等等，都是老百姓可以共享的，而不是为少数人建设的。所以，新殖民地主义、新帝国主义这些概念不能随便使用。“一带一路”建设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如果只有南海问题，而没有“一带一路”战略，今天的情况会坏得多得多。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视经贸，冲淡了南海问题的军事性质，才避免了军事竞争。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中美关系

尽管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部分，但“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竞争合作关系，竞争要么是在经贸领域，要么就是在军事领域。一定要注意，美国现在的经济力量不如以往，但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因此，美国在和中国竞争的时候，很容易把其重点放在军事上，美国的“重返亚洲”就是如此。美国政府不能命令美国商人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因为投资是资本行为，不是总统说了算，而是华尔街说了算；但是航空母舰开到哪里是总统说了算，所以美国很容易派出航空母舰。但如果中国仅从军事领域回应美国，就表明我们同美国走上了军事对峙的道路，这是最危险的。在军事领域，中国要有足够的国防来应对美国，但重点还是要放在经贸领域。经贸发展既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的重点，也是其他国家需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为了推动发展的。当然，这些都还是初步的，以后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手段和制度工具。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贸易规则

在经贸方面，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如何制定贸易规则。最近国内对这个问题讨论较多，尤其是当讨论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既然美国离开 TPP，我们就赶紧加入，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希望中国加入；美国不制定规则，我们就赶紧制定。但笔者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我们没看清楚奥巴马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力主 TPP 主要是为了制定规则，而不让中国制定。但在实际生活中，规则不是制定了就有用；规则的背后是力量，没有力量，制定了规则也没有用。美国以前制定的规则有用，是因为它背后强大的经济力量。为什么像马来西亚、越南这些经济力量远远不如中国的国家要加入 TPP 呢？这些国家看中的是美国市场，没有美国市场的吸引力他们不会加入，日本也是如此。所以，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制定规则。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 TPP 不同的地方在于，TPP 是规则导向的，而“一带一路”战略是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制定规则，这是错误的。“一带一路”建设当然要有规则，但不是中国制定好了强加给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亮点在于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大家在合作中共同书写规则。这涉及中国如何与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对接。2016 年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还有 2017 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为什么在西方影响那么大？因为西方感觉到中国是一个进步的力量。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令西方感觉到错位了，以前是美国讲的东西现在美国不讲了，而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开始讲了。

四、中国的周边外交

对中国而言，周边外交是最重要的。当前，周边外交也是最紧张的，从朝鲜半岛、黄海、东海、南海到印度洋，都不太稳定，尤其是现在的朝鲜半岛问题。

（一）南海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唯一有进步的就是南海问题。尽管有人说因为南海问题，好像中国在东南亚没有朋友了。但笔者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理得当。因为早期菲律宾在造岛，越南在造岛，我们一直很着急，中国为什么一点不动呢？不动的话，人家造好岛以后，南海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如果那样，南海真

是变成中国的历史了，即跟我们不相关了。这几年中国通过大规模造岛，掌握了主动权。这是那么多年来，第一次中国拥有了主动权。尽管形势还不是很好，但主动权在我们手上。以前我们总是被动地对南海问题做出反应，因此国家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做还是晚了一点，如果早 10 年，情况绝对不会如此，不过我们最后这么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现在，南海问题大家争吵得凶，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很复杂。美国没有说中国不能造岛。当然，一些反华、反共的人一直在借机生事。美国清楚地知道，菲律宾在做、越南在做，中国也是要做的；美国抱怨的是，中国做得太快了。确实，中国一年多时间里做了越南几十年时间所做的。这使得越南、菲律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如果要做，是可以非常迅速的。美国最担心的是航海自由。美国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点，因为它是唯一的全球霸权，它不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但它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中国要认同这个事实，这是美国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的需要。作为大国，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很多方面的国际法约束不了大国。全球的大国都是这样，法律只对小国有用，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从来就是打折扣的。法律哪来？谁来执行？在和国际法的关系上，美国要站在国际法之上来维护国际法。这就是美国的认知，也是事实。如果没有美国，一定会出现另一个国家站在这个法律之上。

海上自由既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中美有最大公约数。中国 85%以上的海上交易都经过南海，中国比美国更关心南海的海上自由。美国现在关切南海问题就是其所说的“海上自由”，这一点中国很清楚，也很配合。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有很大进步。以前南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海洋和南海的岛礁争议分开了。海洋方面，中国承认美国、日本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合法性，大家都可以共同关注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也是近期正在讨论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岛礁争议是中国与东南亚个别国家之间的争议，不是与美国的争议，也不是与日本的争议。现在美国、日本所担心的是，中国的造岛会不会影响海上航道自由。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无论美国批评中国岛礁设施建设或者军事化，中国还是会完成这些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开始建设了，就不会停下来。但是一旦岛礁建设完成，中国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允许美国航母停靠我们的岛屿，就像允许美国航母停靠香港一样。这也是中国主动权的一部分。现在只要中国不再去黄岩岛造岛就可以。中国与菲律宾的形势在改善，未来几年会比较稳定。当然，中国不会放弃，但也不会大规模造岛。所以，南海问题不用太担心。美国的军舰还是会去，但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互动模式，你来我抗议，只要大家不擦枪走火就行。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美国站在日本的立场。不过，针对钓鱼岛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有限。至少从近期来说，中国不会把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从日本手中拿过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目前中国只需要日本承认这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像日本所说属于日本。多年过去了，很多国家担心的擦枪走火并没有发生。以前在政府没有控制的时候，情况是最危险的。现在只要是执政党或者政府派去的就不会出事，但如果是非政府组织去就会比较麻烦。这个互动模式不改变，就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三）朝鲜半岛问题

当前最麻烦的是朝鲜半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美国和中国都负有责任。朝鲜发展到当前状态，完全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两个国家不配合。实际上，这两个大国都有能力解决问题，中国能，美国也能。但两个大国都没有选择解决问题，朝鲜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找到了空间发展核武器。

在中国，很多人一直认为朝鲜问题是美国问题。这是错误的。朝鲜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美国问题。就安全来说，朝鲜能否对美国构成实际的安全威胁？即使发展到今天，直接的威胁还是太早，只能说朝鲜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或者日本构成了一些威胁，对美国没有直接威胁。但朝鲜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笔者认为，我们做“扳道工”是远远不够的。朝鲜核爆地点最近的与中国直线距离只有 50 公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如果朝鲜发展出核武器了，那么韩国就会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发展核武器，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就是中国。当然，中国自己也是核武器国家，但是周边被核武器包围并不是好事。现在北边的俄罗斯有核武器，西南的印度、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如果东边像朝鲜这样高度不确定性国家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中国将无法安眠。因此，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是很好的进展。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有几大误区。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的确很难先动手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美国动手处理，那么对中国而言就是如何配合。外在的压力对朝鲜是有用的，但是外在的压力还不够大，怎样能真正使它弃武？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国际关系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如果大棒不够硬，胡萝卜也不够甜，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棒要硬起来，同时胡萝卜也要甜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在核武器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外在的压力就可以解决。历史地看，去核最有效的就是采用果断的“外科手术”。

朝鲜问题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一个邻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当然，

有些人认为还有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想用朝鲜作为缓冲区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纯粹的幻想。以前中国有“战略纵深”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需要修整。在现代技术手段面前，“战略纵深”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长远来说，朝鲜半岛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比台湾所能构成的威胁更大更强。我们对朝鲜半岛民族的民族性一定要认识清楚。朝鲜半岛对中国有土地要求，这在前几年有过争论，韩国仍然有很多人在进行研究。半岛对我们有土地要求，如果处理不好，它与美国、日本联合，就会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现在中国担心萨德系统是有道理的，萨德放在韩国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当然，现在有些人觉得从技术上来讲威胁并不是很大。但笔者认为，萨德对中国威胁非常大，萨德系统如果运作起来，中国 2/3 的国土就丧失了安全感。所以，萨德问题如何解决是中国战略上最首要的问题。

（四）台湾问题

笔者个人判断，台湾问题已经解决了 75%，或者说经济上台湾已经很难独立了，余下的 25%，我们也有足够的方法。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进行对等谈判。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不是两个地方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台湾人的问题、香港人的问题。香港只有 800 多万人口，有问题的人则更少，大部分还是对内地比较友好的，但是因为内地这些年做得不够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问题；台湾也是一样。

（五）关于俄罗斯

就像美国判断的，俄罗斯在今后 30 年、40 年仍然无法崛起。笔者个人对俄罗斯是比较悲观的。历史地看，俄罗斯从沙皇大帝开始，对外侵略和扩张非常厉害，但国内永远建设不好。普京执政之后政局稳定了一点，但普京的做法有很大问题，整个国家围绕他一个人转，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也没有任何制度建设。普京是强人，但整个制度围绕他一个人转，不知道在他之后俄罗斯会如何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这次美国大选之后，很多人说特朗普带来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过，美国是制度化的，而俄罗斯的制度化很低。普京除寡头是对的，但他以新寡头替代旧寡头。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发生了寡头政治，寡头到了叶利钦时代就开始干预政治。普京以打寡头上台，但是俄罗斯今天仍然面临新寡头政治，只是换了一批寡头，把反对他的寡头换成支持他的寡头，经济结构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民生经济问题。中国的几个县长就能解决，但普京他们解决不了。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仍然很强，但还是前苏联的功劳，现在只是维持，没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所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会很好，因为两国之间没有生意可做，其他方面的关系就很难有

实质性的进步。

（六）关于印度

印度也很重要。从战略上来说，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发展迅速，民族主义崛起得很快。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将仅次于中美关系。从印度大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还有 10～15 年的时间。

五、中国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一）中国应将“自由贸易”大旗继续扛下去

中国下一步主要是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对接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明确提出。现在“自由主义”好像很敏感，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我们的确要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我们强调的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政治秩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西方到处推行西式民主自由，给很多地方造成了混乱。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制度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不过，西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有进步性的。以前毛泽东同志对西方的力量也是有分辨的，有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也有反动的力量。现在也应当有这个意识，西方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之后以西方主导的进步力量和左派的作为，是我们应当依靠的力量，而不是我们否决的。对此，我们要明确提出。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观望，美国不扛自由贸易的大旗了，中国能不能把自由贸易大旗继续扛下去？中国完全可以接受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先进入自由国际经济体系并接轨。中国已经加入了所有大型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亚行等等，我们都是成员。但在其中，中国没有说这个世界秩序已经够好了。相反，中国主张改革这个秩序，争取更多的国际公正和正义。所以，我们是改革者。中国力主的改革是有成效的，中国在国际组织里的地位也在提升。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所确立的体系，尽管是西方主导的，但它是相对开放的体系，不像之前由少数列强主导的体系。

（二）中国接受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成本是最低的

接受现行体系对中国来说成本是最低的。即使中国有能力另起炉灶，但另起的“炉灶”其他国家能否接受？“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对现存体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一点习近平主席解释得非常好，我们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亚行等，我们所做的是“补充”。所以，针对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一进入、二改革、三补充就足够了，这对中国是最便宜、最廉价、最经济的方式。

（三）特朗普为什么反“全球化”

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机遇并不多。很多人说特朗普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很全面。特朗普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内出了问题，现在需要纠正。举个简单的例子，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美国引导的，美国在其中获利最多，中国当然也是获利者。2008 年之前美国的中产阶级有 70%～75%，但到今天为止只剩不到 50%。全球化所产生的大量利益都流向了少数既得利益者，大部分老百姓没有获得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牺牲品。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会赢得选举？这次选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选举，而是一个体制内外的对决。这次选举简直就是白人的一个公投，白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教育高或低，大部分都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为什么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奥巴马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养懒人的，特朗普尤其不认同。上一波的全球化对美国损害最大的就是白人中产阶级，所以现在白人中产阶级就支持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那么大的利益，但忘记了美国的农业、小城镇。美国要在今后一段时间进行治理和整顿，否则会继续快速衰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并没有错。很多人说他是“逆全球化”。一方面，他确实是“逆全球化”。因为近几年国际贸易的增长低于 GDP 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减低了。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的资本流出来、美国的企业走向世界就是全球化，那么现在资本和企业回流到美国不是全球化吗？一样也是全球化。全球化永远是双向的。下一步中国要增强资本的竞争力，要在国际舞台上和美国竞争优质资本。

就美国内部发展而言，特朗普有几件事情肯定会做。一是再工业化。不过，有的时候做得不够聪明。例如现在开发了一些煤矿，对他来说，尽管有环保等问题，但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就业。二是低税收。因为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特朗普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以前一样，通过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资本回流、吸引其他国家资本流向美国。三是弱美元。美国要刺激出口。四是增加军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改变策略，它要在任何时候能够把军力投到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要保证足够的军力来维持霸权，并且投入更多的军费对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有好处。史料证明，美国经济真正走出“大萧条”就是因为二战。二战一开始，美国的军工企业得到了大发展，政府对军事的支持都投入私营部门。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绝对不能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一旦陷入军事竞争，中国会把大量资金投到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苏联是最好的例子。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政策就是：一旦美国和前苏联进行军事竞争，前苏联就会立马对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一旦国民经济军事化，它肯定会倒下。今天的中国重视军民融合，但路还很长，因为我们与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同。

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能不能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这个窗口期并不长。美国国内治理整顿好了以后还会再出发，绝对不会偏安一隅。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吸引资本，但不能强行管制资本。中美未来对资本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特朗普对于我们的意义。所以，特朗普执政对中国产生的“不确定性”不见得是坏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就是坏的确定性，中美关系只能下行，因为她用意识形态来处理中美关系。特朗普对中国产生了好的“不确定性”，是指美国会给中国带来好的压力。中国下一步如果要吸引外资，就要通过调整企业税收、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等举措同美国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经常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

六、中国如何做好一个新型大国

（一）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成为新型大国的关键

在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即使奥巴马没有全盘接受这个概念，但他对很多内容是接受的。今天与奥巴马时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特朗普是一个没有很强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而奥巴马及希拉里·克林顿都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我们很难与一个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但是与一个实事求是做生意的人是非常好沟通的。从这个角度看，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需太过担心，经贸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谁多赚一点、谁少赚一点的问题。中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非常大，二者并未处于同一层面。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大大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尤其是如果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能够确立信任关系的话。在过去，中美关系确实受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并且双方都有意识形态。如果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了，那么中国企业可以去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事情美国做不了，但中国可以。实际上，世界上从没有发现过两个大经济体之间互补性像中美两国那么强。前些年，有美国学者以“中美国”来形容这种互补关系，“中美国”主要指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给中国的压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如果朝鲜问题不解决，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会非常麻烦。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过，中美两个大国吵吵闹闹是会有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有美国学者（前官员）说，现在中美两国之间一年有 3000 多个互动平台，这是很重要的现象。特朗普想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难。这一点美国学者也很清楚。因为美俄两国没有很多生意可做。比较一下美俄贸易和中美贸易关系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美国社会的精英界非常痛恨俄罗斯。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笔者与美国一些研究俄罗斯、研究中国的学者有些交流，他们表示：如果你一直研究中国，那么你会喜欢上中国；但如果你一直研究俄罗斯，即使本来对俄罗斯

的印象很好，到最后也会恨俄罗斯。究其原因，它们两个文化都是排斥性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包容性的非宗教文化，确实有这个魅力。中美关系的大局是稳定的，大国关系好对中国而言是件好事，因为现在真正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也只有美国。像越南、菲律宾，甚至日本，对中国都不会构成直接的致命威胁，这些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为中国制造麻烦。

在战略上，对中国来说现在无非就是两个重点，一是朝鲜半岛，二是台湾问题。一些人说特朗普想改变台湾问题。尽管他的确表示要改变，但他不会做。我们强调国内建设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国内建设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说以前美国自己当“世界警察”，现在美国则要拉上中国一起当。在奥巴马时代，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讨论过 G2 的可能性，但奥巴马实施不了。由于美国是民主自由国家，而中国是专制等等因素，奥巴马把中国看成异类。特朗普则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概念不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 G2 的机率要大于奥巴马时代。

（二）中国要做好新型大国必须解放思想

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抓住，这还是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我们还需要思想解放，跟美国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在外交上，由于很多原因，有些问题中国处理得并不恰当。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意识了。与俄罗斯相较，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已经不能支撑成为大国了。但是，这些年来，普京很辛苦地支撑着，并且撑住了。而且普京还抓住一切机会复兴做大国，在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处理得很漂亮。而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了大国意识。中国在秦朝、汉朝、唐朝的时候有大国意识，但明清以后再也没有大国意识了。近代以来，中国不仅没有大国意识，而且一直有太多的“受害者”情节，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压多年，是一个弱者和受害者。但如果这样的受害者情节太重了，我们就会走不出悲情，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可怜自己。没有自信如何确立大国地位？

第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太意识形态化了。例如在美国问题上，很多人就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是在看真实的美国，而是把美国作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是敌人。这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不喜欢美国把中国看成敌人，但是他们自己还把美国看成敌人。问题在于，如果用意识形态看问题，就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想象”的美国。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里更糟，现在网上很多反美言论，就是为了反美而反美。怎样实事求是地去看美国，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反美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弱国，非常弱，需要塑造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即反美。但是，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他的“三个世界理论”，那里面没有一点意识形态。他为什么把前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具有绝对相反意识形态的国家放在一起作为头号敌人？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正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使得中国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中国找到了空间来拓展外交。毛泽东同志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表现在他跟美国建交上。他曾公开表示过，他喜欢和美国的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更多地接近事物的真理，而左派（民主党）往往太理想化。和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建交，这与他的现实主义相吻合。

第四，我们也错读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当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市场是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的概念完全属于资本主义，改革刚开始时，理论界还称之“商品经济”，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敢使用。“市场经济”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外交上，大家都记得他的八个字，就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很多人现在说，邓小平同志是“韬光养晦”，没有“有所作为”。那是完全错误的理解。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促成国家的崛起，改革开放就源自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都是他“有所作为”的功劳。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把很多东西看成“意识形态”，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还是美国，都被看成了意识形态。邓小平同志看待越南就没有意识形态，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教训一顿。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对朝鲜教训一顿呢？现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归来，很多人希望他像邓小平同志从美国归来后一样，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实际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正越来越束缚着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处理。不走出意识形态，无论国际、国内社会的问题都很难处理，国家很难崛起。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可以称之为“明朝陷阱”的局面。“明朝陷阱”是指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大国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有郑和下西洋，甚至还有倭寇，但我们没有抓住机会。今天，如果比较公正地去看，郑和下西洋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即中国航海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而民间的“倭寇”现象，实际是浙江、福建一带的海商勾结日本人所为。为什么明朝失去了这个机会？只是因为明朝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挠。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朝鲜问题不是中国没有能力解决，哪怕美国不合作，我们也有解决能力。不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三）中国要积极争取大国地位

历史地看，大国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我们不能等大国地位从天而降，我们要争取。当然，中国绝对不能做美国那样的大国。如何做大国？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我们还在学。不过，绝对不要去做美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怎么发展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不会出现像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进而，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永不称霸，是最聪明的。

美国从 1890 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成为真正的、唯一的“老大”是在前苏联解体以后，至今并没有多少年，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一直提倡世界的多极化，实际上世界本就是多极化的。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重建亚洲秩序。所有区域秩序都避不开大国，亚洲秩序也一样。因此，美国有美国的秩序，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秩序，印度有印度的秩序等等，未来世界会走向一种新型的帝国时代。这种新型帝国是由一个大国和诸多较小国家组成，但内部的关系与从前不同。在前苏联东欧集团内部，其他国家都听前苏联的；而美国的盟国也都是听美国的。以后可能不是这样。至少，中国不会这么做，中国有很好的优良传统。

现在说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其实做盟国并不舒服。例如日本、韩国，他们完全没有独立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中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既被西方人污名化，也被我们自己污名化了，那就是朝贡体系。我们应重新评估朝贡体系。从现在看，朝贡体系只有一点很不好，就是“叩头”。不过，“叩头”在封建时代也是正常的。笔者的解读是，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你向中国皇帝叩头，皇帝就对你开放市场；你送给中国皇帝 5 块钱，中国皇帝还给你 10 块钱。当然，中国以后绝对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不可持续。“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倡议”，鼓励大家都参加，共同书写规则，在发展过程中书写规则。因此，笔者对中国是非常乐观的，她会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大国。对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是另外一个美国，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就无法建立。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她才能创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责任编辑：李　蕊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李晓西　林永生

摘要：本文从政府对市场作用的战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四个方面，回顾了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目前，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越来越强调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二是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三是中国市场化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四是中国越来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融入全球经济。最后，针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相关对策思路。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改革　开放　全球化

作者简介：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林永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一条主线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得益于此，中国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制度红利、助推经济腾飞。本文重点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条主线，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进展与成效，并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年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有关对策思路，供决策参考。

* 本文为“改革开放40年”征文。

一、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战略定位

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历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政府在下一个五年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也能够反映政府对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的研判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实际上，中国市场化改革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成效与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及其演化是分不开的，表 1 梳

表 1　1981—2016 年中国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定位

五年计划或规划	对市场作用的定位	相关表述
六五计划（1981—1985 年）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要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地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把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
七五计划（1986—1990 年）	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八五计划（1991—1995 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初步适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九五计划（1996—2000 年）	更多领域运用市场机制作用	通过深化改革，更多领域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竞争性行业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使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率。
十五计划（2001—2005 年）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积极性和创造性。
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	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政府公开发布的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纲要整理而得。

理了 1981 年以来历次五年规划的有关表述，尝试勾勒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及其演化历程。回顾过去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五个相对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二是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议定书》（以下简称“WTO 议定书”）的最终签署，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四是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市场化”有了更清晰准确的定位；五是 2013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总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越来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辅助地位”到“与计划相结合”，到“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

二、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

自 1978 年开始，中国启动了以市场化取向为主的改革。如前所述，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战略定位直接影响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围绕如何界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何深化与推进市场化改革等问题也进行了剖析，并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早期倡导市场化改革的学者之一，笔者的学术生涯与市场化理论和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安排与支持下，笔者于 1983 年开始参与农村经济调研，并从实践中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认识到市场的作用。[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追求市场化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人民来决定生产、交换与消费。

依据历史脉络和阶段性特征，笔者曾将 1978 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的起步”“改革的初步进展”“改革的全面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并完成了市场化的专著。[②] 这里沿用这种阶段划分，简要回顾与述评这四个阶段。

（一）市场化改革的起步（1978—1984 年）

市场化改革的起步在改革开放初期，时间为 1978—1984 年。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时期的改革实践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改革从农村突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改

①李晓西、王逸舟、樊纲、王振中等：《市场化改革思路的主要特征与内容——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导报》1987 年 11 月。

②李晓西：《中国市场化进程》，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革的突破口，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78—1984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 55.4%、粮食产量增长 33.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78—1983 年中国人均年消费额增加了 108 元，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二是尝试企业改革，向国营企业放权让利。这一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开始了初步探索，对其放权让利，国营工业企业得到了初步的自主权，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三是恢复城乡商品市场。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城镇个体经济，商品市场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四是尝试市场新体制，设立国家经济特区。1978—1983 年，中国建立了 4 个经济特区，完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二）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进展（1985—1991 年）

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进展时期是从 1984 年 10 月直到 1991 年底，可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时期的改革实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农村改革的深化，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1984—1991 年，主要由原先社队企业转变而成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令人瞩目，8 年时间里，总产值、利润总额都增长了十几甚至几十倍，但其增长率波动性较大。关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199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改粮食统购为粮食定购。二是企业改革的推进，普遍实行承包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最初推行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基础上开始的，在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企业“两权分离”后有了更快发展，1987 年在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迅速推开。三是流通领域的改革。这一时期，推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到尝试进行“价格闯关”。四是对外开放的扩大。4 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窗口，取得了巨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础。1984 年 5 月，国家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经济权限，给予外商优惠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全面铺开。

（三）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1992—2001 年）

1992—2001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即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全面对外开放，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94 年起，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满足加入 WTO 的要求，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包括外商投资、外贸体制等领域的政策及规定逐渐与国际接轨。四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即农村劳动力转

移和城镇劳动力就业。五是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即初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

（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02 年至今）

自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加入 WTO 以及中国倡导发起并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二是完善所有制结构，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 36 条”的出台；三是深化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和油气、电信等垄断行业改革；四是简政放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五是共享市场化改革成果，即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六是转变发展理念，中国政府及领导人认识到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资源与环境代价过大，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更优的发展理念统筹指导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量化测度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改革成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涉及如何依据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有效性、稳定性等内容定义市场经济，构建市场化指数的问题。从实践上看，涉及争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应对部分国家对华反倾销的问题。

（一）从 WTO 议定书第 15 条谈起

WTO 议定书第 15 条为“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其中关键规定为（a）项（i）目、（a）项（ii）目以及（d）项。（a）项（i）目内容是，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 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否则，就适应（a）项（ii）目，即可使用“替代国”的方法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也就是采用与中国该产品有着类似或者相似生产条件的国家的产品数据作为计算依据。（d）项内容是一旦中国根据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a）项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无论如何，（a）项（ii）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15 年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 WTO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a）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

反倾销调查领域的“替代国”方法实际上脱胎于 1999 年 11 月底中美双边签署的入世协议，之后因为中国正式加入 WTO 而导致双边义务的多边化，才最终将美国国内法中反倾销领域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实施的“替代国”方法这一技术操作规定，被纳入 WTO 的法律体系中而得以国际化。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在其《对外贸易法》中设定了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并据此课征高额反倾销税来限制该国产品出口规模。当中国产品开始大量出口美国后，美国政府自然将这种“替代国”方法适用于中国产品。欧盟也有同出一辙的“类比算法”。它们成为美欧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杀手锏”之一。对 WTO 议定书第 15 条的法律定位应当是：它不是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而仅是反倾销这一特定领域内有关技术操作问题的规定，是仅针对中国的、具有歧视性的技术性不利条款。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 WTO，全部法律文件中根本没有任何“非市场经济国家”或类似概念。遍查 WTO 的法律文件，只有 GATT1947 的反倾销规则中出现过“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成员”的概念。①

（二）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入世以来，部分国家基于 WTO 议定书第 15 条，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缩写为 NMC），开展多起对华反倾销诉讼，致使中国出口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2003 年起，为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促进各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我们曾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动态监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发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系列报告（2003、2005、2008、2010），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200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在国外发行了英文版。该系列报告根据现代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主要概括，尤其是借鉴欧盟、美国、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五条带有共性的标准，即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并据此构建了由 33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市场化指数。

从表 2 可知，1978—2008 年中国市场化程度一直在稳步提升，特别是 1992 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市场化程度提升速度明显加快。假设存在一个 100%的市场经济标准，2001 年底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已达到 64.26%，2004 年以后超过了 70%，2008 年增至 76.4%，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该系列报告根据国际比较，初步判断 60%可以作为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水平。因此，中国已经属于

①荣民：《还原“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五条”真相》，《财经》2016 年第 35 期。

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表 2　1978—2008 年中国市场化指数

年份	指数值	年份	指数值	年份	指数值
1978	15.08	1989	19.83	1999	55.29
1979	14.25	1990	20.25	2000	60.64
1980	14.25	1991	21.10	2001	64.26
1981	16.63	1992	26.04	2002	64.76
1982	18.92	1993	34.11	2003	67.07
1983	15.79	1994	37.72	2004	70.53
1984	16.63	1995	40.60	2005	76.03
1985	18.38	1996	41.43	2006	75.19
1986	18.38	1997	49.93	2007	76.19
1987	19.83	1998	55.49	2008	76.40
1988	19.63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2010 中国市场化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0 页。

（三）部分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自由度的评估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测算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国际上引用较为广泛、亦可近似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两类代表性指标。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旨在测算国家和地区的机构设置、运转功能以及政策与经济自由的契合程度，包括 5 个方面：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贸易自由度、信贷和劳动力及商业管制。其 2014 年发布了全球 159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满分 10 分，中国得分为 6.45 分，排名第 113 名。① 美国传统基金会即将公布的 2017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重点强调了自由贸易对国民财富与福利的影响，并构建了自由贸易度指数，详见式（1）。假设自由贸易度指数满分 100 分，在 181 个测度国家中，中国得分为 73.6 分，排名第 116 名。②

①资料来源：弗雷泽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s：//www. fraserinstitute. org/economic－freedom/map?page＝map&year＝2014。

②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官方网站，http：//www. heritage. org/international－economies/report/2017－index－economic－freedom－trade－and－prosperity－risk。

i 国自由贸易度指数 =

$$\frac{\text{各国最大关税率} - i\text{ 国关税率}}{\text{各国最大关税率} - \text{各国最小关税率}} * 100 - \text{对 } i \text{ 国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的罚分} \quad (1)$$

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化指数，还是经济自由度指数或自由贸易度指数，尽管在具体指标上略有差异，但都大致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对自由市场规律的遵循程度，如果折算为满分 100 分的话，中国得分大致为 70 分左右。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四、入世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成为第 143 个会员国，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自身发展成就的认可，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对外放开的必然要求。入世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变成自由贸易规则改革的倡导者，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履行入世承诺、遵守国际规则；二是促进自身发展、助推世界经济。

（一）履行入世承诺、遵守国际规则

自加入 WTO 以来，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始终是自由贸易原则的重视维护者，始终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推动者。截至 2010 年，中国加入 WTO 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①] 以降税为例，中国 2001 年底加入 WTO，2002 年 1 月 1 日就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分 10 年逐步实施。其中，对绝大部分进口产品的降税承诺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已经执行到位；到 2010 年 1 月 1 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中国平均关税总水平从入世前的 15.3%降到 2010 年的 9.8%。[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 2015 年中国履行 WTO 承诺情况报告显示，入世以来，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出现急剧扩张：2014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贸易总额达 1240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长了 545%；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达 430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长了 733%。

（二）促进自身发展、助推世界经济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良性互动，促进了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

①胡笑红、王丽梅：《中国加入 WTO 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京华时报》2010 年 7 月 21 日。

②李健：《入世 15 周年中国与世界共赢》，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a/20161211/50398431_0.shtml。

献。根据 WTO 官方提供的最新数据，[①] 可就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横向比较：一是总体来看。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8.87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7503 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 2.1%，人均贸易额为 1677 美元，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 22.3%。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商品贸易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贸易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第三大服务贸易出口国。二是在商品贸易方面。2015 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3.95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2.27 万亿美元，2010—2015 年年均增长 8%，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 13.8%；进口额为 1.68 万亿美元，2010—2015 年年均增长 4%，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 10.06%。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背后，更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初级产品（农产品、燃料以及矿产品）的出口仅占商品出口总额的 3.3%。三是在服务贸易方面。2015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0.76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0.29 万亿美元，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的 6%，交通、旅游分别占中国服务出口总额的 13.5%、40%；进口额为 0.47 万亿美元，2010—2015 年年均增长 21%，占世界服务进口总额的 10.11%。

纵向来看，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飞速发展。如图 1 所示，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0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0.5 万亿美元，尽管 2008—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因外需低迷，货物进出口贸易有所下降，2010 年前后又延续了以往强劲增长的势头，2015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3.95 万亿美元，接近 15 年前货物进出口总额的 8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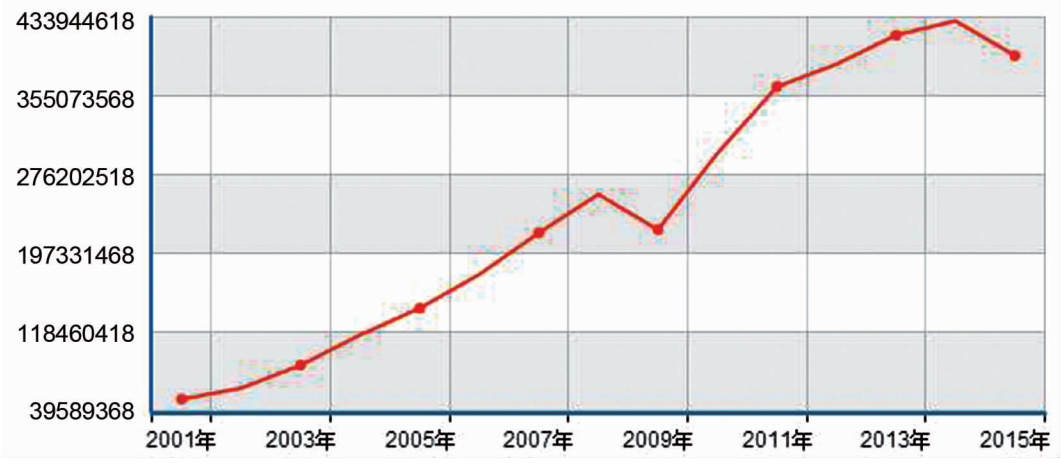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5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查询”栏目中的“年度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①资料来源：WTO 官方网站，http：// stat. wto. org/country profiles/CN _ e. htm。

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外商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均大幅增长：2001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496.7 亿美元，2015 年则增至 1262.7 亿美元，增加了 766 亿美元，增幅达 154.2%；2007 年中国对世界投资净额为 265 亿美元，2015 年则增至 1456.7 亿美元，仅仅 8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增加额 1191.7 亿美元，增幅近 450%。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底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外商投资总额，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事实证明，“入世”之后，中国在充分依托、运用 WTO 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及时兑现承诺，仅用了 12 年时间就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跃居全球首位。中国自 2013 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以来，连续 3 年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事实证明，坚持开放是正确的。我们尊重和运用国际规则实施改革开放，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所在。

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40 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越来越强调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就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总体上处于改革攻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二是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三是中国越来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融入全球经济。入世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2008 年底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直接带动了世界经济复苏。

如何看待中国获取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已经有 80 多个经济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包括俄罗斯、巴西、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同时包括北欧、英国以及荷兰在内的国家（地区）也都支持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日本等国坚持 WTO 条款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有意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态度暧昧且明确表示需要附加限制性条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一些东欧国家，由于国内的落后行业形成的强大游说力量，对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予以反对。[①] 对此，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给予应对：一是充分利用多种平台表明立场、坚定信心，无论个别国家是否承认，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不是自说自唱，而是中国持续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积极参

①商务部：《强烈不满欧美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新闻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1209/30072168. html。

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二是呼吁各国严格履行 WTO 规则，尽快废除以“替代国”方法对华反倾销。WTO 议定书第 15 条（d）项明确指出，“无论如何（a）项（ii）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15 年终止”，截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中国入世已满 15 年，各方应当遵守国际公约摒弃“替代国”方法。如果个别国家试图使用“市场扭曲”或者其他借口代替“替代国”方法继续对华反倾销，中国可以也必须利用 WTO 相关规定和国际机制进行申诉，据理力争。2017 年 3 月 21 日，中国已就欧盟对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替代国”做法正式向 WTO 提出争端机构介入，就是很好的例证。三是在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上把握程度，认准这仅是在 WTO 框架里具体反映在反倾销上的一项规定而已。仔细研读 WTO 议定书第 15 条可以发现，WTO 成员国需要依据其国内法研判受调查的中国企业或产业是否具备市场经济条件，这是一个双边、而非多边的商务谈判问题，自然也不是靠 WTO 机制与协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研究表明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曾认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意味着不成熟，那么现在则应有新的辩证解读。一方面，从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看，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从近些年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看，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与特色，取其精华、防其弊端，不套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制度。我们看到，按美国原先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则，就是想借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国企比重等来排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遏制中国。这步棋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保持清醒。比如，中国石油石化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自毁长城”“粉身碎骨”，而是通过“脱胎换骨”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绝不是通过改革以迎合某些国家扩展国际市场的私利。[①] 换言之，中国对自由贸易的一个理念是，需要规则、坚决维护，但要从国情出发，要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争取时间，在成长中完善、在完善中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过去 40 年，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如何坚持对外开放，不仅需要态度，更需要智慧。上届美国政府并不是以否定国际化为招牌，而是以对多边贸易为主的 WTO 多哈会谈难以进行、国际形势有新特点为借口而另辟 TPP 之路。在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上，我们不是一般地承认对外开放的口号，而是要有实质性的安排。即不同意以新形势、新议题否定多哈回合谈判。要在 2013 年巴厘《贸易便利化协定》和 2015 年 WTO 贸易部长《内罗毕宣言》的

①李晓西：《中国石油行业竞争与垄断关系前瞻》，《中国石油企业》2008 年第 2 期。

基础上，维护 WTO 在多边体制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的分享，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李晓西、宋则：《从双轨制到市场化》，《财贸经济》1987 年第 12 期。

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3 年版。

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5 年版。

4．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8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5．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10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6．李晓西：《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及其若干思考》，《改革》2008 年第 4 期。

7．李晓西：《加入世贸组织 10 年：中国市场化进程演进轨迹》，《改革》2011 年第 12 期。

8．李晓西、林永生等：《中国传统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9．李晓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理论新突破》，《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 12 期。

10．Li Xiaoxi. *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ti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6.

责任编辑：李　蕊

美国在互联网产业的布局与政策趋势

李　丽　李勇坚

摘要：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都有各国政府的引导与支持。美国也在互联网产业进行了大量布局。具体而言，包括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发布国家政策，推动企业在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等方面确立技术标准，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慧城市、物联网等互联网相关领域加大投入。美国还建立了一个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这对我国促进互联网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互联网产业　大数据　云计算　战略布局

作者简介：李　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度。然而，互联网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在其高速发展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这也是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经济展望 2015》报告，34 个 OECD 国家中有 27 个都制定了国家信息化战略，美国也有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布局，由来已久。早在 1993 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伊始，即授权时任商务部长罗恩·布朗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该小组协助克林顿制订了举世闻名的“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计划”（NII），即众所周知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在政府引导下，成为了全球的翘楚。金融危机发生

之后，美国更是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摆脱危机的重要产业机遇，政府对其引导与支持的力度更大。本文旨在通过对近年来美国互联网经济方面的战略布局以及政策发展趋势的研究，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现状

美国是全球互联网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截至 2015 年，美国网民达到 3 亿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全部居民（3.25 亿人）的比例高达 92%。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45%，美国网民占世界网民的 9.58%，互联网普及率是全球的 2 倍多。美国正在致力于提高网络普及率，在“2015 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中，美国政府承诺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到 2018 年 99%的学生将用上高速宽带。2007—2015 年，美国 B2C（企业对消费者）的销售额从 1360.2 亿美元提高至 3600 亿美元。

美国互联网活跃用户数为 2.8 亿，普及率达 87%；移动电话注册用户为 3.29 亿，手机渗透率 103%，其中预付费用户占 24%，后付费用户占 76%。美国个人计算机（PC）或者平板计算机（Tablet）的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 4.5 个小时，移动电话用户每天上网 2.5 个小时。美国智能手机约有 1.9 亿部，普及率达 77%左右。

2013 年美国零售总额达到 4.53 万亿美元，上涨 16.9%，而电商是其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据电子市场分析公司（eMarketer）估算，2014 年零售总额进一步增长 4.4%达到 4.732 万亿；而电商销售额增长更快，美国零售电商销售额在 2014 年会增长 15.5%，从 2013 年的 2633 亿美元达到 3041 亿美元。据费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估计，美国网络零售总额将于 2015 年达到 3340 亿美元，并将于 2019 年增至 4800 亿美元

截至 2014 年，美国互联网产业总产值达 9662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与金融危机前相比，互联网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几乎上升一倍。这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带领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深渊。美国互联网产业领域的企业数量繁多，既有全球知名、行业地位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互联网大企业，包括苹果、谷歌、脸书、推特；也有为互联网提供各类基础技术服务的大企业，如 IBM、微软；还有众多依托互联网进行创新的新兴商业模式企业，如分享出行领域的优步、房屋分享领域的空中食宿、市值高居全球第一的 B2C 零售商亚马逊、C2C（个人对个人）零售领域的易趣、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借贷俱乐部、视觉社交网站拼趣、全球知名的网络旅游公司亿客行、在线职场服务公司领英；美国也有很多以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而闻名的创业企业，如大数据领域的数据狗、罗客、斯普那克、天睿等。在 2015 年全球互联网企业前 10 名中，美国占据了 6 席；在前 20 名中，美国占据了 12 席（参见表 1）。

表 1　2015 年全球市值最高的 20 家互联网企业

名次	公司名称	国家	2015 年营业收入（10 亿美元）	主要经营领域
1	苹果	美国	235	移动通讯设备
2	谷歌（Alphabet）	美国	75	网络搜索服务
3	亚马逊	美国	107	B2C 网络零售
4	脸书	美国	18	社交网络
5	腾讯	中国	16	社交网络
6	阿里巴巴	中国	15	网络零售服务
7	价格在线	美国	9	在线旅游服务
8	优步	美国	N. A	汽车共享服务
9	百度	中国	10	网络搜索服务
10	蚂蚁金服	中国	N. A	互联网金融
11	营销力	美国	7	营销服务
12	小米	中国	N. A	移动通讯设备
13	贝宝	美国	9	网络支付
14	奈飞	美国	7	网络视频/娱乐
15	雅虎	美国	5	门户网站、网络搜索
16	京东	中国	28	网络零售
17	易趣	美国	9	网络零售服务
18	空中食宿	美国	N. A	房屋分享
19	日本雅虎	日本	5	门户网站、网络搜索
20	滴滴出行	中国	N. A	汽车共享服务

资料来源：盈华凯鹏（KPCB，Mary Meeker，2016）。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信息社会测评课题组发布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6》，2016 年全球信息社会指数（ISI）为 0.5601，美国为 0.8455，综合排名全球第 11 位；但在信息经济指数方面，美国为 0.8749，排名全球第 4（前三名为日本、以色列、丹麦），远高于综合得分排名。这说明美国在信息经济方面已形成较大发展优势。

在互联网前沿技术方面，美国也位居全球前列，并已在核心领域及关键领域形成专利体系。2015 年，IBM 共申请了 7355 项专利，连续 23 年蝉联专利冠军。其他互联网企业，如高通、谷歌、英特尔、微软等，也进入了专利申请的前 10 名。同年，IBM和高通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也均超过 1 万件，进入中国专利申请的前 10 名。这些企业持有数万项互联网方面的专利。以现在热门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领域而言，美国均已掌握了关键核心领域，并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掌握这些领域的发展制高点。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 2015 年“全球创新百强”名单中，有 12 家美国公司。该机

构发布的《2016 全球创新报告》指出，在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前 10 名最具影响力科研机构（2005—2015 年），美国独占 5 席；在全球通讯领域前 10 名最具影响力科研机构（2005—2015 年），美国占据 9 个席位，前三名分别是莱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成为跻身前 10 名的唯一一家非美国学术机构。

美国也是全球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扩散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互联网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如网络零售、在线旅游、分享经济等，均源于美国。目前，在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城市建设、智能电网、智慧交通等领域，美国都有其独特之处。① 以分享经济为例，2014 年美国分享经济渗透率仅为 19%（普华永道，2015），2015 年美国的分享经济渗透率则达到 46%（其中 23%尝试短期租赁服务，28%选择拼车方式出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快速扩散，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战略布局

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美国一向都是超前在战略性领域进行布局，并引领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从政府引导与支持的视角看，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布局都倾向于支持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市场开发则交由企业自主完成。

（一）在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战略举措

云计算是互联网领域的一个重要创新。正如汤森路透《2016 全球创新报告》指出的，“云是推动信息技术向前发展的另一项创新。预计在未来两年，至少将有 50%的信息技术（IT）预算投入到云建设，并且到 2020 年，将有 60% 的 IT 基础架构开销以及60%～70%的软件、服务和技术开销将投入到云建设当中”。而美国政府及企业在云计算概念刚兴起不久，就开始在云计算方面进行战略布局。2009 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启动云计算相关工作，成立了云计算工作组，发布了以《联邦云计算发展战略》为核心的政策体系。2010 年 12 月，美国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威维克·昆德拉发布了《改革联邦信息技术管理的 25 点实施计划》，提出联邦政府 IT 项目要转向“云优先政策”；2011 年 2 月又发布了《联邦云计算战略》。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在云计算上的投入稳步增长，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90 亿美元。在云计算标准领域，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已经发布了《SP 500－291 云计算标准路线图》《SP 500－292 云计算参考架构》等多项特殊出版物及草案，其中云计算定义和参考架构已被业界广泛接受。NIST 还发布

①例如，美国智慧城市总体创建质量和基数均领先世界。美国智慧社区（ICF）2006 年逐年评选 21 个智慧城市，截至 2015 年，其中 51 个来自美国（占总量 210 个的 24.3%）。

了《SP 500－299 NIST 云计算安全参考框架（NCC－SRA）》，成为业界的一个重要标准。2014 年 10 月，NIST 发布《美国政府云计算技术路线图》（包括卷一《关于美国政府机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的优先级需求》、卷二《对云计算使用者的信息导引》），综合运用美国在政府、工业、学术和标准开发组织等优势与资源，支持推动云计算技术创新。在云计算服务方面，亚马逊云服务（AWS）成为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供者。而 IBM、微软、思爱普等企业，在云计算方面均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服务。

美国对大数据领域也进行了超前布局。2009 年时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大数据”战略，并推出 Data. gov 大数据平台，依照原始数据、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个门类，公布了大量数据，并汇集了 1000 多个应用程序和软件工具、100 多个手机应用插件。美国政府还成立了“数字服务创新中心”，开发了 Sites. USA. Gov 网站来帮助各机构建设即插即用型网站，出台移动应用程序开发项目，帮助各机构对移动应用程序进行规划、测试、开发和发布。2012 年，美国政府推出了“大数据计划”，并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在大数据领域出现了非常多的创新企业，使美国在大数据方面获得了领先地位。2014 年，美国总统办公室发布了名为《大数据：抓住机遇、保存价值》的大数据白皮书，提出了大数据发展的一系列政策。2016 年 5 月 23 日，又发布了《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对 2012 年大数据计划进行更新与补充。在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产生了诸多有着核心技术的数据科技公司，如数据狗、罗客。

（二）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与能源互联网等互联网应用领域发展

自 2009 年开始，美国提出以“先进制造战略”为基础的“再制造化”战略。与德国相似，美国也强调互联网以及智能技术等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特别是通过软件重新对机器进行改造，即软件定义机器（SDM）。2012 年通用电气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并于 2014 年主导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①] IIC 致力于通过制定通用标准，打破技术壁垒，利用互联网激活传统工业过程，更好地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2015 年初 IIC 发布《迈出工程化第一步》，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总体参考架构。目前，正在加快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2.0、工业互联网网络连接参考架构技术、动态组合和协同技术报告、产业分析框架文档、分布式数据管理和互操作参考架构等研究与报告编制。截至 2016 年 8 月，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案例已有 40 个，其中 25 个通过审核，15 个处于待审状态。

①截至 2016 年 6 月，IIC 已有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50 余家成员单位，其中 2015 年就新增成员单位 150 家。

美国还在能源互联网方面进行了大量布局。与中国国家电网以特高压为核心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不同的是，美国的能源互联网在能源控制技术、能源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已有大量技术储备。在能源互联网基础应用方面，2009 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经济复兴计划进度报告》，指出 3 年内为 4000 万家庭安装智能电表，并投资约 40 亿美元推动智能电网建设，该项目被列为绿色经济振兴计划的关键性措施之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中心在 2008 年仿照网络路由器技术，给出了能源路由器的定义并开展了原型实现，运用电力电子技术达成控制变压器的目的，应用通信技术促成路由器间的对等交互，将能源互联网理念应用于配电网。之后，美国还设计了能够在商业建筑的电力电子设备与精简型汽车锂离子电池连起来的智能电池，实现来回切换为楼宇供电和电网充电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基于这一理论，美国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计划 FREEDM，其架构是在电力电子、高速数字通信和分布控制技术的支撑下，建立具有智慧功能的革命性电网构架，吸纳大量分布式能源。其与现有电网的不同在于：传统电网中电能的流向是单向的，即只能由发电厂流向用户；而在 FREEDM 中，电能的流动是多向的，它是一个能源互联网，每个电力用户既是能源的消费者，也是能源的供应者，且用户可以将分布式能源产生的多余电能卖回给电力公司。其目标是通过综合控制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各环节，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兼容，最终实现即插即发、即插即用、即插即储。通过综合控制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各环节，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兼容。美国能源互联网还强调直接为用户服务，让用户感知互联网的力量，例如欧珀能源大数据公司通过软件对公用事业企业的能源数据以及其他第三方数据进行挖掘，为用户提供一整套适合于其生活方式的节能建议。①

（三）重视互联网相关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除了互联网的直接应用之外，美国还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慧城市、物联网等互联网相关领域加大投入，抢占先机。

人工智能一直是美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在该领域，美国已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美国的 Alphabet 公司（谷歌的母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自动翻译、机器推理等诸多方面处于业界领导者地位。美国还强调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在机器人领域有其专业优势，例如谷歌还专注于研发医疗、辅助、仿人、工业、机械手、移动机器人，其旗下的谷歌－埃蒂孔和泰坦医疗都是业内的领先机构。物流领域的菲契机器人、洛克斯机器人、艾曼机器人在物流智能化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亚马逊公司将机器人在物

①秦海岩：《中国构建能源互联网助推能源革命》，《中国能源报》2016 年 3 月 9 日。

流领域的应用推到了极致。美国《机器人商业评论》（RBR）2016 年公布的最值得关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50 家机器人行业名单，即“RBR50 名单”中，美国公司占据了 24 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初创企业。

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2008 年 11 月 IBM 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并于 2009 年 1 月向美国政府正式建议投资建设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此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以爱荷华州为代表的 50 个州均先后启动智慧城市计划，在智慧照明、智慧电网、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领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而智能设备互联网协议联盟、公用事业智能网络接入端口组织等也为智慧城市的标准、接口技术等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成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起“大数据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获得了有关基金的支持。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智慧城市行动倡议”，包括 4 个关键战略：（1）推广物联网和智能应用；（2）助推民间科技运动，鼓励跨城市合作；（3）利用联邦政府现有政策和资源，重新组合并聚焦智慧城市；（4）促进国际合作，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将作为提供未来全球城市化 90%以上增长空间的重要标的。

三、美国互联网经济的政策特点与趋势

在互联网经济方面，美国政府对政策引导特别重视，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

（一）设立专门机构或职位推进互联网经济发展

美国一直将互联网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础。基于这一理念，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美国在政府部门内新设了很多专门机构或职位，以推进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美国电子商务出现不久，美国政府为电子商务设立了一个协调机构，即 1996 年底成立的跨部门电子商务管理协调机构——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该机构后来成为电子商务发展政策的一个主导部门。同时，针对互联网发展的安全、标准等问题，1996 年发布的《克林格－科恩法》（《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规定在政府内部设立首席信息官（CIO）职位。而奥巴马上台之后，高度重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陆续设立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首席数据官等新职位。首席信息官主要职责是制定与政府信息技术有关的政策和战略规划、负责联邦政府所有科技预算的分配与使用、帮助促进总统的技术政策议程等。

在互联网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美国也设计了相应的机构。例如，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都有专门的机构。在物联网方面，2016 年美国设立了“物联网”商业局，并依据“物联网的发展创新与成长行动”设立了工作组，旨在向国会提出如何推动物联网技术在美国的普及以及与产业领军企业进行合作的相关建议。在工业互联网

方面，提出了“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截至 2015 年 9 月，已经建立“美国制造”“电力美国”“美国制造业集成光子学研究所”等 7 大“制造创新机构”，另外两大机构也在建设之中。2016 年 10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的报告，该报告提议建立一个类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构，支撑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工智能研究及应用。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美国更是不遗余力，在 2015 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设立“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以允许美国政府和企业在科技、金融、能源与医疗行业之间共享威胁情报信息。在议会内部，设立了“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这些专门机构或职位的设立，有利于政府站在技术、经济、社会的视角，对互联网发展进行谋划与支持，其所提出的政策也更具前瞻性与适用性。

（二）抢抓前沿、超前布局

在互联网经济方面，政府出台政策强调抢抓前沿、超前布局，在技术进步刚出现一些苗头时，美国政府就会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并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其发展。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电子商务刚刚在美国出现时，美国就于 1996 年下半年颁布了有关“全球电子商务选择税收政策”白皮书，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进行明确；1997 年 7 月，美国颁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这是一个在全球都具有示范性与引领性的政策性文件，对全球电子商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大数据领域，美国于 2009 年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并于 2012 年将大数据确定为国家战略。到 2014 年时，美国政府注意到大数据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民隐私等，白宫行政办公室与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联合发布报告《大数据：抓住机遇，保护价值》与《大数据和隐私：技术视角》，对大数据与隐私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政策框架。2016 年 5 月，白宫又发布了《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报告，指出了大数据开发利用方面的七大战略，为美国大数据产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方向。这些政策有利于美国在大数据产业方面走在全球的最前沿。在云计算方面，美国联邦信息委员会于 2009 年 9 月推出了“联邦政府云计算发展计划”，是全球最早的政府云计算计划之一，体现了美国在云计算领域的超前布局。在人工智能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成为了一种潮流，美国政府开始推出相关的战略安排。2016 年 10 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下属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发布了两份重要报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这两份报告指明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美国保持在该领域的前沿地位起到支撑作用。

（三）需求推进、率先示范

在促进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更多强调需求的拉动作用。这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通过各类政策措施刺激市场需求，以及政府直接采购。

以大数据为例，美国联邦政府率先提出“数据是一项有价值的国家资本，应对公众开放，而不是把其禁锢在政府体制内”的理念。基于这一理念，奥巴马政府签署了《透明和开放的政府》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公开数据计划，在健康、能源、气候、教育、金融、公共安全等领域开放数据和信息。2015 年版《美国创新战略》[①] 明确提出“利用公开联邦数据为创新者提供服务”。这些数据和信息的开放，使普通百姓产生对大数据服务的需求，使大数据产业有了发展的基础。2013 年 11 月 12 日，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计划（NITRD）发布大量大数据合作项目，以推动大数据在各个领域的应用。2009—2014 年，美国政府共投入 220 亿美元用于对医疗保健大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开发和利用，这些开支也增加了大数据领域的需求。目前，基于 Data. gov 的数据，产生大量的数据服务需求与供给，成为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云计算领域，2010 年《改革联邦政府 IT 管理的 25 条实施计划》明确提出“云优先”政策。该政策要求率先将政府的各项数据服务迁移至云计算服务上，为云计算带来了需求。2011 年 2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联邦云计算战略》，要求全面落实“云优先”政策，实现政府向云上迁移。而之后，为了监督政府云计算的进程，美国审计署（GAO）还于 2014 年对有关政府部门云服务采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以督促云计算战略的实施。

在人工智能领域，政府需求也是一个发展的动力。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梅克伦堡市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提供预测分析来帮助为审前释放的决策提供信息，这是“数据驱动司法倡议”[②] 的一个部分。

在虚拟现实等领域，政府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美国白宫的科技顾问正在研究如何将虚拟现实应用到教育领域，他们正着手资助基于该技术的一系列三维全景教育项目。在科普方面，也强调了虚拟现实项目的意义。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的《2006—2011 财年战略规划》指出，要“吸引更多公众了解当前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通过互动式和沉浸式的体验激起公众的兴趣，提升公众的科技素养”。

（四）包容创新、适度监管

互联网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这些新技术与新模式对传统的监管框架提出了挑战。在此方面，美国强调是包容创新，先发展后监管。

在电子商务刚出现之时，联邦政府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中就提出，“政府应该避

①此版用于取代 2009 年发布并于 2011 年更新的旧版《美国创新战略》。

②The White House. Call to Action：Data－Driven Justice Initiative，Disrupting Cycle of Incarceration，https：//www. whitehouse. gov/datadrivenjustice.

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买卖双方在通过因特网进行产品或者服务买卖并达成合法协议的过程中，尽可能将政府的参与或干预最小化。政府将严格控制对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商务活动制定新的以及不必要的规定，简化政府办事程序或者避免征收新的税收和关税”。

在大数据兴起时，美国率先提出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开放数据法案》《开放政府合作伙伴——美国第二次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开放数据政策——将信息作为资产管理备忘录》《政府信息默认为开放和机器可读的行政命令》等法律或行政命令，推进数据开放，鼓励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针对互联网大数据出现的一系列安全、隐私等问题，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案》《联邦信息安全管理修正法案》《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等相关法律，对大数据使用进行监管。2015 年版《美国创新战略》也指出，为确保关键数字网络的安全，美国政府将制定全面的策略以加强政府的防御，同时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共享。此外，美国将继续保持网络中立，保证互联网环境的开放。在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的创新平台的同时，建立监管完善的网络机制。

在人工智能领域，涉及大量社会、经济、伦理、政治、法律等相关议题，有些议题还富有争议性。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政府的总体思路是先发展后监管。例如，美国政府对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并不急于监管，尤其是一些研发领域，更是强调先投资发展，成熟之后再进行监管。更倾向于在人工智能应用较超前的汽车业、航空业和金融领域制订必要的监管细则。奥巴马接受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的专访时明确指出，“在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阶段，监管框架应当百花齐放。政府要尽量少地进行干预，更多地投资于科研，确保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转化。随着技术的开发和成熟，我们要考虑如何将其纳入现有监管框架中。这是个更难的问题，而政府需要更多参与。我们并不总是要让新技术去适应现存监管框架，而是确保监管符合更广泛的价值”。在自动驾驶领域，美国政府也倾向于研发机构先进行技术研发，再根据技术发展制定配套的相关方案，为车辆留出测试空间，以此积累更多的安全行驶案例。目前，已有个别州/市鼓励自动驾驶，包括加州的山景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等。而从美国监管当局看，倾向于对自动驾驶采取弹性监管，即允许同时发展多种方式解决自动驾驶难题。在自动驾驶与分享经济（如汽车分享）融合方面，政策上虽有波折，但整体呈现宽容的趋势。

（五）政府发布大量指导性、前瞻性文件

除了各种政策措施之外，美国政府还在互联网领域发布了大量的指导性与前瞻性文件。这些文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或作用：第一，提示行业发展方向与前沿；第二，提出行业发展可能存在的风险；第三，提出一些有待讨论的问题。

2009 年 1 月，IBM 与美国智库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共同向奥巴马政

府提交了《通往复苏的数字化之路：创造就业、提升生产率及复兴美国的刺激计划》，该文件虽然不是官方出具的报告，但对美国之后的互联网经济政策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成为美国新一代互联网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文件。2014 年 5 月，《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报告对大数据可能引起的隐私问题、歧视问题、信息安全与信息版权等，都进行了剖析，建议要使用大数据保护公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2016 年 5 月，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报告《大风险、大机遇：大数据和公民权利的交集》提出，要警惕大数据对个体公民带来的偏见和歧视，尤其是自动化程序决策可能带来的偏见与歧视，要通过合理运用，使大数据成为克服长期存在的偏见和铲除歧视的工具。2016 年 7 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国家战略计算计划（NSCI）战略规划》，宣布了美国保持在高性能计算（HPC）领域领先地位的决心，并使之能够广泛用于改善政府服务。2016 年 12 月，奥巴马的科学和经济顾问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提出了人工智能有可能带来的就业风险，以及收入不平等。

除了发布文件之外，政府部门还会推动一些竞赛性质的活动，使互联网前沿技术更受关注。从 2004 年开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经举办了数个长距离的无人驾驶汽车比赛。这些比赛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网络安全领域，DARPA 举办了一个网络挑战大赛，寻求自动化网络防御方案，以开发无需人工干预就可以发现、证实并实时解决软件漏洞的机器。

四、美国在互联网产业布局及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从总体上看，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布局更多强调将互联网的已有成果及技术应用到更多领域，并为推进这种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产业方面的布局，这对我国互联网产业加快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通过推广应用与研发之间的互动，推动技术持续进步，使互联网产业能够保持持续的活力与强大的竞争力。与我国互联网企业主要强调消费级应用不同，美国的互联网在推广应用与研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由于强调面向消费者的战略应用，重点是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我国的互联网企业虽然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而快速成长，并出现了一些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

第二，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并重，通过技术创新引领商业模式创新。美国是全球商业模式创新的策源地，在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社交网站等诸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都引领了全球风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商业模式创新更多以底层技术创新为基础，如优步的底层基础技术是利用大数据进行更完善的交通规划。可以

预期，在美国处于布局前期的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等领域，未来将涌现一大批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而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通过对国外商业模式创新的模仿，以营销手段拓展市场，依赖于市场规模效应，实现快速成长。

第三，在上下游领域快速拓展，形成持续创新与发展的能力。美国将互联网视为一种通用技术，强调将互联网应用于各个领域，发挥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互联网的上下游领域，美国都进行了深度布局，使互联网的整体效应能够更好地发挥。

参考文献：

1. 乔健：《美国大数据政策的发展趋势》，《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6 年第 5 期。

2. ［美］杰森·福尔曼：《美国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浪潮》，《机器之心》2016 年 7 月 14 日。

3.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信息社会测评课题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6》，2016 年。

4. 韩金伶：《美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

5. NSTC.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Digital Data for Scienceand Society, https://www.loc.gov/item/2010484159/, 2009.

6. EOP. 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https://wilsoncommonslab.org/2014/05/05/big-data-seizing-opportunities-preserving-values/, May 5, 2014.

7. PCAST. Big Data and Privacy: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ttp://csrc.nist.gov/groups/SMA/ispab/documents/minutes/2014-06/ispab_jun2014_big-data-privacy_blumenthal.pdf, June 2014.

8. OECD. 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2015,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9789264232440-sum-en.pdf?expires=1437263677&id=id&accname=guest&checksum=377E7F21D8E76B38A039BA6783DC8882, July 2015.

9. NSTC.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05/03/preparing-future-artificial-intelligence, May 3, 2016.

10. The White House. Big Risks, Big Opportunities: the Intersection of Big Data and Civil Right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05/04/big-risks-big-opportunities-intersection-big-data-and-civil-rights, May 4, 2016.

11. NSTC.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https://www.nitrd.gov/news/national_ai_rd_strategic_plan.aspx, October 2016. 12. OST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12/20/artificial-intelligence-automation-and-economy, Dec 2016.

责任编辑：李　蕊

融资支撑助力国际产能合作的对策研究

张继栋

摘要：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需要高效、便利、稳定、持续、多元化和全方位的融资服务。目前金融机构在拓展海外布局、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亟需在传统融资支持的基础上，深化金融资源配置，形成融资支撑合力，调整融资产品结构，提升融资服务质量，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完善融资保障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支持。

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　融资　商业银行

作者简介：张继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咨询研究员、博士后。

国际产能合作是由中国制造向全球金融服务、国际人才培养、行业标准推广、知识产权布局的开放合作。两年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初见成效，呈现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竞争向合作转变、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硬基础向软实力转变的良好态势。国际产能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不断深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未来将更加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以促进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增添新动能，为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一、融资支撑重要性

（一）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亟需高效率、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金融机构和政策的支持可以帮助企业破除海外市场壁垒和融资瓶颈，降低企业跨国

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持续推动优秀企业走出去，发挥示范效应。高效的融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较低的利率和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广泛的融资业务种类，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多样化融资需求；三是密集的全球化经营网络，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随时随地的融资服务。国内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尚存不足。首先是银行贷款、信保费率普遍偏高，企业风险准备金负担较重以及费率调整不够灵活及时等。国内政策性金融保险机构受资金来源、管理机制以及营收业绩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虽加大了费率调整的力度和频度，但无论贷款利率还是信保费率，在费率的调整上仍不够及时灵活。在一些重点国别市场风险降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走强的情况下，国内政策性金融保险机构为企业提供的融资方案综合费率偏高，政策性导向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其次是业务种类相对不足。融资类保函、非融资类保函、福费廷、结构性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业务开展严重不足。最后是境外经营网络不完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经营网点更为缺乏，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也不够深入。

（二）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亟需稳定性、持续性的金融服务

企业“走出去”是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金融机构提供从项目初期论证开始的“跟踪式”长期服务是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必要条件。但当前国内金融机构尚缺乏“早期介入”的意识，这虽然有助于金融机构规避项目的早期风险，但对于企业的“走出去”活动和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整体利益具有负面的影响。在很多海外项目开发过程中，项目业主往往会要求中方先落实资金，才能进入合同签约、审批阶段，但按照目前国内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工作流程，通常只有在工程总承包（EPC）合同签字并通过审核后才会出具承保意向函并明确最终的保费费率、承保期限等具体承保条件。这使得企业在项目跟进阶段难以确定信保费用和承保期限，有的企业因缺乏对融资成本的统筹考虑，出现合同签约后由于融资审批程序尚未完成而无法履约或成本发生较大变化而难以实现预期利润，甚至出现个别企业在竞标时以低成本融资为条件恶意压价，在合同签约后倒逼政府、银行和信保审批的情况。

（三）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亟需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外，技术转移、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专业服务提供等规模也日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规模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就提高了对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需求。以项目融资为例。当前，我国企业在项目融资上仍以传统的出口买方信贷融资模式为主。出口买方信贷一般要求借款国提供主权担保或由类似性质的当地重要国有企业担保，同时对预

付款比例有强制要求。但近年来，项目业主国，特别是在部分新兴市场和一些中高端市场，政府能够提供主权担保的项目很有限，各政府对提供主权担保的态度也愈发谨慎，企业获取主权担保的难度增大。此外，随着公私合作（PPP）、建设—经营—转让（BOT）等新项目融资方式的逐步应用，项目融资借贷主体更加多元，在融资方式上业主更多希望以项目自身资产或未来营收作为担保方式，但目前国内主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主权担保以外的境外项目融资方式不多，也缺乏与新的项目融资方式配套的评审机制和管理体系，导致我国企业在参与境外优质私人业主项目时，推进融资面临较多实际困难。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仅能够降低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境外项目的风险，例如通过海外投资保险降低政治和社会风险，通过远期外汇业务降低汇率风险，通过保理、福费廷和结构性贸易融资等降低信用风险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仅要求国内金融机构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融资业务与工具，而且要求在融资业务提供的地点上，尽量扩大境外经营网点的建设，对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跟随式”的服务。

二、融资支撑的现状

（一）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依然显著，但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等因素掣肘明显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撑企业“走出去”融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截至 2016 年 6 月末，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贷款余额 5600 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有贷款余额的项目 1200 余个，分布于 50 个沿线国家。2014 年—2016 年 7 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签约近 1000 个项目，累计签约金额近 6000 亿人民币，累计放款金额为 4300 多亿元人民币。中信保在 2015 年—2016 年 7 月累计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 1700 多亿美元。其中，支持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项目 140 多个，承保金额近 300 亿美元；支持大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 180 多个，承保金额 370 多亿美元。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坚实的官方支持背景，在项目早期介入项目论证、建设过程，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获得外国政府、企业和业主的信任，帮助企业成功开拓海外市场、赢得项目，在支持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但国别风险大、“两优”贷款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海外分支机构严重不足和风险补偿机制缺位等问题也日益显著。

（二）商业性金融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但综合服务能力和项目把控水平仍待提高

商业性金融利用其网点多、机制灵活、资金充沛、产品丰富等比较优势不断支持企业参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截至 2016 年 6 月底，中国农业银行累计为 314 家客户办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走出去”业务，涉及 4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行业包

括农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制造业、能源资源合作等。2016 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全辖境内外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授信新投放超过 174 亿美元。其中，境内外机构向沿线国家公司贷款新投放约 94 亿美元，沿线机构累计新开立信用证及保函超过 41 亿美元，境内机构对沿线国家累计新开立保函约 39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 7 月，中国银行“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库共跟进“一带一路”区域重点项目约 392 个，总投资额约 3729 亿美元，其中中行意向性支持金额超过 826 亿美元，签约金额约 164 亿美元，累计投放约 88 亿美元，贷款余额约 69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工商银行支持境外“一带一路”项目 239 个，承贷总金额约 621 亿美元，业务遍及亚、非、欧三大洲 33 个国家，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重点行业。然而，目前商业银行也面临产业政策不熟悉、项目跟踪不到位、跨境服务能力跟不上，综合服务水平亟待提升等现象。在参与或服务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国际融资项目时，企业和银行不只是关心融资成本，更多的是关注交易风险和项目运营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如何鉴别、规避和应对项目周期内的综合性风险，是未来商业银行体现专业性的核心点。

（三）内保外贷等业务为企业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撑，但在企业授信和保函认可度上还有待提升

“内保外贷”只需银行出具融资性保函，无需事先获得外汇局审批，极大的提升了企业境外分支机构的融资便利性。除此之外，境外筹资转贷、对外直接投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品种多样的跨境资金融通工具为“走出去”企业和中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选择。比较而言，目前的业务模式不仅操作简便，而且贷款币种多样，如当前国内银行提供的“内保外贷”币种涵盖了美元、日元、欧元、港币、英镑和人民币等多种货币。国内银行通过境外人民币贸易融资满足境内重点优质客户的融资需求，从而腾出国内人民币信贷和外债规模，加大对议价能力较弱客户的支持，实现“腾笼换鸟”，扩大了信贷规模。但是“内保外贷”等业务的推广也存在几点问题。一是“内保外贷”占用国内企业的授信，限制了国内企业采用的积极性；二是国内银行海外网点数量不足限制了内保外贷在全球的开展；三是国内银行开具的保函在境外的认可度有待提高，这限制了国内银行和国外银行之间的深入合作。

（四）出口信贷仍是装备制造企业融资规模最大、适用范围最广的渠道

国内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可利用的出口信贷支持主要有资本性货物出口信贷、援外优惠贷款、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境外建厂贷款、境外承包工程贷款，以及为企业境外加工贸易出口信贷等。国内银行开始建立出口信贷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相结合的综合服务

体系，以便与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如利用政府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为企业在受援国承包工程、开发资源、投资建厂提供支持。开展国际结算、对外担保、保函、保理、咨询等中间业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国内银行还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帮助“走出去”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金，与大量外国金融机构签署贸易融资、信用证代付、风险参与或信用担保等业务合作协议，增强对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支撑。中国建设银行与中信保联合推出中信保卖贷保单/再融资保单项下出口延付合同节点融资产品，并将争取成为该项创新的试点行，进一步提升建行出口卖方信贷与出口信贷再融资产品的竞争力。

（五）发行股票或债券仍面临诸多限制，难以成为融资主要方式

通过发行债券或者股票融资的门槛已经开始降低，手续也逐步简化，但对于国内企业通过国内资本市场为境外投资项目融资还存在一定障碍。国内企业对境外分支机构的融资支持主要通过贸易信贷预收货款、延期付款进行，而且还会经常选择境外股权融资、境外债务融资和境外上市等形式进行外汇融资。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融资获得资金并不能直接用于境外分支机构的经营，而且境外分支机构也不能直接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需要进一步联通国内外资本市场，提高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便利性。

三、融资支撑的问题

（一）国内融资综合成本高，手段和方式滞后于企业“走出去”的多元化融资需求

一般性商业项目的美元贷款门槛和融资成本“绝对双高”。“一带一路”范围内的一般商业项目贷款货币多以美元为主，目前境内市场美元融资条件（融资利率）高于境外市场。由于我国自身外汇管理体制，中资银行以美元放贷需通过外管局调拨，除了原始成本，还有额外手续费用，所以相对于境外直接以美元吸储放贷的融资模式，境内美元融资成本高。同时，保险费用高导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升高。一般商业项目取得贷款，融资方需要投保中信保的中长期险，承包商需投保特别险，这两项保险与境外同类保险相比保费较高，导致企业在还本付息的成本之外，需额外支付较高的保险费用。在承保金额上，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最多只能承保贷款金额的95%，一些金融机构在安排融资方案时，要求中国企业对保险无法覆盖的5%承担担保责任，变相增加了企业的融资负担。高融资成本导致融资方负债水平升高、财务预算紧张，最终导致项目无法落地。

政府间合作项目的“两优贷款”和有主权担保的出口信贷“相对双高”。我国企业取得“两优”贷款的成本较高。由于外汇管制政策，进出口银行的美元由外汇储备机构注入，或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获得，导致美元资金成本高。当前，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许多国家经济下滑，自有资金不足，项目融资规模越来越大，现有的“两优”贷款规模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大型项目来说已是杯水车薪。另外，主权借款和担保问题一直未明确相关政策。对于没有主权担保的项目，中国的金融机构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便无法为这些项目提供服务。即使项目拥有其他担保模式如股东担保、设备担保、现金质押等，融资成本也会相应高于韩国、日本和西方的金融机构。如对于高铁、核电等我国主推的重大战略性项目，欧洲和日本的金融机构由于有政府低成本资金支持，可以提供信贷利率 1%的优惠融资方案，成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再如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合作中，我们还达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满足其贷款优惠度的最低要求，存在“双优不优”的情况等。

（二）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尚处起步阶段，与快速壮大的“走出去”企业规模难以匹配

企业在境外开展国际化经营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提供“跟随性”服务，海外机构应及时提供高效便利、持续稳定的商业信贷等服务，但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没有网点，尚未形成覆盖全球的经营网络，商业银行的海外网点明显不足，保险机构也处于布局初期。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境内银行的海外机构分布仅相当于前者的 1/3；与此同时，保险业仅在香港地区和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或并购了数量非常有限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走出去”的企业需求。在需求侧，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 12 个重点行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除了对传统贸易融资业务有巨大需求外，对于福费廷、国际保理和结构性贸易融资等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而我国票据市场不发达，交易工具种类有限，市场交易主体结构单一，应收账款可转让性的法律依据不足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国内金融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新型贸易融资产品的提供严重不足，不能很好地了解项目所在国的经济及行业等信息，对我国企业融资造成较大障碍，对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产生较大影响。

相反，日本作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积极扩张他们的海外金融布局。根据 IMF 的报告，日本前三大银行的海外贷款占其贷款总数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18%上升到 2013 年的 31%，而中国同期的数据是 6.1%和 9.2%。无论从百分比上还是从增幅上，我国海外贷款比例远远低于日本。2012—2014 年，日本银行用于设立和收购海外分支机构的投资达 83 亿美元，大面积的增设海外网点降低了日本银行的海外贷款成本，从而使得其海外贷款在短期内大幅提高。

（三）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周期长，贷款利差小、风险大，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强

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能转移和装备制造等领域，通

常项目投资周期较长、资金规模需求较大，融资成本要求还不能太高。然而，以“两优”贷款、执行三档优惠利率的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等支持国家战略性主要贷款品种为例，其利率水平普遍低于融资成本，造成的利差亏损需要依靠金融机构自营业务消化，导致银行放贷意愿降低。此外，部分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国别的投资环境仍存在一定风险，亟待海外投资保险为企业保驾护航，而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仅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行承保，国家政策层面既无“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专项风险准备，也无与业务相关的呆、坏账认定标准和核销办法。所以，中信保受自身资本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其承保额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投资总额相比，规模小、覆盖面窄。

四、融资支撑的国际经验

（一）发达的跨国金融网络与完善的保障体系发挥了良好的融资支撑作用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政府发挥了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和海外投资保险的重要作用。前者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后者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德国赫尔梅斯信贷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股份公司等。

1．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主要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支持：（1）流动资金担保项目，帮助美出口商获得为参与投标、改进产品及支付外国合同定金等出口前所需的流动资金；（2）出口信贷保险项目，为美出口商因外国买方或债务人出于政治或商业原因不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提供担保；（3）中长期信贷保证项目，通过为贷款银行提供保证来帮助外国买方获得信贷；（4）中长期贷款项目，向购买美国产品的外国买方提供买方信贷；（5）信贷保证便利措施项目，按照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以外国银行为贷款对象，为美信贷方与其债务人之间建立以一年为期限的、最低便利额度为100万美元的信贷担保额度，使美国的出口方能多次销售其资本货物及服务；（6）项目融资项目，提供以有限追索权为基础的项目融资，以支持美国出口商参与国际竞争等。

日本成立于1950年的日本进出口银行在为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直接资金支持方面最具有代表性，其职能包括：（1）为日本企业在国外企业中参股投资提供贷款；（2）为日本企业对外国政府或企业提供贷款而给予贷款支持，并为企业在日本境外进行风险经营提供长期资金；（3）为日本企业向欲参股日本持股企业的外国政府或企业提供贷款准备金，为日本企业参股设立在日本境内的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贷款；（4）为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项目所需资金提供贷款等。日本还有其他政策性银行对海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日本政府支持海外投资的重要政策性融资渠道，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和海外贸易开发协会等机构主要为中

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优惠贷款。

德国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提供对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其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受财政部的直接领导，负责直接资助德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项目，为中小企业在境外投资提供各类优惠贷款；德国投资开发公司主要负责帮助德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合资项目，为其提供长期信贷担保，并对海外投资前的费用进行补贴，并以提高德国投资者参股比例、加强对技术转让的控制为目的。

2. 海外投资保险提供了有力保障。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通行制度。自美国 1948 年在实施马歇尔计划过程中创设这一制度以来，日本、法国、德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 1971 年开始运营，是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首家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是由国库拨款成立，且在美国国务院政策指导下运营的自负盈亏的联邦机构，最初仅承保货币禁兑险，后来逐渐扩大到战乱险、征收险等政治风险。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按规定条件对私人投资提供资助，主要有：（1）通过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为企业融资；（2）支持那些为美国公司投资海外项目而投入的私人投资基金；（3）为投资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政治风险提供担保；（4）尽力为美国商界提供海外投资的机会等。

日本于 1956 年继美国之后在世界上第二个创设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于 1957 年追加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1972 年 1 月创设了旨在开发海外矿物资源投资保险制度。此外，日本政府积极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以改善对外投资环境。企业对外投资需要保险时，可申请使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的本金和利益进行保险。中小企业因对外投资而从金融机构贷款时，可向各都道府县的信用保证协会申请使用“海外投资关系信用保证制度”，享受担保服务等。

德国在海外投资保险方面，财政部直属的赫尔梅斯信贷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股份公司均负责办理德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为德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政治风险与非商业风险担保。

（二）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与良好的金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支撑基础

1. 海外投资保险和双边投资协定相结合的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私人企业只有在同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申请投资保证。当投保项目所在国出现政治风险时，美国政府首先向投资者补偿其损失，然后可以根据同该资本输入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

定，取代投资者的地位，要求该资本输入国赔偿因政治风险而使投资者蒙受的损失，这种权利通常称作“代位求偿权”。它把私人的对外投资关系提高到两国政府间的高度，从而大大提高了获得经济赔偿的可能性。

2. 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是“走出去”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具备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和庞大的跨国银行经营网络，资本流入流出基本不存在管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主要通过市场自发实现。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完备、国际化程度很高，能为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需求提供多样化选择。一些跨国金融巨头如花旗、摩根大通等金融集团建立了庞大且完善的全球经营网络，将机构和服务渗透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他们紧跟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提供全方位的融资、结算、咨询、保险等金融服务。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提供中长期资金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和庞大的跨国银行经营网络则是支持“走出去”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

五、融资支撑的思路

（一）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联系合作

政策性金融机构要联合国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融通、投资银行业务、现金管理、担保、保险、资产证券化、信托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并通过提供规划咨询、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等服务，主动帮助企业做好项目策划、融资方案设计、融资风险控制等工作，提高海外投资项目的运作效率，提升我国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和产能“走出去”的综合竞争力。以银团贷款、出口信贷和股权投资等方式为抓手，为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PPP 项目等提供投资、贷款、租赁、证券等综合金融服务，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积极与海外联动开拓海外直贷、内保外贷、额度切分、协议融资、协议付款、出口通汇达等业务，全面满足“走出去”企业海内外金融服务需求。

（二）鼓励金融机构推广新型贸易融资业务

从国际产能合作重点行业的特征看，有色、建材、钢铁、电力、化工等能够带动成套机器设备和大宗商品贸易的行业产能合作迫切需要诸如福费廷、国际保理和结构性贸易融资等新型贸易融资的支撑；从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国别看，与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信用水平难以掌控的发展中伙伴国开展合作，要求银行提供更多的“风险分担型”贸易融资服务。从国际产能合作布局优化角度，要着力于构建（或重构）全球产业价值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不仅提升和巩固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引导地位，而且通过核心企业的引领作用，带领国内中小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这就要求国内

银行提供针对性更强、更加高效的供应链金融，将现有的其他融资业务与供应链融资相融合，提升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例如可以将国际保理和出口信用保险融入供应链金融。

（三）探索形成一揽子互惠合作贷款模式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安哥拉的互惠贷款合作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推广该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政府援助贷款、优惠买方贷款及互惠贷款是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扩大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式。在互惠贷款模式下，国内银行在政府框架下为相关国家提供一揽子大额贷款计划，支持当地的经济建设。互惠合作贷款能够在为企业构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增强融资支撑能力。

（四）深化非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合作

目前，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力度和积极性不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参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规模和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相对较大，而且国内金融监管规则不利于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融资和担保支持。在国内金融监管方面，要改变原有为政策性投资担保和保险机构“特事特批”的制度，通过法律手段，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业务划定特定的监管方案，实行统一的政策，促进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同时，以签订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等方式，为国内非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强有力保障。

（五）完善出口跨境融资租赁服务体系

着力发展出口跨境融资租赁是推动国内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加速国内优势产能输出的可行途径之一。当前，国内各部委和各地区推出的促进融资租赁政策多以进口融资租赁、利用境外资本为主，而在扶持国内优势产能输出上，可以尝试以推动出口跨境融资租赁为主要模式，探索从租赁机构、汇率、外汇交易、通关等各方面开展中长期规划，进一步完善出口跨境租赁体系，服务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扩大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

五、融资支撑的建议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形成金融支撑合力

加强国内外金融政策资源的统筹安排和布局，解决金融机构各自为战的现状，尽快形成金融支撑合力。发挥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互补作用，支持研究包含对外援助、

政府补贴、政策性金融、商业资本等在内的最优金融组合方案。

一是优化银行业网点的海外布局。推进中资银行海外布局向东盟、非洲南部、中东欧、拉丁美洲等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地区转移，改变以发达国家城市为聚点的现状。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国别的金融业多数不发达，更需要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商业银行要积极弥补在欠发达地区金融布局的空白，对于因战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合设立机构的国别，可以探索由政策性银行采取灵活方式介入。

二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领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要联合国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融通、投资银行业务、现金管理、担保、保险、资产证券化、信托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并可以通过提供规划咨询、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等服务，主动帮助企业做好项目策划、融资方案设计、融资风险控制等工作，提高海外投资项目的运作效率，提升我国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和产能“走出去”的综合竞争力。以银团贷款、出口信贷和股权投资等方式为抓手，为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PPP 项目等提供投资、贷款、租赁、证券等综合金融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

三是深化开发性金融的促进作用。推进以股权投资、债务融资等方式支持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东盟基金等开发性金融的作用。联合各类投资主体出资设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巴（西）产能合作基金、中欧投资基金、中法投资基金等一系列多双边产能合作基金，着重解决重大战略性项目、重点合作区域的资本金不足问题。鼓励境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走出去，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以委托贷款、定向融资等方式向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外汇资金支持，增加外汇资金来源。

四是增强商业性金融的支撑作用。加强商业银行服务境外中企的意识，鼓励商业银行丰富和扩大海外业务，逐步在境外形成覆盖面较广的服务网络。开展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鼓励商业银行拓展境外土地、房产、设备、矿权、股权抵质押创新业务，支持银行助力企业在境外投资形成的国外资产用于“外保内贷”。强化银企互动，加大商业银行诸如外汇风险对冲产品等境外投资金融产品的推广力度等。

（二）创新信用保险模式，优化保险全球布局

一是探索出口信用保险创新模式。鼓励有条件地区开展符合区域优势产能“走出去”需求的“政、银、担”合作模式，探索建立政府（省级）、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三方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实现“走出去”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融资担保风险在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之间的合理分担；

推动以省级再担保机构为平台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贷款发生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推动建立可持续银担商业合作模式。

二是优化证券保险业全球布局。“走出去”企业对保险业务的需求小于银行业，应侧重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布局，通过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网点，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球性的保险服务。鼓励我国证券保险机构与“走出去”的银行机构通过业务代理等合作模式，在我国未设证券保险机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保险服务。扩大中国出口保险信用公司的业务范围，发展企业对外履约保险、财产保险、海外劳务人员的人身保险等。

（三）构建融资保障体系，完善合作长效机制

一是构建多层次融资保障体系。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为企业对外投资与经营和跨国兼并收购活动提供本土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融资服务。发展“走出去”股权投资基金，强化“走出去”金融服务跟进、民间资本参与、政府支持的方式，建立企业“走出去”分领域、分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引导丰富的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对外投资，放开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并引入竞争机制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推进企业和金融机构境外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有效利用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促进各类海外投资基金发展壮大，努力形成层次多样、形式丰富的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体系。积极探索境外资产和股权等抵押融资，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境外股权投资基金。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对股权融资的需要，设立若干类似中非发展基金的股权投资基金，直接对国内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项目和公司进行股本投资。同时，设立对外并购基金（VC 或 PE），专门通过股权并购，在国际上获取知识产权、品牌、市场渠道和相关资源。

二是完善融资合作长效机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发展的推进力度，增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面沟通合作，构建“政府搭台，银企唱戏”的对接长效机制。加大金融市场培育力度，建设金融服务中心，打造证券、保险、基金等机构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金融服务，不断完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规范金融市场管理，加速建立征信体系，确保企业享受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便捷融资渠道和平台。加强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努力降低门槛，放宽抵押物限制，提高抵押贷款比例，延长贷款时间，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融资贷款业务特别是金融创新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加大对企业融资贷款的指导力度，帮助企业完善贷款的各项要件和前置手续，强化服务力度。

责任编辑：李　蕊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及改革趋向

刘向东

摘要：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正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中国经济存在许多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展现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特征，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增长，更多地向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更加强调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要适应、引领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变，是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市场导向的政策环境，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处理好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稳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关键词：中国经济　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创新驱动

作者简介：刘向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成就被世界誉为“中国的奇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并使经济结构①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凸显。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资本报酬递减，使投资主导的增长不可持续，由于外需萎缩和要素成本的高企使出口导向的增长不可持续，而由于投资主导和出口导向增长的不可持续，造成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由

①中国的经济结构主要涵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五个方面。因为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体现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本文不再赘述。

于消费加速升级和旧制度的僵化，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走低。经济结构向内需拉动、创新驱动和服务业主导转型，既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使然，也是中国政府主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结构性矛盾

从需求结构看，以前中国经济发展较多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但当前投资正遭遇资本报酬递减，出口正面临外需萎缩的挑战。以出口导向和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问题，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增速下行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内陆城市财富增长正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潜力，富裕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展现出与其父辈不同的消费特点，他们不再倾向于增加储蓄，而是倾向于借贷消费，且追求消费的质量。加速的消费升级造成结构性矛盾愈发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投资主导和出口导向的增长已不适应这种消费升级的需要。

（一）出口导向的增长旧动能难以为继

第一，外需疲软造成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下降。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改变过度借贷消费模式，私人储蓄率较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有所提升，私人消费出现放缓或萎缩，出口导向经济体面临外需疲软的困境。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着手增加储蓄并偿还债务，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维持在 2%左右，而 10 年之前这一增长率超过了 3%。在外需疲软情形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贡献连续下降，屡次出现负拉动情形，如 2011—2014 年上半年连续三年半时间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均为负值（见图 1），2014 年全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1.7%，远低于以往平均水平，2016 年上半年进一步转为 -10.4%。

第二，发达经济体加速吸引制造业和跨国资本回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强化劳动力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促使其制造业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3 年 8 月发布的《美国制造业重拾竞争力》显示，美国将在未来 6 年内每年从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出口大国争夺 700 亿至 1500 亿美元的制造业出口额。随着中国土地、劳工、环境等成本逐步攀升，中国境内加工的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正在减弱，开始丧失了部分低端制造业务，这部分制造业投资呈现下降态势。

第三，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面临升级压力。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出现较大波动。2012 年出口增长只有 7.9%，到 2015 年同比下降了 1.8%，远低于此前 10%以上的增速。从出口目的地看，随着发达经济体外需市场低迷，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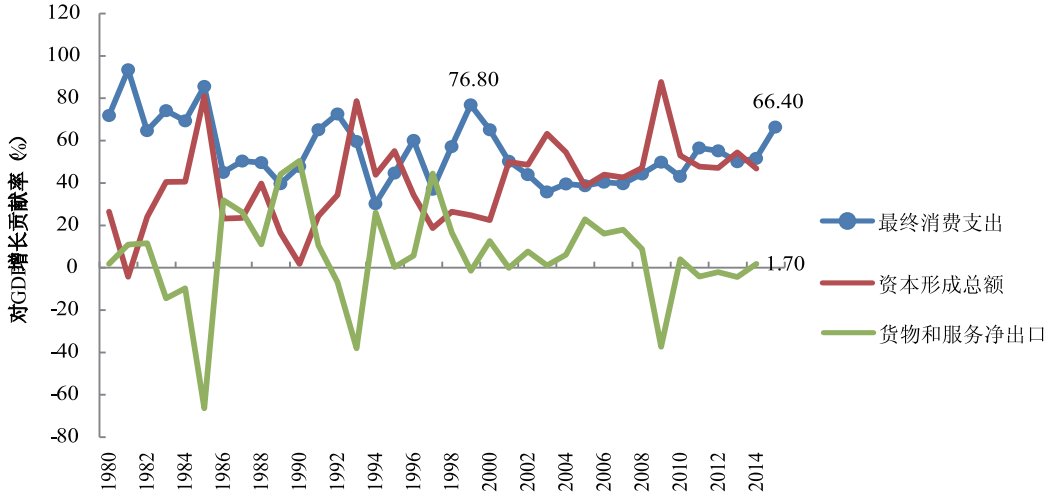


图 1　1980—2014 年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 GDP 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口增多，其中 2015 年对印度双边贸易增长 2.5%，而对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分别下降 7.2%和 9.9%，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了 10.6%。从出口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比重开始有所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比重明显上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幅提高。2012 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分别达到 57.6%和 29.3%；到 2015 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57.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已超过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速，迫使出口结构开始由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转向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第一，投资主导增长模式的弊端进一步凸显出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信贷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取得一定成效，但高投资主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往往带来难以消除的“后遗症”，诸如产能过剩、库存囤积、杠杆率高企、公共服务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逐步市场化，高投资可能因无法创造价值而趋缓，特别是由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会逐步减少，而由消费驱动的高效投资将大大增加。

第二，高投资依赖的高储蓄基础正面临瓦解。近年来，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可能会引导中国的储蓄率持续下降，到 2020 年有可能由当前的占 GDP 的 50%下降至 30%左右（接近于 23%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新一代消费者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需求会持续增加，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会渐趋走低。由

于产能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来自于储蓄，因此家庭的低储蓄率自然不再会支持高投资。

（三）产业供给能力不适应消费升级需要

第一，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普遍偏低。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意在推动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此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持续演变。在 20 世纪末之前，中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农业，无论从种植业规模还是养殖业规模，中国农业都还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均经营耕地只有 2 亩左右，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机械化水平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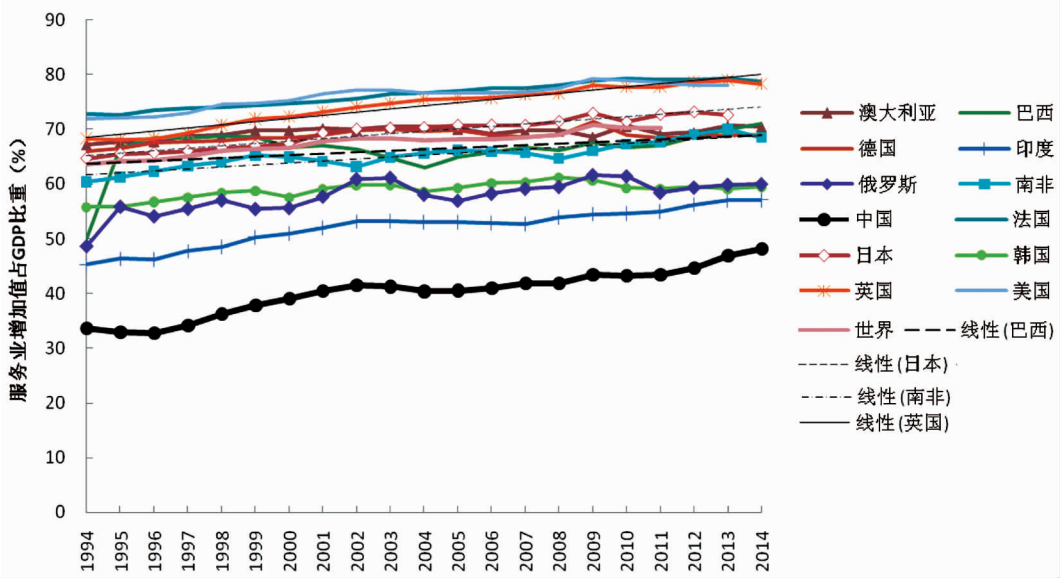


图 2　1994—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第二，中国制造面临成本高企和外需放缓双重挤压。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世界加工中心的地位。2011 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加工组装了世界 90%的个人电脑和移动电话、80%的空调、70%的太阳能面板和 65%的鞋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 40%，解决了 1.3 亿人的就业。可以说，中国现已拥有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工业产量领先，但产品附加值较低；虽然占据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的主要环节，却只能获得 10%左右的利润。20 世纪末以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萎缩、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瓶颈，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效率低下，研发和创新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等。与早已拥有市场份额和品牌忠诚度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制造企业通过规模扩张和低价销售已不能使其获得更多市场份

额，很多加工制造企业陷入困境。

第三，中国服务业供给和消费水平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从服务业增加值看，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水平（见图 2）。从消费能力看，中国服务消费水平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服务消费占比约为 35%，显著低于同等发展阶段的韩国（58%）和美国（66%）。从吸纳就业看，中国第三产业吸纳就业比重偏低，2012 年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 36%，远低于全世界 60%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 50%的平均水平。目前来看，中国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而金融、保险、通信、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仍面临严格的行政管制，市场开放程度偏低，发展水平较低。

（四）传统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

第一，持续攀升的要素成本正在蚕食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受劳动力工资成本持续上涨、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人民币估值偏高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土地成本也在迅速上涨，油、气、电、水等能源资源价格仍具有持续上涨动力，几乎所有要素投入都在上涨，高强度竞争和过剩产能使得中国企业很难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造成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部分行业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

第二，日益紧迫的环境压力迫使传统产业提高环保标准。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全国多次出现大面积雾霾和发生地下水枯竭。按照传统增长理论，经济总量基数增大意味着资源消耗更多。中国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能源资源利用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十几年前，中国就下定决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承载负担。

第三，劳动力成本高企诱发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外迁。中国劳动力成本每年以 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具有传统出口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丧失低成本优势，被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替代。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国家凭借低廉工资水平吸引全球制造企业重新选择投资目的地。近年来，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在 1000～2000 元之间，接近马来西亚等地区的工资水平，高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1～4 倍。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向东南亚国家，中国的鞋帽服装制造商也开始将工厂迁移到这些国家。

第四，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近年来，中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不到美国的 40%，也不到第二名日本的一半。世界知识产权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位列第 25 位，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列第 4、第 10 和第 16 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质量较低，在所拥有的国际专利中，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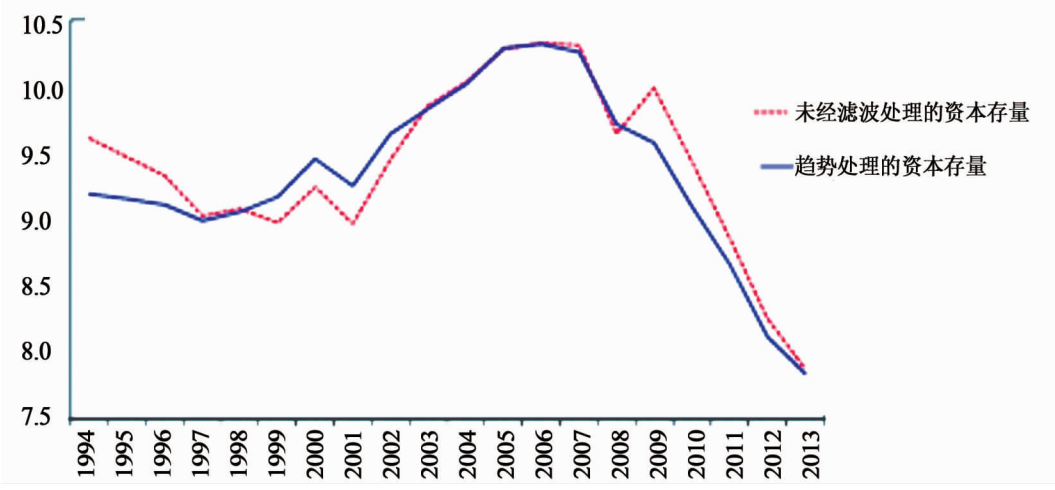


图 3　1994—2013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资料来源：Rahul Anand，Kevin C. Cheng，Sidra Rehman，and Longmei Zhang. 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IMF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4.

注：使用 HP 滤波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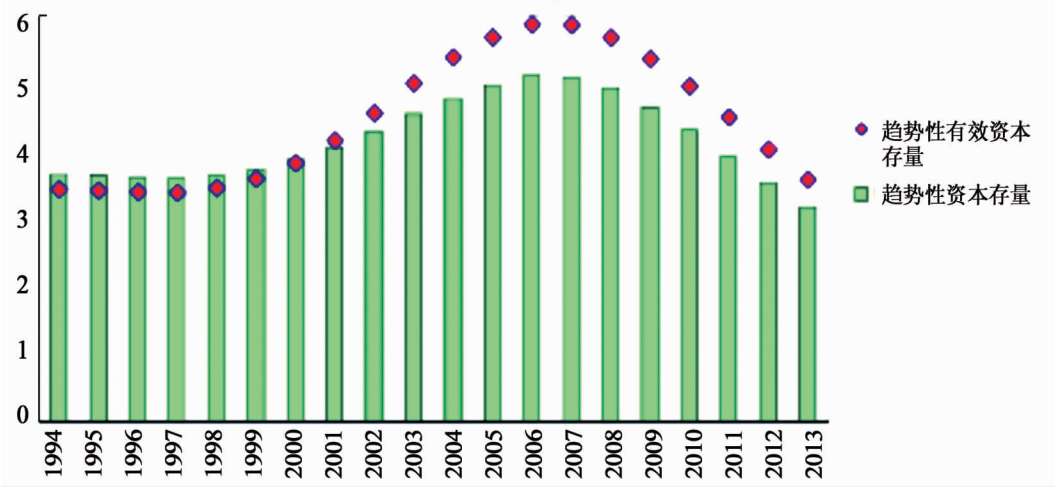


图 4　1994—2013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变化

资料来源：同上。

注：根据资本存量与产能利用率乘积而得。

第五，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过去30多年，中国劳动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7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约为30%，形成了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反的比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7年开始中国潜在的增长率已经出现下降态势（见图3）。究其原因在于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自2007年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即按潜在资本存量①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由2007年的6.0高点下降至2013年的3.0附近，并仍处在持续下降的通道之中（见图4）。2012—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其对经济增长仍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中国经济将呈现的三大结构性特征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特征。这种不同既来自于全球需求的周期性变化，也来自于国内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国内消费结构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升级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带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中产阶层消费群体日益壮大成熟，由此催生巨大的高质量消费需求，由此会带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呈现出消费和服务业主导、创新驱动的新特征。

（一）结构性特征一：消费驱动型增长逐渐占据突出位置

第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凸显出来。近年来，受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持续下滑影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相应有所提升。可以说，这是一种“水落石出”效应。② 比较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稳定的。出口与投资增速下滑使消费对GDP贡献相对提升。除2013年外，2011—201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当明显，均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见图5）。据麦肯锡2012年11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的下一站》提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实现由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和服务驱动的经济转型，其中消费将在2020年以前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到2025年个人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

第二，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维持较高水平。2004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均维持在10%以上，且继续维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中国新一代消费者已

①所谓潜在资本存量就是指一国经济活动中每年的潜在资金使用量，通常用资本形成率指标计算每年的新增资本存量，在根据事先确定好的基期资本存量水平推算得到历年的潜在资本存量。潜在资本存量是估算潜在增长率的主要指标之一。

②这里水落石出效应是指当原来跑得较快的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时，原来保持平稳的消费这驾马车就会凸现出来。可以说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基石。

不再像其上一代那样偏好储蓄，更偏好分期付款的借贷消费者增多，尤其倾向于通过按揭借贷实现对住房和汽车的拥有。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并不低。2011 年以来，中国消费支出年增长率均高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保持着领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的趋势（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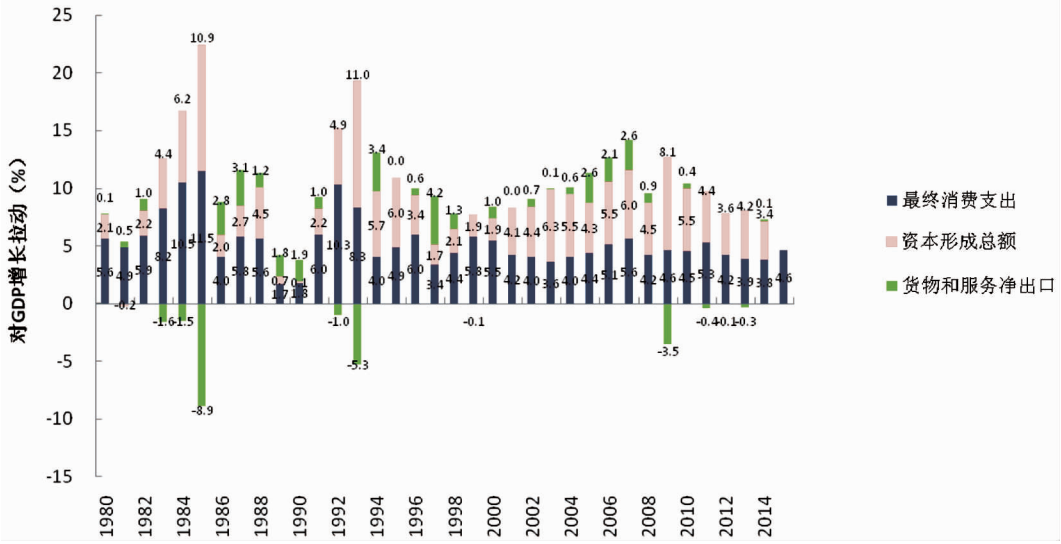


图 5　1980—2015 年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拉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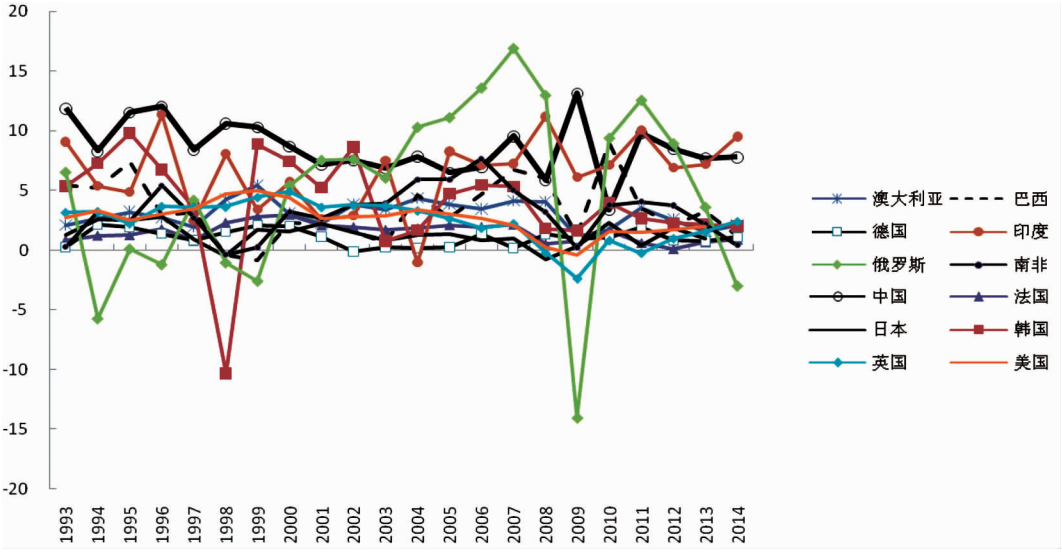


图 6　1993—2014 年世界主要国家消费支出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第三，强劲的消费增长有着坚实的收入增长基础。由于服务业比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而且有相当部分属于技能密集型行业，支付的工资比制造业更高，有利于促

进国内消费和创新。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正在接近实际 GDP 增长（见图 7）。预计未来 10 年间，中国的消费潜力将会来自于居民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还会逐步回升，而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正在带动消费和旅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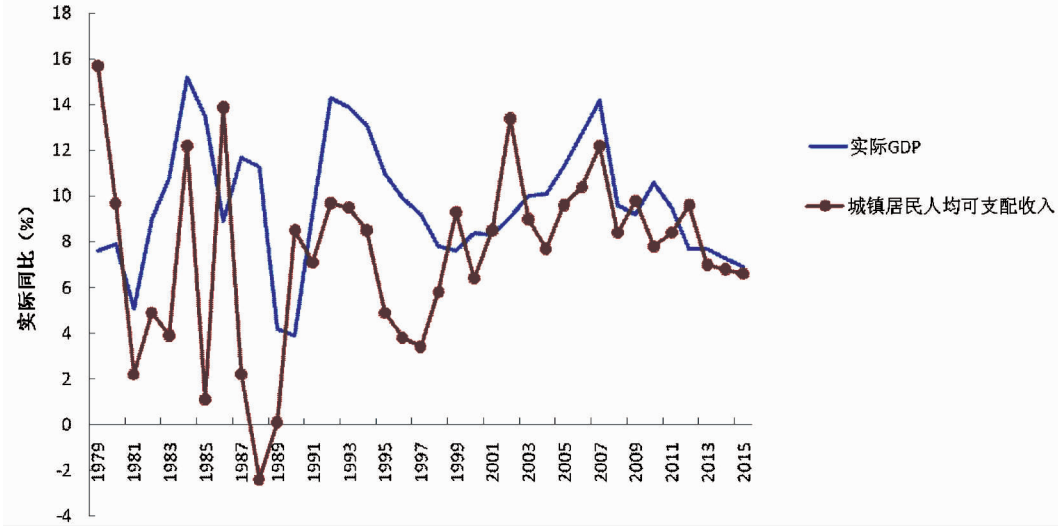


图 7　2002—2014 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实际 GDP 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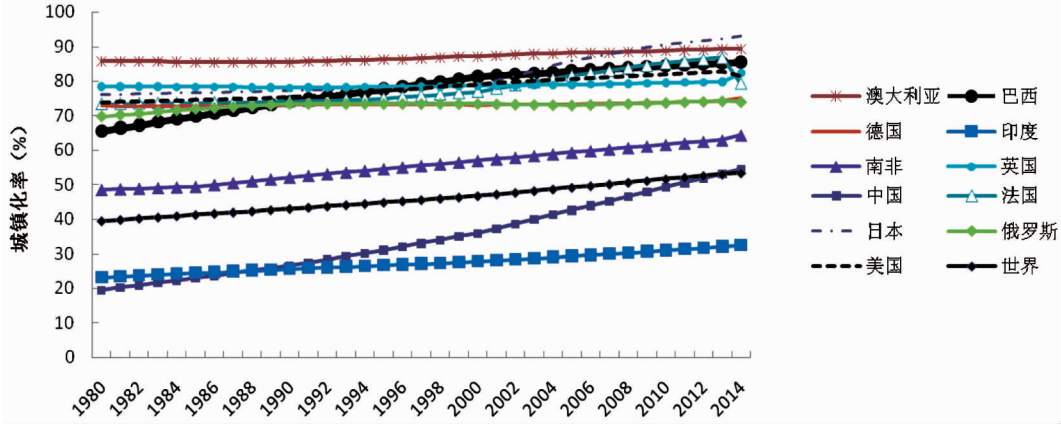


图 8　1980—2014 年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第四，中国加速的城镇化使内需潜力得以持续释放。过去 30 年里，超过 3 亿人已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而今还有 3.5 亿人正在转向城镇，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已有 160 多个，而且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还在持续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见图 8）。2013 年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才刚达到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在金砖国家中仅

领先于印度。2003—2014 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以上，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当前，中国正继续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致力于建设若干个城市群，将全国城镇化水平提高至 75%以上。未来 10 年中国城镇化率仍有年均 1%的幅度提高，由此将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吸引全球资源、能源、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继续流入中国。

第五，中国将拥有一个相当成熟的开放型消费市场。在中国，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正在快速成长起来。据麦肯锡《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层》估算，到 2022 年将有超过 75%的中国城市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 6 万～22.9 万元人民币之间，达到中产阶层收入水平。中国的年轻消费者对商品品质品牌要求更加强烈，消费习惯更加多样化，网络购物日益常态化。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商场购物消费是国内零售额增长的发动机，目前其占所有零售支出已达到 41%。随着“80 后”“90 后”以及“00 后”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快速崛起并占据主导，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总消费额的 35%将来自新一代的中产阶层。

第六，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展现其全球影响力。中国日渐增多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正在释放强劲的国际购买力。目前中国消费规模已超过 4.5 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按照最近增长趋势推算，中国有望在 2025 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2012 年以来，中国加快实施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战略。一旦经济转型成功，中国 13 亿多人口规模的内需完全释放出来，将形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将为世界总需求的增加做出更重要的贡献，尤其对与中国经济互补的国家和地区增长产生较大的正向拉动作用。预计未来 5 年间，中国进口将超过 15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全世界将从中国扩大的市场需求中获益。

第七，中国海外消费能力展现其爆发力。2013 年以来，中国有超过 1 亿人次出国旅游购物，消费金额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购买的各类艺术品占世界交易额的 1/3，黄金消费接近世界的 30%，汽车消费超过世界的 1/4，购买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世界消费量的 20%。据贝恩公司 2013 年底调查显示，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购买了全球约 29%的奢侈品，其中在海外消费的部分已占其奢侈品消费总额的 2/3，且大中华区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个人奢侈品消费金额将会达到近 1900 亿美元；到 2030 年中国城市游客国内游及出境游（不包括当天往返的短途旅行）总数将从 2012 年的 5 亿人次增至 17 亿人次，消费支出金额将从约 2600 亿美元增至 1.8 万亿美元，其中出境游将占据中国旅游市场总值的 40%左右。

（二）结构性特征二：消费升级驱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将会促使消费需求向高层次迈进，即加速消费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即研制出符合新的消费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中国需求结构的转型驱动供给侧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主要反映在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面。除了产业间的比例调整外，更多的是体现在产业内部的转型升级，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传统工业转向先进智能制造提升，第三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

第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供给侧改革将助推新型城镇化。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发展，着手实施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加快耕地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重点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不断推动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进一步释放农村富余劳动力。如果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得以实施，预计未来 10 年内中国城镇化率将提高至 65%以上，每年可能会有 1000 万～1500 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第二，由低端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加快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产业中高端水平。在制造业平均利润趋势下滑情形下，中国制造企业必须寻找提升竞争力和向价值链两端转移的途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应对供应链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近年来，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有所增强，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由 1994 年的 8.3%攀升至 2013 年的 27.0%，已超越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老牌高科技出口国家，也超过了韩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见图 9）。未来 10 年里，中国还要继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研发创新投入和培育自主品牌，开拓新兴出口市场等激励手段，重点培育电子设备、医疗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同时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最大程度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最大潜力地发展循环经济，由向世界提供质次价廉的物耗品转向提供质高价优的智耗品。

第三，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跃迁。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凸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替代制造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内容，向价值链两端转移逐渐替代资源禀赋决定的低端优势，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促使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外包成为现代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新手段。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升级、要素价格的变化和财税政策的调整，将会促进中国第三产业的扩张，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将在消费升级、增加就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一、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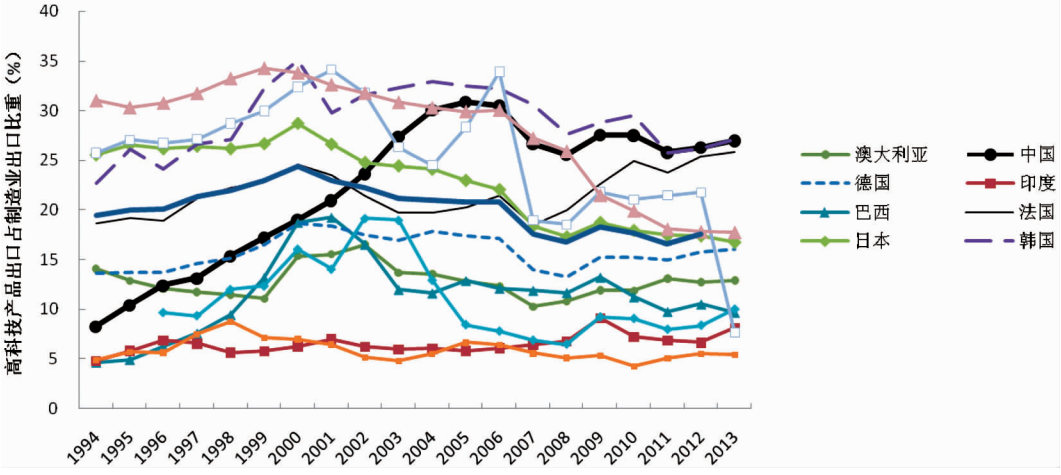


图 9　1994—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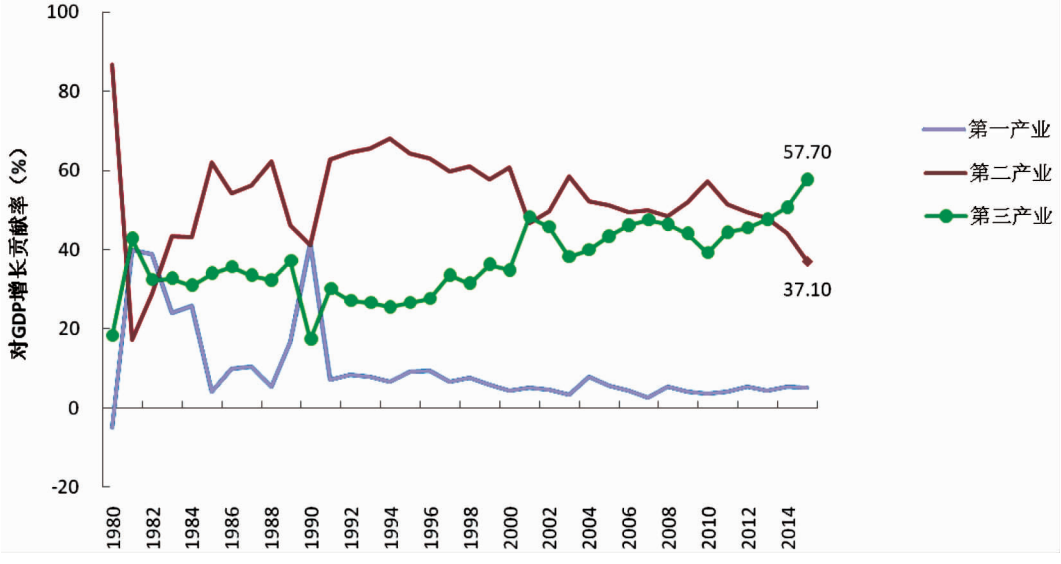


图 10　1978—2015 年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了 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见图 10），工业对 GDP 贡献率逐年降低，由 2010 年的 48.5%下降至 2015 年的 37.1%；2015 年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57.7%，当年拉动 GDP 增长 4.0 个百分点，超过第二产业 1.4 个百分点。二是加快推动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升级。近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与传统服务业的跨界融合，鼓励民资和外资进入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法律咨询、文化娱乐、研究与开发等新兴服务业，提高高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未来 10～15 年里，受消费者收入上升与人口结构变化双重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业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将会显

著上升，尤其是文教娱乐、金融保险、居住服务、医疗保健等领域服务消费所占比重将会呈现大幅上升趋势。据估算，倘若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将会新增约 1.1 亿个就业岗位。

（三）结构性特征三：重塑比较优势必须依赖创新驱动的力量

当今社会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智能机器、物联网已开始在能源、交通运输、医疗护理等领域带来新的生产力增长。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了新的分工协作形态，跨国公司继续追随低成本的价值洼地零部件生产遍布全球各个大陆，使得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来自成本和竞争两方面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必须跟进世界科技革新变化，依靠自主创新发展，重塑国际竞争优势。

第一，政策目标更多转向增加就业和效率提升。一是中国政府施政目标之一是创造就业岗位。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提升其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而不是放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发展来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仍有较大的腾挪空间，中国中西部仍有相当大比例非熟练工人需要就业谋生。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会同时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两种角色，产业转移既会在省际之间也会在国家之间发生，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还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入驻，中西部城市将会由此受益，并由此培育出数千万中产阶层消费群体。二是结构性改革的主攻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当前投资和出口困境的最佳办法就是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将激发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活动，使创新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促使企业具备向创新要效率的能力。如在降低能耗方面，近些年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努力，单位 GDP 能耗下降较快，正在接近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见图 11）。近年来，中国政府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突出强调生产率指标的重要性，旨在通过强化全面自主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扭转当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滑的局面。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新增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作为预期性指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目标设定中，重点突出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考核指标。预计未来 10 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有可能回升到 2%～3%的水平，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第二，科技创新正形成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是中国正在发挥人口基数优势形成新的人口红利。作为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拥有庞大的人才基础，高素质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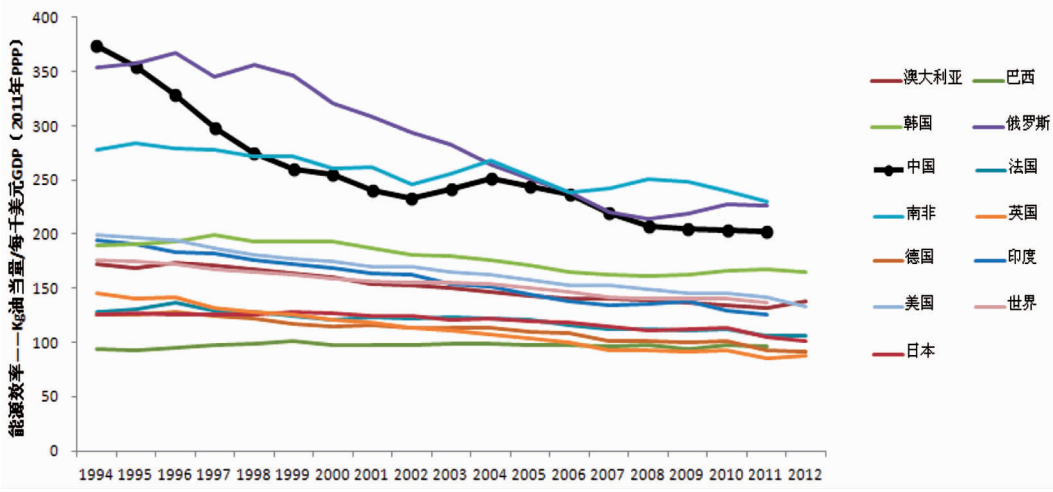


图 11　1994—2012 年世界主要国家单位 GDP 能源消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者的比例逐年提升，这为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奠定了基础。中国正在深化科技服务体制改革，在释放人才的创造潜能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挖掘人才资源富矿，推动由廉价劳动力主导的人口红利向由高素质劳动者主导的人才红利的持续跃升。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 30%，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数量已从 1998 年的 100 万人攀升至 2016 年的 765 万人，几乎与瑞士和以色列的总人口数相当。二是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并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在持续增长，已从 1993 年仅占世界研发投入的 2.2%攀升至 2009 年的 12.8%，继 2010 年超过德国之后，在 2013 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大国。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已从 2005 年的 1.34%提升至 2015 年的 2.10%，超过了欧盟 28 国 1.96%的总体比例。2015 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超过 1.1 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了 40.3%，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重的 77.4%。三是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2013 年起，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三位，尤其在通讯、电力输送、高铁设备制造等方面获得了大批国际专利，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有的技术领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以华为公司为例，华为公司拥有 15 万员工，而其中研发人员有 6.8 万人，而美国思科公司 6.6 万名员工中只有 2.1 万名研发人员。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涌现出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一批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创新速度并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据美国大型联合会计算显示，1999—2014 年，中国代表科技进步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30%以上。

三、中国经济展现的结构性改革趋向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艰难爬坡阶段。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展现出的结构性特征，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改革，这尤其要更加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比如说，在推进“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不能干预太多，切实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淘汰“僵尸企业”，通过简政放权和体制机制创新，保障自由的市场进入退出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中国经济不发生“硬着陆”风险，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发挥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竞争压力，既有来自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带来的中高端产品的竞争，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经济仍没有摆脱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增长的痕迹，多数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可替代性强且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但受制于环境成本、科技落后和创造性缺失制约，中国产业发展不可能重回低成本高消耗的增长模式，只能遵循市场规律引导，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转移。在结构调整中，中国亟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通过简政放权，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让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则充分发挥作用，按照社会需求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按照公平竞争规则，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确保微观主体真正按照契约精神实现自我价值。

（二）完善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能动性作用

当前，中央提出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意味着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产业升级中，政府要重点解决市场信号失灵和产业培育不足问题。在营造公平市场方面，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充当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强化间接的宏观调控功能，用好规划、财税、金融等调控杠杆，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在推进产业升级中，政府要制定明确的产业导向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代替选择型政策，减少倾斜性产业政策造成的产业非均衡发展。在市场准入上，政府要制定“负面清单”，避免层层审批选择或限制企业进入某个特定行业。在激励创新方面，政府要发挥在生产率提高和新技术培育中的引导作用，培育和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便利、给予适当奖励支持等。

（三）处理好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短期看，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但长期看两者是一致的。未来 10 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有可能保持在 7%～8%的增长水平。要真正使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发挥出来，需要顺应经济新常态的规律，主动推动经济结构全面调整。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赢得时间。适度扩大总需求是要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通过需求管理尽可能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使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之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要求，通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发展更有质量，更有效益。从宏观调控目标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经济工作主线，今后工作的重点不再是单纯强调 GDP 增长，而是转向保障充分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贝恩公司：《2013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贝恩观点》2012 年 12 月 17 日。

2．吕晃等：《赢得下一个十亿亚洲游客——起航中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 TripAdvisor（到到网），2013 年 12 月。

3．龚雯、许志峰、吴秋余：《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9 日。

4．Harold L. Sirkin，Michael Zinser，and Justin Rose. The U. S. as one of the developed world’s lowest－cost manufacturers——behind the American export surge，*www. bcgperspectives. com*.，August 20，2013.

5．Jonathan Woetzel，Xiujun Lillian Li，William Cheng，What’s next for China? McKinsey Insights China，*www. mckinsey. com*，December，2012.

6．Dominic Barton，Yougang Chen，and Amy Jin.，Mapping China’s middle class，McKinsey Quarterly，*www. mckinsey. com*，June 2013.

7．The Conference Board，Productivity Brief 2015，May 2015.

8．Rahul Anand，Kevin C. Cheng，Sidra Rehman，and Longmei Zhang. 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IMF working Paper*，January 2014.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有效性研究

卢欣生　李晓彤　张文强

摘要：股指期货作为一种典型的金融衍生品，对于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由于中国的股指期货市场起步较晚，对该市场的有效性研究还不充分，为了能够证明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水平，本文利用2015年4月16日14时—2015年6月16日14时，每5分钟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交易收益率的高频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G)ARCH模型的方法，分析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中国股指期货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水平。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本文提出四条基本建议：(1) 政府要深化市场改革，明晰产权；(2) 投资者要谨慎辨别信息真伪，提高专业水平；(3) 丰富股指期货品种，降低市场参与门槛；(4) 加大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关键词：股指期货　高频数据　(G)ARCH模型　弱式有效市场

作者简介：卢欣生，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李晓彤，济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文强，济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　言

股指期货是金融市场的众多衍生品中极为重要的产品，在稳定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股指期货可以通过股票现货指数标的合约，把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有效市场的条件下，理性投资者可以通过股指

期货价格来预期未来现货市场股票价格变动，判断价格走势，发现未来市场价格、套期保值、规避金融系统风险。

2010 年 4 月 16 日中国第一份股指期货合约——沪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正式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由于其在完善资产价格定价机制、资本市场交易结构等方面的优势，2015 年 4 月 16 日，中证 500、上证 50 股指期货也相继正式交易，为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提供了新能量。虽然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其投资资产的种类、资本市场层次、市场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鉴于此，在充分保证其价格发现功能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市场效率、完善市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学者们的共同研究目标。为了判定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水平，学者们大多以沪深 300 股指期货收益率日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自相关检验、方差比检验、(G)ARCH 模型等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已经达到弱势有效水平。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相对于中证 500 和上证 50 股指期货市场发展相对成熟、稳定，但是后两种股指期货市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同样显著，因此，要全面分析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以中证 500 和上证 50 股指期货为样本是同样重要的。本文就是运用单位根检验、序列相关性检验、(G)ARCH 模型等方法，对中证 500 和上证 50 股指期货每 5 分钟收益率的高频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是否已经达到弱式有效市场水平。

二、文献综述

关于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始于 Fama（1970）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按照资本价格反映信息的程度把资本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强式有效市场三类。在信息分散的情况下，Grossman（1976）认为均衡价格可以涵盖市场上的所有信息，在带噪音的模型假设中，价格只能部分地反应市场信息，交易成本成为价格对市场反应程度的重要外生变量。LeRoy（1973）、Lucas（1978）分别证明了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不依赖于时间序列是否是随机游走的。这不仅是对 EMH 成立的基本假定的扩大，还证明了短期收益的可预测性。

Robinson & Wrightsman（1974）则对 Fama 的有效市场的假说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市场有效性应包括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其中，市场的运行效率决定了市场中的产出水平，配置效率代表了资金在高效率生产部门的投入水平。现实生活中，价格并不能完全反应市场信息，其波动过程也不是随机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受到某种特殊趋势的影响。因此，Edgar（1991）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从非线性的角度对市场效率进行

研究，该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受经验、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会有选择地分析市场信息并进行投资，而这往往会导致羊群效应的形成。Lo & Mackinlay（1999）认为预测收益的来源在于投资者流动性需要以及充分了解信息，市场发展依赖于价格发现，而价格发现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市场的有效性。Chan（1992）、Martens（1998）发现期货价格变动领先于现货价格变动，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的价格传递效率明显较强，O Hara（2003）、Covring（2004）指出市场流动性及价格发现是市场微观结构中的重要因素，股指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现货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股指期货市场在信息贡献率、价格传递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存在起步晚、交易周期短、交易数据少、市场发展不够成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国内对股指期货市场的研究较少，研究的角度也不全面。华仁海、刘庆富（2010）从对价格发现的角度出发，利用股指期货市场一分钟的高频数据，得出股指期货市场具有较强的价格发现能力，在信息传递、价格发现、对股指现货的冲击速度上发挥重要作用。方匡南、蔡振忠（2012）采用沪深 300 股指期货 5 分钟的高频数据，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对我国股指期货在短期和长期的价格发现机制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指数期货和现货价格存在相互引导关系。方欢（2013）在研究长期价格发现机制时，将中国股指期货市场分为不同的研究阶段，采用 GARCH 模型分别对对应的市场的波动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沪深 300 股指期货在短期和长期中都减少了现货市场的波动，长期内市场信息传递的效率明显提高。李佳、王晓（2010）采用方差比检验方法，利用沪深 300 指数及基金历史收益率等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在短期内是弱式有效的，但在中长期是基本无效的。邢天才、张阁（2010）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联动效应较差，但是增加了现货市场的非对称效应。

三、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实证分析

根据市场有效性假说，可以将市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而判断市场的标准是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可以通过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当资产价格不可以被预测，即为随机游走的情况下，市场为有效。中证 500 及上证 50 股指期货还处于发展初期，为了增强稳定性和有效性我们采用了每 5 分钟收益率的高频数据，分别运用单位根检验、（G）ARCH 模型，对其弱式有效性进行研究。由于这两种方法的约束性较小、更贴近实际金融市场，因此在金融市场有效性检验中使用广泛且结论较为准确。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次选用2015年4月16日14时—2015年6月16日14时，每5分钟交易的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收益率的数据（一共是2269条），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有效性进行分析。

（二）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序列相关检验的基础，在不存在单位根的基础下，才能进行之后的相关性检验，所以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我们采用的是对数方式处理的5分钟收益率的数据，然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	检验形式	t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ZZR500	ADF	−47.705***	−3.433	−2.863	−2.567
	KPSS	0.083***	0.739	0.463	0.347
	PP	−47.803***	−3.433	−2.863	−2.567
SZR50	ADF	−52.551***	−3.433	−2.863	−2.567
	KPSS	0.073***	0.739	0.463	0.373
	PP	−52.408	−3.433	−2.863	−2.567

注：***代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中证500股指期货指数和上证50股指期货指数在ADF、KPSS和PP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下均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不存在单位根，原始数据平稳，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序列相关检验。

（三）(G)ARCH模型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本文中，我们选择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的五分钟收益率进行描述性统计，收益率的公式为：

$$R = \ln P_t - \ln P_{t-5}$$

R 为日收益率，P_t 表示第t时刻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盘价格，P_{t-5} 表示第t−5时刻股指期货指数的收盘价格。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的高频收益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对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市场的5分钟收益率进行描述性统计，J－B统计量的结果表明，两组数据均符合正太分布。从标准差的统计结果来看，两组数据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这两组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数据比较平稳。此外，两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也比较小，这就再次说明两组数据分布得比较平稳。

表2　中证500与上证50股指期货高频数据收益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统计量	P值
ZZR500	1.51	3.11	0.018	－0.041	0.003	－1.121	11.93	8068.768	0.000
	E－04	E－04	053	248	922	469	264		
SZR50	1.09	0.000	0.21	－0.025	0.003	－0.473	9.250	3801.673	0.000
	E－05		575	752	031	549	042		

2．中证500股指期货有效性研究

为了使用GARCH模型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收益率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对中证500股指期货的5分钟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将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的残差序列的残差图表示出来。从残差图中可以发现，残差的波动具有典型的积聚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波动程度比较小，而在其他的一些时间内波动程度比较大。这个结果意味着残差项里存在着明显的异方差性。

表3　中证500股指期货收益率ARCH LM检验结果

F统计量	71.4543	概率值（P）	0.0000
T×R统计量	69.3428	概率值（P）	0.0000

为了对残差序列中的异方差性进行验证，我们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即用ARCH LM方法对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P值均为0，可以拒绝原假设，表明在中证500股指期货残差收益率的残差序列中是存在着明显的ARCH效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GARCH模型检验，从而判断股指期货市场是否达到弱势有效。GARCH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我们利用中证500股指期货市场的5分钟高频数据建立GARCH模型，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均值方程：ZZR5 00＝0.000179＋0.004595ZZR500（－1）

t＝（2.65）　　（0.21）

方差方程：ZZR5 00 = 1.21E－07 + 0.052874 RESID（－1）^2 + 0.940598 GARCH（－1）

t = （5.51）　　（11.95）　　（182.59）

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的表达式可以看出，ARCH 和 GARCH 项的系数分别为 0.052874 和 0.940598，而且两个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两个系数之和为 0.993472，非常接近 1，但得出的结果满足平稳性条件，条件差所受的冲击持久，即对未来预测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已经具有了弱势有效性。

表 4　中证 500 股指期货市场收益率 GARCH（1，1）模型估计结果表

	变量名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均值方程	C	0.000179	6.75E－05	2.647283	0.0081
	ZZR500（－1）	0.004595	0.021911	0.209718	0.8339
方差方程	C	1.21E－07	2.19E－08	5.512998	0.0000
	RESID（－1）^2	0.052874	0.004424	11.95051	0.0000
	GARCH（－1）	0.940598	0.005152	182.5850	0.0000

3．上证 50 股指期货有效性研究

通过上文对中证 500 股指期货收益率高频数据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已经初步具备了弱势有效性。在本节，我们将利用上证 50 股指期货收益率的高频数据再次对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本节同样通过构建 GARCH（1，1）模型来对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我们首先构建上证 50 分钟收益率的残差序列图，然后对于原始数据进行 ARCH LM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上证 50 股指期货 ARCH LM 检验结果

F 统计量	82.45148	概率值（P）	0.0000
T×R 统计量	79.64246	概率值（P）	0.0000

我们发现不管是从残差序列的集聚效应还是 ARCH LM 检验的统计结果，都表明在残差序列中存在着 ARCH 效应，也就是说未来某个时间的收益率的波动可以通过历史上的收益率波动预测出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 GARCH 模型检验，从而判断股指期货市场是否达到弱势有效，GARCH 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上证 50 股指期货市场收益率 GARCH（1，1）模型估计结果表

	变量名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均值方程	C	5.03E－06	5.99E－05	0.083952	0.9331
	SZR50（－1）	－0.110267	0.022335	－4.937075	0.0000
方差方程	C	1.79E－07	2.95E－08	6.069727	0.0000
	RESID（－1）^2	0.040709	0.003362	12.10794	0.0000
	GARCH（－1）	0.939076	0.005530	169.8018	0.0000

我们利用上证 50 股指期货市场的 5 分钟高频数据建立 GARCH 模型，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均值方程：SZR50 = 5.03E－06 + －0.110267SZR50（－1）

t =（0.08）　　（－0.11）

方差方程：SZR50 = 1.79E－07 + 0.040709 RESID（－1）^2 + 0.939076 GARCH（－1）

t =（6.07）　　（12.11）　　（169.80）

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的表达式可以看出，ARCH 和 GARCH 项的系数分别为 0.040709 和 0.939076，而且两个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两个系数之和为 0.979785，小于 1，但是非常接近 1，结果满足平稳性条件，表明条件差所受的冲击是持久的，即是对未来所有的预测都有重要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已经具有了弱势有效性。

四、结论和建议

总体而言，通过对中证 500、上证 50 的高频数据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得出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已经初步具备了弱式有效性的特征，但是在检验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问题，即当市场处于弱式有效市场时，其时间序列是通过随机游走检验的。反之，能通过随机游走检验的时间数据不一定表明该市场就是弱式有效市场，两者相互间并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我国股指期货的有效性及效率的研究，需要全方面综合分析各个指标，所以在以后研究中将会继续深入探讨。

当前制约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发挥的因素和相关建议如下。

第一，产权的制约。产权制度是贯穿整个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所有权的归属是否明晰，对控制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确定市场责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权明晰

不仅能让使用权、所有权、控制权三权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还能明确企业组织形式，保障交易所和投资者的权利运行。在我国期货和股票市场中，政府干预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自身调节，导致市场失灵现象发生。而细究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在于市场中的权利划分的不合理。建议政府深化市场改革，明晰产权。

第二，金融市场噪音的影响。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与资产价格无关的信息，导致资产价格背离实际资产价值，使得真正有效的信息质量和价值降低，不能全面反映资产情况。而对于投资者而言，都有着跟风的习惯，即所谓的羊群效应，当跟风程度较强时，股指会出现短期的价格上涨或价格回落，因此在短期内都不能有效解释金融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的有效性。对此，建议投资者高度谨慎地辨别信息真伪，提高自身专业水平，通过理性的思考以及对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的全面分析，决定投资方向，防止信息操控者给多数投资者权益带来损失。

第三，建议丰富股指期货品种，降低市场参与门槛。中证 500、上证 50 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股指期货的品种分类较少，还很不全面，同时，股指期货市场对于参与者的要求相对较高，再加上投资者自身对于股指期货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股指期货市场的门槛较高，活跃度较低，这极大影响了产品价值的全面体现，也使得少数投机者利用资金优势操控产品市场发展方向，降低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应当丰富股指期货品种，拓宽市场的覆盖面，同时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促进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市场发展。

第四，建议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企业来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信息的披露；二是对当前经营状况和政策实施的披露；三是对未来发展规划和策略的披露。除涉密信息的披露外，企业的信息披露应当及时、客观，若出现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客观情况时，会导致市场对价格的错误判定，使价格偏离正常的波动轨道，对企业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对上市公司财产、交易、结算等方面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督，建立企业市场信息平台，形成权责明晰、交易程序和方式合理合法的监督监管局面，摒除资本市场中的寻租现象，减少市场中违规违法行为的出现。与此同时，企业也要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管，降低企业投资的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对投资者负责，加强信息公开、透明。

参考文献：

1. 华仁海、刘庆富：《股指期货与股指现货市场间的价格发现能力探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0 期。

2．方匡南、蔡振忠：《我国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统计研究》2012 年第 5 期。

3．方欢：《股指期货不同发展阶段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基于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实证研究》，《金融经济》2013 年第 8 期。

4．李佳、王晓：《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方差比的检验方法》，《经济经纬》2010 年第 1 期。

5．邢天才、张阁：《中国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联动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 300 仿真指数期货数据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 年第 4 期。

6．Fama E.，Foundations of Finance Basic Books，*NewYork*，1976.

7．Grossman Sanford J.，On 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tock Market Where Traders Have Diverse Information，*Journal of Finance*，1976.

8．LeRoy，Stephen，Risk Aversion and the Martingale Property of Stock Price，*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view*，1973.

9．Lucas Robert E，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Econometrica*，1978.

10．Robinson P. Shaver，L. Wrightsman，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Academic Press*，1974.

11．Ederington L. H.，The Hedeing Performance of the New Futures Markets，*Journal of Finance*，1979.

12．Lo A. W，Mac Kinlay C.，Stock market prices do not follow random walks：Evidence from a simple specification test，*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88.

13．O Hara，Maureen，Liquidity and Price Discovery，*Journal of Finance*，2003.

14．Lo Andrew，Mackinlay A，A Non－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5．Chan，K. A.，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Lead－la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sh Market and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2.

16．Martens M.，Kofman P.，and Tokunaga T. A Threshold Error－correction Model for Intraday Futures and Index Return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1998.

17．Covrig V.，Ding D.，Low B S.，The Contribution of A Satellite Market to Price Discovery：Evidence from the Singapore Exchange，*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2004.

责任编辑：艾　冰

·名人观察·

“一带一路”为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张国庆

全球经济、世界秩序、大国政治以及国际社会思潮正在经历重大而深刻的激荡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勃然兴起。一些地区一体化方案遭受挫折，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保守主义抬头流行，全球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开放、合作被质疑。在这样严峻的挑战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合作进展正在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究其原因，“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凝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全球的 60%多，但经济总量却只有全球经济总量的不到 30%。同世界人均 GDP 已超过 1 万美元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 GDP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6.4%。而且发展不平衡，其中，既有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人均 GDP 超过 10 万美元，也有 27 个人均 GDP 不足 200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仅为全球 GDP 平均水平的 18.3%。如果不算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等 16 个高收入国家之后，沿线 49 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2.3%，处在世界银行定义中的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之间。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里，有着近 25 亿的庞大人口规模，由于均处在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建设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未能有效整合利用，扶贫减贫面临的任务十分严峻。

这种不平衡鸿沟的弥平及发展结构失衡的调整，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加强合作，通过国家间的政策来加强沟通和协调。同时，由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状况不同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决定了该地区今后发展的主题、主线，必须是通过加强投资、加快转型和加速

发展来加以实现。如果经济合作和相关基础设施能够得以较好的加强和改善，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仍将充满希望。

“一带一路”建设，就是通过这种合作，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与它们一道分享，并在贸易、投资和援助方面，帮助它们，争取一个平等有利的发展环境，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因此，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对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重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沿线国家加强紧密合作，加快结构调整，在调整中支持稳定发展，在稳定发展中逐步消除不平衡的经济状态。这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让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加快打通发展的通道

观察国际贸易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内陆型国家经济的嬗变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而出现的，也是随着海洋运输的兴起与繁荣而变得苍凉与闭塞的。这是由于海上航路的开辟，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联系密切的整体，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内陆型国家则由于陆上运输能量的限制和交通设施的滞后，难于承担起国际贸易急剧发展的重任，从而经济发展逐步滑落。

今天，内陆型国家经济要发展，除了要扩大开放，还必须突破地理、国界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工程技术和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打开贸易通道，适应已经变革的现代运输方式，将货物和商品流通扩展到整个区域和不同国家，提高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效益，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模式。

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的是亚欧大陆因交通不便而成为荒凉地带；有的尽管是沿海国家，但由于港口老旧、缺乏疏浚、设施配置停滞，也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不难预见，基础设施建设是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及必须解决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契合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它所以能波澜壮阔地展开是趋势的必然。这将有助于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骨架，并与沿线国家基础建设规划相对接，支撑沿线各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连接重点产业集聚区和主要能源资源区块，构建出“联通内外、安全畅通、绿色高效”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如果能建成“一带一路”高速铁路网，按高速铁路每小时 300 公里的行驶速度，亚洲国家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在高铁的 24 小时经济圈之内；就是与欧洲间的交流，也会在高铁 48 小时经济圈之内，这将极大地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三、让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找到合作发展的途径

当前，“一带一路”的大部分沿线国家都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城镇建设方兴未艾。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产业合作，可以促进沿线

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将有助于进一步帮助沿线国家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实现它们的工业化梦想；也会极大地鼓励和引导中国各类企业，到沿线国家去投资兴业，将中国的优势产业和沿线国家的市场、资源优势紧密结合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经验、资金、技术和产业优势，将是沿线国家形成自己工业基础的重要依托。

“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资源非常丰富，若与中国开展能源资源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如果能推进上下游合作，进行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加工的全产业链构建，将有助于在当地形成加工规模，增加就业。与资源优势相结合并相互配套的，还可以建设一批绿色环保的油气化工、煤化工、钾肥、钢铁、有色金属的生产基地，提升深加工能力。同时，还可合作开发清洁能源，如水能、光伏、风能、生物质能等资源。产业合作可以全方位地进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的跨国合作；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高端制造，形成一系列有竞争力的工业项目；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构建从农产品种植、深加工、包装到进出口的农业产业链。此外，还可以扩大在金融、高新技术、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保、海上联通等海洋产业上寻找到更多的发展机遇。

这些合作已经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三年多来，中国与 20 多个沿线国家建设了 50 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180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 16 万个就业岗位，有效地推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使许多国家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

四、让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有包容性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不仅资源禀赋不一，而且经济制度各异。秉持什么样的理念进行合作，采取什么样的原则推动发展，这关乎多方利益。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这一重要论述向世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尽管是中国提出的，但不是搞排他性的制度设计，更不是自己发展了就不让别人更好地发展，也不是以自己的制度、规则来规范他国，而是对所有参与国家都照顾了舒适度，是开放、包容、平等的；不搞范围限制的小圈圈，而是让沿线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尽所能，各施所长，能广泛参加的，达到互利互惠、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适应沿线国家的建设需求和未来希望，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扩大利益的汇合点，从而实现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使“一带一路”成为普

惠共济与和平合作之路，将促进全球经济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与权重，重塑和再造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实践证明，这一理念和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同。

五、让利益不同的国家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人口数量、经济规模、战略位置、辐射能力、安全状况，以及参与意愿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要使利益不同的国家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必须考虑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而中国也只是发展中的大国，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上都是有限的。因此，为共同发展谋方案，既要从各国本身发展需要考虑，也要从沿线国家整体需要考虑；既要从本区域整体利益考虑，也要从不同国家利益目标考虑，充分照顾彼此，尽可能周全和完善。所以，“一带一路”精心考虑了以下的对接：一是地区与地区的对接。主要选择重点国家和地区，了解发展需求，实现互补合作。二是企业与企业的对接。要使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对接的主体。大企业带动，产业链内的其他企业积极参与，尤其要促进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以企业为纽带，创新合作方式。三是项目与项目的对接。规划一批长期和短期项目，其设置和选择，都要契合各国发展的实际需求，并共商建设一些国家级的大型项目。四是标准与标准的对接。随着合作国家的增多，要和相关国家商讨共建标准，并将这种标准推广到整个沿线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最终目标：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形式的网络，最终达致利益共同体的全面形成。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它的实施和推进，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应对挑战、优化全球治理的有益探索，需要各个参与国家都来精心维护。面对外界干扰和离间，必须明辨是非、分清泾渭，强有力地应对。需要营造一个“各国领导都有力支持、各国政府都认真办事、各国民众都拥护参与”的全方位合作的气氛，让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激发更大的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合作、大发展的进程，推动世界经济重新步入新的增长轨道。

（作者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原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

责任编辑：沈家文

·权 威 观 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7 年 5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2017 年 5 月 16 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表年中更新版《2017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 2017 年增长 2.7%，2018 年增长 2.9%，较 2016 年的 2.3% 有所改善，这是自 2011 年以来联合国第一次没有下调前期预测值。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与分析司司长洪平凡说，几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时，甚至把前期预测值略为上调了一些，“反映了世界经济增长经过几年下滑之后，可能出现了向好的拐点”。不过，2017—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仍然明显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3.5%～4%的水平。

美国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2.1%，高于 2016 年的 1.6%。美国就业已经复苏，继续支持消费增长，部分商业投资有所反弹，政府支出预计也会有所上升。但美国政府的新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增长既有上行风险，也不乏下行风险。欧盟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1.7%。总体来看，欧盟就业、消费和商业投资继续改善，但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形势仍然严重分化。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在今后两年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将继续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日本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1.1%，略高于 2017 年初预期。日本央行将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政府将增加公共投资，商业投资也会有所回升。不过，由于劳动力持续下降，日本目前的经济增速或已超出其潜在增长率。

东亚国家过去几年增长下滑势头得到遏制，开始企稳，预计 2017 年增长 5.6%。其中，中国经济 2017 年第一季度增速高于预期，但在结构改革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南亚

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预计 2017 年增长 6.7%。其中，印度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7.3%。西亚经济仍受低油价和区域武装冲突影响，预计 2017 年增长 2.1%。非洲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2.9%，较前期预测值进一步下调。其中，东部非洲增长率相对较高，南部非洲增长较低。由于干旱和战乱，非洲约 2000 万人处于严重饥荒。非洲一些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但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拉美经济持续两年衰退之后，预计 2017 年恢复至增长 1.1%。其中，巴西经济 2017 年预计增长 0.1%。随着油价回升，俄罗斯经济也从连续两年的衰退中企稳，预计 2017 年恢复 1.5%的增长，高于前期预测。

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改善是周期性的，主要反映了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继续复苏，以及过去两年发生衰退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企稳，但这还不能表明全球经济将发生结构性强劲增长。过去几年，全球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世界经济今后几年很难回到强劲增长轨道。洪平凡表示："投资、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是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世界各国实体经济投资增长普遍下滑是造成目前以及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不足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劳动力技能和基础设施，从而导致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年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目前，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只有全球金融危机前的 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只有那时的 50%。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不少重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有：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走向，英国退出欧盟带来的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逆经济全球化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全球经济前景的主要下行风险"。洪平凡提出，2017 年 3 月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会议声明在过去 10 年来首次没有重申"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贸易监测报告指出，世界各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总量继续呈上涨趋势，特别是非关税壁垒措施迅速上升。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单边保护主义倾向增加。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也可能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一定风险。其他一些非经济风险，如地缘政治风险、部分区域的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也给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带来很大风险。

（二）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加快至 2.7%

世界银行（WB）2017 年 6 月 4 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预计，随着制造业和贸易回暖、市场信心增强、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出口大宗商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得以恢复增长，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16 年的 2.4%加快至 2.7%，2018 年和 2019 年将进一步提速至 2.9%。预计 2017 年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望加快至 1.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从 2016 年的 3.5%加快至 4.1%。

WB 发展经济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表示，经过旷日持久的增速放缓之后，一些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增速加快，这对于其所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是良好发展趋势，“现在正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评估自身脆弱性和加强抵御不利冲击的政策缓冲的时机”。

报告还预计 2017 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从 2016 年 2.5%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低点回升至 4.0%，但也提醒称，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颠覆受欢迎的全球贸易回暖趋势，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损害信心和投资。同时，报告强调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和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如果突然加息或借贷条件收紧可能会造成损害。2016 年年底，50%以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出 2007 年 10 个百分点以上，30%的国家财政平衡恶化，赤字占比超出 2007 年 5 个百分点。

WB 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表示，令人高兴的是贸易正在复苏，但令人担忧的是投资增长依然乏力。因此，WB 把贷款的优先重点转向能够促使私营部门跟进投资的项目。

（三）生产率增速放缓困扰世界经济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称，2017 年即将过半，全球经济复苏已蓄势而动。不过，多重不确定因素仍给复苏蒙上迷雾。英国的脱欧进程、美国政策的不可预知性、全球老龄化趋势，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等，都会波及增长的稳定性。

全球生产率增速放缓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大威胁。2016 年全球劳动生产率仅增长 2.1%，低于 1999—2006 年 2.6%的平均水平。近 10 年来，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着生产率持续低迷的困扰。导致生产率下降的原因目前存在很大争议：IMF 表示，投资长期疲弱和国际金融危机遗留问题或许与之有关；另一种观点则将生产率增速下降归之于信息技术革命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渐减退；经合组织（OECD）则认为，“僵尸企业”数量的增加拖累了生产率，并且对一些效率更高企业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羸弱，或许会导致中期潜在增长的下行，特别是在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此外，生产率低下带来的后果还包括工资水平停滞、个人储蓄高涨（会导致实际利率降至极低），这将加剧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对财政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总体上，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将贯穿 2017 年。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处在过渡期的意大利政府，以及紧张的中东局势，都会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国际合作意愿的下降。一系列的风险因素，都将给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带来相应威胁。美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无疑将加剧这些风险。此外，如果美联储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状况会收紧，强势美元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汇率下行的压力。

（四）IMF 预测亚太经济增长前景全球最强

2017 年 5 月 18 日 IMF 发布了 2017 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预测 2017 年

全球经济增速为3.5%，2018年为3.6%。亚太地区的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仍是最强的，2017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为5.5%，2018年为5.4%。但如何在保护主义抬头、市场不确定性加强、货币政策收紧的大环境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话题。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三个因素值得担忧。第一，“向内看”政策的兴起，主要指来自于美国的保护主义及其国内的不确定性。比如特朗普政府提出要重新振兴本土工业、减少企业税，同时加重海外置业的赋税等。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影响亚太地区和许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些严重依赖外贸的经济体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第二，老龄化的问题。一些地区的经济体可能“未富先老”，即在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之前，人口结构就趋于老龄化。第三，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生产率下降。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在21岁左右，如今已达到38岁。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IMF亚太局助理主任和区域研究司司长Ranil Salgado指出，过去亚洲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了2/3的动力，且这个趋势仍会持续，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全世界快了2个百分点左右。虽然对亚洲来说，出口贸易非常重要，但亚洲真正的增长是靠私人消费以及内需来拉动的。总体而言，经济仍有巨大的下行风险。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依然是亚太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2017年5月1日在泰国曼谷总部发布了年度报告《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强调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趋势，本地区经济体2017年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但加强有效的治理和改善财政管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预计2017—2018年，该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将达到5%或5.1%，高于2016年4.9%的平均水平；中国和印度依然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报告称，中国经济在2017年将平稳运行，高附加值产业正在逐渐取代产能过剩部门，并驱动生产和就业增长。同时，由于政府进一步推进“去杠杆”及债务重组以期在中期内提振产出，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GDP增长率预计将从去年的6.7%下降至6.5%。

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由保护主义和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如果上述因素恶化，该地区2017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亚太经社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表示，由于受到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上升的影响，亚太地区经济目前处于稳定且温和增长态势；要想在未来实现持续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亚太地区国家需要更多地依赖生产力的提高，这需要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更加高效的机构，并进一步改善治理模式；同时，决策者还需要积极应对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以提

高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呼吁警惕未富先老

2017 年 5 月 9 日 IMF 发布报告称，亚洲的经济增长势头在增强，中国经济的表现必将优于之前的预期。预测 2017 年中国 GDP 将增长 6.6%，比之前的预测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中国政府确立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6.5%左右，是 20 多年来最低的目标。IMF 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鼓励大量增加借款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正努力推动经济转型，从基于在技术采用方面赶超的“趋同”型增长，转向发达经济体那种更为成熟的服务型经济。

在肯定亚洲经济增长势头的同时，IMF 警告亚洲部分地区可能“未富先老”。报告表示：“随着该地区很多地方具有相对较低人均收入的人口迅速步入老龄，适应老龄化社会可能成为亚洲尤具挑战性的难题。”IMF 呼吁亚洲经济体学习日本经验，尽早采取措施应对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应对人口不利形势，比如实行可靠的财政稳定计划，提高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参与率，彻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

（三）WB 警告中国地方政府后门借款风险

2017 年 5 月 8 日 WB 称，尽管中国政府已要求地方政府遵守财政纪律，着力遏制不断膨胀的债务，但中国地方政府仍然依赖于预算外借款。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式的增长，被广泛视为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蕴含的一个巨大风险。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省、市、县各级政府大力举债，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以维持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警告，新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不断下滑，面子工程比比皆是。许多项目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2014 年，中国着手取缔通过特别目的载体（SPV）举债的行为，这类载体被地方官员用来绕过关于不得直接借款的法律规定。中国人大废除了该条禁令，使地方政府能够依据中央框定的明确限制条件举债，此举被称为“关后门、开前门”。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要求不能再伪装成财政借款。为了处理遗留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8 万亿元人民币（合 1.2 万亿美元）未偿还借款通过债券互换转为省级专项债务预算。

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自 2015 年以来实际上已加快，WB 的一份报告对此提出警告。WB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约翰·利特瓦克和分析师赵峦表示，尽管有上述债券互换计划，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借款和增加它们的负债。”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占了“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的绝大部分”，且“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以种种复杂方式纠缠在一起，在实践中很难厘清”。报告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速度从 2014 年的 22%攀升到 2015 年的 25%，并在 2016 年上半年保持在 22%

的高位。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作准财政实体，可能无意中鼓励它们增加借款。地方财政部门现在被禁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进行官方监督，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政府为其债务担保。该报告警告，“不再监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务的指示可能造成‘免费资金’的危险印象”。

（四）“一带一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017 年 5 月 26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 2017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展筹资论坛上发言，积极宣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助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倡议。近 4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持续推进，有力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和协调联动发展。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同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2014—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这些都有力支持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论坛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 3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及金融合作。中国未来 3 年将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中国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还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出席会议的国际组织和会员国代表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的成果。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表示，高峰论坛在引领全球发展方面发挥了榜样作用，各国应学习中方经验和做法。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表示，中方积极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举措有力。中方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智利代表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推进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展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埃及代表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国家发展作用重要，许多非洲国家都在积极研究如何更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经济增长。阿尔及利亚代表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对推进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十分重要。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估计值	2017 年预测值	2018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 4 月)				
世　界	3.2	3.1	3.5	3.6
发达国家	2.1	1.7	2.0	2.0
美　国	2.6	1.6	2.3	2.5
欧元区	2.0	1.7	1.7	1.6
日　本	1.2	1.0	1.2	0.6
发展中国家	4.1	4.1	4.5	4.8
印　度	7.6	6.6	7.2	7.7
俄罗斯	-3.7	-0.2	1.4	1.4
巴　西	-3.8	-3.6	0.2	1.7
世界银行(WB,2017 年 6 月)				
世　界	2.7	2.4	2.7	2.9
发达国家	2.1	1.7	1.9	1.8
发展中国家	3.5	3.5	4.1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7 年 6 月)				
世　界	3.0	2.5	2.9	3.0
美　国	2.6	1.6	2.2	2.4
欧元区	2.0	1. 7	1.8	1.6
日　本	1.2	1.0	1.4	1.1
印　度	7.6	7.1	7.3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估计值	2017 年预测值	2018 年预测值
世　界	2.7	2.2	3.8	3.9
进口				
发达国家	4.4	2.4	4.0	4.0
发展中国家	-0.8	1.9	4.5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7	2.1	3.5	3.2
发展中国家	1.4	2.5	3.6	4.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估计值	2017 年预测值	2018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4 月)				
发达国家	0.3	0.8	2.0	1.9
发展中国家	4.7	4.4	4.7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5 月)				
世　界	1.9	2.5	3.1	2.9
美　国	0.1	1.3	2.4	2.2
欧元区	0.0	0.2	1.6	1.4
日　本	0.8	-0.1	0.7	1.0
印　度	4.9	4.6	4.8	5.1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6 年	1.3	0.4	2.7
6 月	1.6	0.4	2.6
7 月	1.5	0.5	2.9
8 月	1.2	0.5	2.8
9 月	1.4	0.7	3.0
10 月	1.5	0.8	2.6
11 月	1.5	0.9	2.5
12 月	1.8	1.3	3.0
2017 年			
1 月	2.3	1.7	3.3
2 月	2.4	1.8	3.7
3 月	2.4	1.8	4.0
4 月	2.3	1.9	3.9
5 月	2.1	1.6	3.7
6 月	1.8	1.2	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 PMI	产出指数	新订单指数
2016 年						
5 月	1.8	−0.1	4.3	50.1	50.1	50.4
6 月	1.8	0.0	4.6	50.4	50.5	50.8
7 月	1.8	−0.1	4.1	51.0	52.1	51.5
8 月	2.4	0.9	4.3	50.7	52.0	51.1
9 月	2.4	0.6	3.9	51.0	52.0	51.4
10 月	1.8	0.4	4.3	51.9	53.5	52.8
11 月	3.0	2.0	4.8	52.0	53.3	53.0
12 月	3.6	2.7	4.9	52.7	53.9	53.7
2017 年						
1 月	3.6	1.2	5.3	52.7	53.6	54.0
2 月	3.6	2.4	4.9	52.9	54.1	54.1
3 月	4.2	2.6	5.7	53.0	54.2	54.2
4 月	4.2	2.8	5.1	52.7	53.6	53.6
5 月				52.6	53.5	53.6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6	3.2	1.8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6	2.7	0.8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4	4.3	−1.7
3 季度	3.5	3.0	0.8
4 季度	2.1	3.5	0.2
2017 年			
1 季度	1.4	1.1	−0.9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4.0	0.1	4.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0.7	0.4	1.2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1.1	1.8	0.2
3 季度	0.1	10.0	2.2
4 季度	2.9	−4.5	9.0
2017 年			
1 季度	11.0	7.0	4.0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6	3.2	1.8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6	2.7	0.8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3	2.7	0.7
3 季度	1.7	2.8	0.4
4 季度	2.0	3.1	0.2
2017 年			
1 季度	2.1	3.0	−0.4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4.0	0.1	4.6
	2 季度	4.2	0.8	4.5
	3 季度	3.8	-0.4	5.1
	4 季度	3.4	-2.2	2.5
2016 年		0.7	0.4	1.2
	1 季度	2.2	-0.9	1.0
	2 季度	0.8	-1.1	0.3
	3 季度	-0.5	2.0	0.6
	4 季度	0.2	1.5	2.6
2017 年				
	1 季度	3.1	3.4	3.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6 年					
	5 月			4.7	4.3
	6 月	-0.1	-0.3	4.9	29.7
	7 月			4.9	29.1
	8 月			4.9	17.6
	9 月	3.3	0.1	5.0	24.9
	10 月			4.9	12.4
	11 月			4.6	16.4
	12 月	1.8	1.1	4.7	15.5
2017 年					
	1 月			4.8	21.6
	2 月			4.7	23.2
	3 月	-0.6	1.1	4.5	5.0
	4 月			4.4	17.4
	5 月			4.3	13.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6 年	22121		-2.2	27126		-1.8	-5006
4 月	1816	1.7	-5.3	2201	2.0	-5.4	-385
5 月	1813	-0.2	-4.8	2235	1.5	-3.1	-422
6 月	1827	0.8	-4.0	2278	1.9	-2.4	-451
7 月	1864	2.0	-1.9	2261	-0.7	-1.7	-397
8 月	1883	1.0	0.9	2288	1.2	-1.0	-405
9 月	1902	1.0	1.4	2262	-1.1	-1.0	-360
10 月	1864	-2.0	0.4	2290	1.2	0.8	-426
11 月	1860	-0.2	1.3	2315	1.1	3.0	-455
12 月	1910	2.7	4.3	2353	1.6	4.8	-443
2017 年							
1 月	1915	1.1	7.2	2403	2.6	8.2	-488
2 月	1917	0.1	6.0	2366	-1.5	4.6	-449
3 月	1915	-0.1	6.4	2367	0.1	9.0	-453
4 月	1910	-0.3	5.0	2386	0.8	8.3	-47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4658	2626	2032
	2 季度	986	703	284
	3 季度	574	485	89
	4 季度	636	589	47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 季度	1414	777	637
	2 季度	1617	762	855
	3 季度	1091	889	203
	4 季度	448	379	69
2017 年				
	1 季度	790	1117	-32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2 季度	0.4	0.5	0.3
3 季度	0.3	0.4	0.5
4 季度	0.5	0.4	0.5
2016 年	1.7	2.0	1.8
1 季度	0.5	0.7	0.7
2 季度	0.3	0.3	0.3
3 季度	0.4	0.3	0.1
4 季度	0.4	0.4	0.4
2017 年			
1 季度	0.6	0.3	0.4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5	6.5
2 季度	0.0	1.2	0.8
3 季度	1.2	0.2	1.2
4 季度	0.8	0.8	1.5
2016 年	3.5	3.0	4.1
1 季度	0.5	0.4	0.0
2 季度	1.2	1.2	1.6
3 季度	0.0	0.4	0.3
4 季度	3.4	1.7	3.8
2017 年			
1 季度	1.3	1.2	1.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6 年		0.4	43.8	10.0
4 月				10.2
5 月				10.2
6 月	0.0	0.9	55.6	10.1
7 月				10.0
8 月				9.9
9 月	0.1	0.3	46.6	9.9
10 月				9.8
11 月				9.7
12 月	0.2	0.1	55.5	9.6
2017 年				
1 月				9.5
2 月				9.4
3 月	0.1	1.1	66.0	9.4
4 月				9.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2 季度	2.0	1.8	1.3
3 季度	1.9	1.9	1.3
4 季度	2.0	1.7	1.7
2016 年	1.7	2.0	1.8
1 季度	1.7	2.0	2.0
2 季度	1.6	2.0	2.0
3 季度	1.8	1.9	1.7
4 季度	1.8	2.0	1.4
2017 年			
1 季度	1.9	1.6	1.0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5	6.5
2 季度	2.9	7.3	6.4
3 季度	3.0	5.8	6.0
4 季度	3.8	5.0	6.1
2016 年	3.5	3.0	4.1
1 季度	2.5	2.5	3.4
2 季度	3.7	2.7	4.2
3 季度	2.5	2.8	3.2
4 季度	5.1	3.8	5.7
2017 年			
1 季度	6.0	4.6	7.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6 年	20477		0.2	17758		-1.3	2719
4 月	1725	1.3	-0.7	1459	0.7	-4.9	266
5 月	1679	-0.9	2.3	1444	-1.2	-1.2	235
6 月	1802	-0.2	-1.4	1512	1.7	-4.0	290
7 月	1678	-0.5	-9.3	1429	1.1	-7.7	249
8 月	1606	3.0	8.6	1433	0.9	4.6	174
9 月	1771	-1.0	2.2	1527	-0.7	-1.1	244
10 月	1726	0.1	-4.5	1532	2.1	-2.8	194
11 月	1834	3.2	5.5	1595	2.3	5.7	240
12 月	1791	1.9	6.1	1512	1.2	4.7	279
2017 年							
1 月	1632	-1.0	12.5	1644	3.9	17.4	-12
2 月	1713	0.8	5.0	1547	-1.1	6.7	166
3 月	2049	2.2	14.4	1750	0.1	16.0	299
4 月	1677	-2.1	-2.8	1498	-0.8	2.7	17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562	4143	－3581
4 月	389	446	－57
5 月	459	559	－100
6 月	－133	－109	－24
7 月	－35	158	－193
8 月	141	606	－465
9 月	－519	－55	－464
10 月	246	959	－713
11 月	223	516	－293
12 月	－451	73	－524
2017 年			
1 月	913	1082	－169
2 月	949	951	－2
3 月	106	228	－122
4 月	38	279	－241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0.4	1.7
2 季度	－0.1	－0.4	0.1
3 季度	0.2	0.5	0.4
4 季度	－0.2	－0.6	0.7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6	0.3	1.4
2 季度	0.4	0.2	－1.2
3 季度	0.3	0.4	0.2
4 季度	0.3	0.0	0.0
2017 年			
1 季度	0.3	0.3	0.0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2.9	0.8
2 季度	－0.5	－4.0	－2.7
3 季度	0.3	2.2	2.5
4 季度	－0.4	－0.2	－0.3
2016 年	0.9	1.2	－2.3
1 季度	0.0	0.5	－2.0
2 季度	1.4	－1.4	－1.1
3 季度	0.0	1.9	－0.2
4 季度	0.7	3.4	1.3
2017 年			
1 季度	0.4	2.1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0.4	1.7
2 季度	1.7	1.0	1.7
3 季度	2.0	1.2	1.6
4 季度	0.9	－0.1	2.2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5	－0.1	2.7
2 季度	0.9	0.3	1.2
3 季度	1.1	0.3	1.0
4 季度	1.6	0.9	0.4
2017 年			
1 季度	1.3	0.9	－0.9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2.9	0.8
2 季度	0.9	2.0	0.9
3 季度	1.4	2.9	1.8
4 季度	0.1	－0.5	0.6
2016 年	0.9	1.2	－2.3
1 季度	－0.7	－1.4	－2.4
2 季度	1.6	0.7	－1.1
3 季度	1.1	0.8	－3.6
4 季度	2.0	4.6	－2.0
2017 年			
1 季度	2.2	6.0	1.3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6 年	－0.4	2.06	3.1
5 月	0.8	2.06	3.2
6 月	－2.3	2.03	3.1
7 月	－2.7	2.03	3.0
8 月	5.2	2.07	3.1
9 月	0.4	2.10	3.0
10 月	－2.3	2.11	3.0
11 月	4.3	2.15	3.1
12 月	1.3	2.19	3.1
2017 年			
1 月	3.9	2.13	3.0
2 月	3.4	2.12	2.8
3 月	4.7	2.13	2.8
4 月		2.13	2.8
5 月		2.13	3.1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6 年	700358		-7.4	660420		-15.8	39938
5 月	50919	-1.6	-11.3	51393	2.0	-13.7	-473
6 月	60253	2.0	-7.4	53389	0.6	-18.7	6865
7 月	57284	-1.7	-14.0	52239	-0.6	-24.6	5045
8 月	53164	0.3	-9.6	53510	-0.7	-17.0	-346
9 月	59689	0.7	-6.9	54824	2.1	-16.1	4866
10 月	58702	1.8	-10.3	53891	-0.1	-16.3	
11 月	59564	3.7	-0.4	58099	4.3	-8.7	1465
12 月	66789	2.1	5.4	60430	3.2	-2.5	
2017 年							
1 月	54220	0.8	1.3	65139	3.8	8.4	-10919
2 月	63475	6.5	11.3	55364	-1.2	1.3	8111
3 月	72296	-4.0	12.0	66193	3.5	15.9	6103
4 月	63294	-0.3	7.4	58503	-0.6	15.2	4792
5 月	58512	0.0	14.9	60554	0.3	17.8	-2042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154423	38307	183930
4 月	-1148	7345	-8493
5 月	3783	9166	-5383
6 月	12607	17259	-4652
7 月	18142	22909	-4767
8 月	-12931	-14142	1211
9 月	-462	44740	45202
10 月	-68	15478	-15546
11 月	5688	12014	-6236
12 月	654	21720	-21066
2017 年			
1 月	-36	11074	-11110
2 月	2166	23521	-21355
3 月	1735	25963	-24228
4 月	3171	7829	-4658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5 年	0.9	2.2	1.3	-3.8	7.7	-2.1
2 季度	0.7	2.4	1.3	-2.9	7.6	-4.5
3 季度	0.8	1.8	0.9	-4.5	8.4	-3.7
4 季度	0.4	1.7	0.6	-5.8	7.4	-3.8
2016 年	1.5	1.8	0.3	-3.6	7.9	-0.2
1 季度	1.3	1.6	-0.6	-5.4	9.2	-0.4
2 季度	1.1	1.7	0.3	-3.6	7.9	-0.5
3 季度	1.5	2.0	0.7	-2.9	7.5	-0.4
4 季度	2.0	1.9	0.7	-2.5	7.0	0.3
2017 年						
1 季度	2.3	2.0	1.0	-0.4	6.1	0.5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2.8	2.6	2.4	0.8	5.0	4.9
2 季度	2.2	2.5	3.1	0.7	4.9	4.7
3 季度	3.0	2.8	2.3	-0.7	4.7	4.8
4 季度	3.3	2.5	1.9	-0.8	4.6	5.2
2016 年	2.8	2.3	1.9	1.5	4.2	5.0
1 季度	2.9	2.2	1.0	-0.2	4.1	4.9
2 季度	3.4	2.6	1.8	1.1	4.0	5.2
3 季度	2.6	2.0	2.0	2.1	4.3	5.0
4 季度	2.4	2.3	3.2	2.9	4.5	4.9
2017 年						
1 季度	3.0	2.8	4.3	2.6	5.6	5.0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6 年	7.0	4.9	11.3	5.5	26.7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4.8	11.8	5.4	
11 月	6.8	4.8	11.9	5.4	
12 月	6.9	4.8	12.0	5.3	26.5
2017 年					
1 月	6.8	4.7	12.6	5.6	
2 月	6.6	4.7	13.2	5.6	
3 月	6.7	4.6	13.7	5.4	27.7
4 月	6.5	4.6	13.6	5.3	
5 月	6.6			5.2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6 年	3.7	3.9	3.7	3.9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7	3.4	3.9	3.5
11 月	3.6	3.5	3.3	3.8	3.4
12 月	3.5	3.4	3.3	3.8	3.5
2017 年					
1 月	3.6	3.6	3.3	3.8	3.5
2 月	4.0	3.4	3.3	3.8	3.5
3 月	3.7	3.2	3.2	3.8	3.4
4 月	4.0	3.5	3.2	3.8	3.4
5 月	3.6	3.6	3.2	3.8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3902	4030	-128	4092	6368	-2276
4 月	312.9	343.7	-30.8	352.3	580.6	-228.3
5 月	315.2	344.6	-29.4	340.5	526.1	-185.6
6 月	331.8	359.6	-27.8	350.3	572.1	-221.8
7 月	302.8	322.5	-19.7	313.7	524.1	-210.3
8 月	337.3	357.4	-20.1	308.0	544.7	-236.7
9 月	339.4	364.0	-24.6	334.2	601.4	-267.2
10 月	337.6	339.7	-2.2	330.2	489.8	-159.5
11 月	348.0	332.5	15.5	360.3	534.2	-173.9
12 月	339.5	315.0	24.5	391.6	477.2	-85.6
2017 年						
1 月	339.5	317.1	14.9	349.6	473.5	-123.9
2 月	323.1	324.6	-1.4	337.7	478.5	-140.9
3 月	370.9	371.8	-0.9	387.7	561.3	-173.6
4 月	337.1	345.4	-8.3	335.5	486.0	-150.5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751	750	1	1853	1435	418
5 月	64.6	56.0	8.5	175.7	115.9	59.8
6 月	67.0	61.4	5.6	167.4	133.3	34.2
7 月	62.9	62.6	0.3	163.3	122.5	40.8
8 月	65.2	71.7	-6.5	169.9	134.1	35.8
9 月	70.7	65.8	4.9	158.0	125.2	32.8
10 月	63.5	65.9	-2.4	137.2	118.7	18.5
11 月	71.3	72.4	-1.1	165.2	113.8	51.5
12 月	67.6	58.7	8.9	159.4	115.3	44.2
2017 年						
1 月	59.3	67.5	-8.2	149.1	121.9	27.2
2 月	65.7	62.2	3.5	154.7	109.1	45.6
3 月	78.1	69.4	8.7	200.9	129.4	71.5
4 月	67.9	64.2	3.8	176.9	107.2	69.7
5 月				197.9	121.3	76.6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2642	3596	-954	2818	1914	904
5 月	223.6	283.3	-59.7	220.3	144.8	75.5
6 月	227.7	310.5	-82.9	240.2	160.1	80.2
7 月	216.5	295.0	-78.4	224.6	161.3	63.4
8 月	215.8	291.6	-75.8	232.0	184.5	47.5
9 月	228.8	319.9	-91.1	254.3	179.9	74.4
10 月	234.2	338.1	-103.8	249.0	183.0	66.0
11 月	200.8	327.4	-126.6	266.5	175.1	91.4
12 月	239.6	342.2	-102.5	311.3	192.9	118.3
2017 年						
1 月	222.9	319.2	-96.4	251.2	136.8	114.4
2 月	255.4	332.3	-76.9	257.5	155.8	101.7
3 月	291.5	396.7	-105.2	313.3	187.3	126.0
4 月	246.4	378.8	-132.5	261.0	180.9	80.0
5 月	240.2	378.6	-138.4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4954	4062	892	3739	3974	-131
5 月	397.3	330.3	67.1	314.1	318.5	-4.4
6 月	452.1	338.9	113.2	319.5	324.7	-5.2
7 月	408.8	333.7	75.1	297.7	316.0	-18.3
8 月	401.3	351.0	50.2	324.5	343.3	-18.8
9 月	408.5	339.9	68.6	327.0	342.3	-15.3
10 月	419.8	350.5	69.3	326.0	334.9	-9.0
11 月	453.1	372.4	80.7	343.4	342.7	0.7
12 月	450.7	383.0	67.7	331.9	332.0	-0.1
2017 年						
1 月	402.8	375.2	27.6	273.2	307.9	-34.7
2 月	431.8	361.5	70.3	313.4	305.9	7.6
3 月	486.5	425.8	60.7	360.5	361.1	-0.6
4 月	508.7	380.0	128.7	317.5	308.7	8.8
5 月	450.3	393.5	56.8	354.7	365.5	-10.8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5167	5473	-306	2804	2309	495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6 月	433.9	470.5	-36.6	228.7	193.0	35.7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7	39.8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9	43.7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4	223.6	43.8
11 月	494.4	513.7	-19.3	253.3	210.2	43.1
12 月	476.3	542.1	-65.8	257.0	208.3	48.6
2017 年						
1 月	405.3	421.9	-16.6	237.4	202.5	35.0
2 月	355.5	403.9	-48.4	226.7	193.0	33.7
3 月	485.2	506.1	-20.9	257.1	217.8	39.3
4 月	447.8	456.7	-8.9	243.2	215.3	27.8
5 月				255.2	220.7	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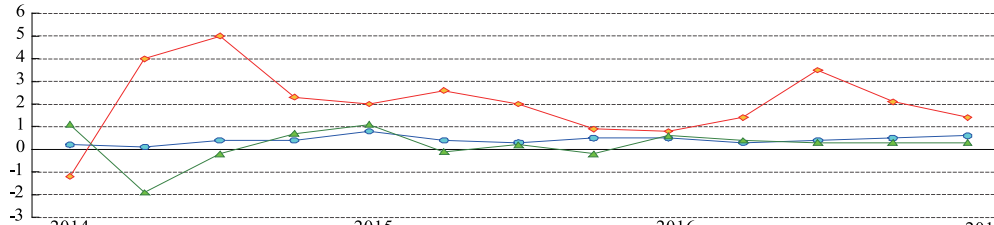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1894	1684	210	1445	1357	88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7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165.6	147.2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168.0	147.2	20.8	135.0	126.7	8.3
12 月	169.4	149.8	19.6	138.3	127.8	10.5
2017 年						
1 月	157.6	146.9	10.6	134.0	119.7	14.3
2 月	161.5	141.8	19.6	126.1	113.5	12.6
3 月	186.1	174.0	12.2	146.8	132.8	14.0
4 月	167.8	148.0	19.9	132.8	119.5	13.3
5 月				142.9	138.2	4.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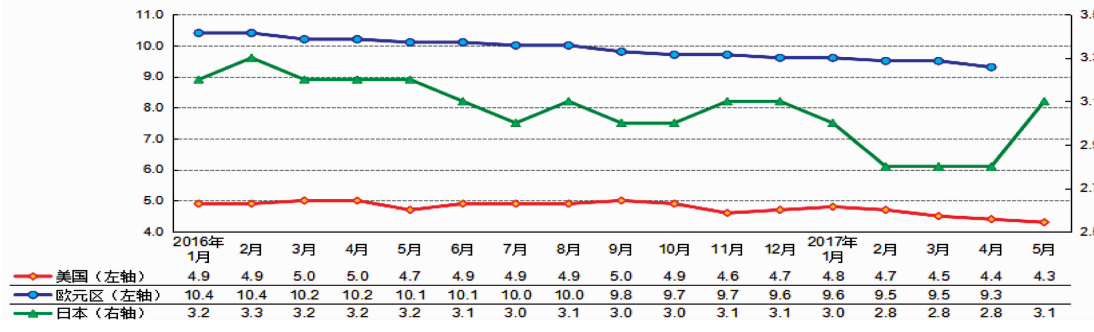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2014年Q1	Q2	Q3	Q4	2015年Q1	Q2	Q3	Q4	2016年Q1	Q2	Q3	Q4	2017年Q1
美国	-1.2	4.0	5.0	2.3	2.0	2.6	2.0	0.9	0.8	1.4	3.5	2.1	1.4
欧元区	0.2	0.1	0.4	0.4	0.8	0.4	0.3	0.5	0.5	0.3	0.4	0.5	0.6
日本	1.1	-1.9	-0.2	0.7	1.1	-0.1	0.2	-0.2	0.6	0.4	0.3	0.3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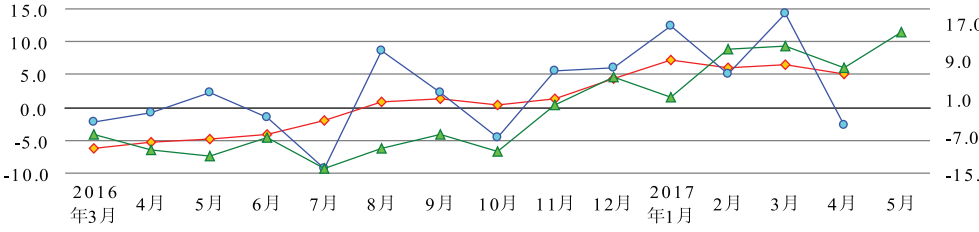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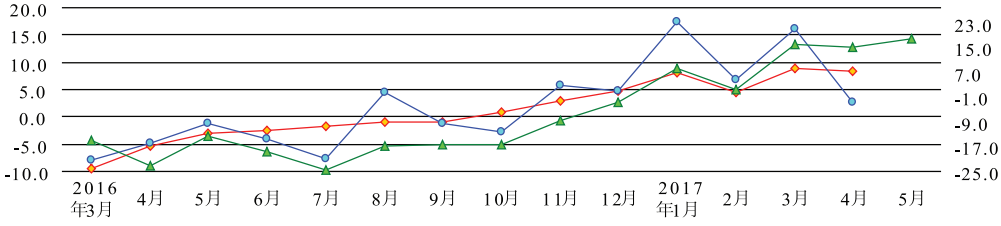
	2016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7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美国（左轴）	4.9	4.9	5.0	5.0	4.7	4.9	4.9	4.9	5.0	4.9	4.6	4.7	4.8	4.7	4.5	4.4	4.3
欧元区（左轴）	10.4	10.4	10.2	10.2	10.1	10.1	10.0	10.0	9.8	9.7	9.7	9.6	9.6	9.5	9.5	9.3	
日本（右轴）	3.2	3.3	3.2	3.2	3.2	3.1	3.0	3.1	3.0	3.0	3.1	3.1	3.0	2.8	2.8	2.8	3.1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2016年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7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美国（左轴）	-6.3	-5.3	-4.8	-4	-1.9	0.9	1.4	0.4	1.3	4.3	7.2	6	6.4	5	
欧元区（左轴）	-2.1	-0.7	2.3	-1.4	-9.3	8.6	2.2	-4.5	5.5	6.1	12.5	5	14.4	-2.8	
日本（右轴）	-6.8	-10.1	-11.3	-7.4	-14	-9.6	-6.9	-10.3	-0.4	5.4	1.3	11.3	12	7.4	14.9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2016年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7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美国（左轴）	-9.6	-5.4	-3.1	-2.4	-1.7	-1	-1	0.8	3	4.8	8.2	4.6	9	8.3	
欧元区（左轴）	-7.9	-4.9	-1.2	-4	-7.7	4.6	-1.1	-2.8	5.7	4.7	17.4	6.7	16	2.7	
日本（右轴）	-14.9	-23.3	-13.7	-18.7	-24.6	-17	-16.1	-16.3	-8.7	-2.5	8.4	1.3	15.9	15.2	17.8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Globalization

Monthly

No. 7

July 2016

ABSTRACTS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reates a win－win new realm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sk group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enter

The "Belt and Road" infuses new impetus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s the grand and wonderful practice that strives to establish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to promote common interests symbiosis, emotional resonance, value consensus,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win－win development. By creating cros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more closely, in the next 10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will create a global trade channels and the core hub that create huge investment demand, contribute to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2030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able the transfer ofthe "Belt and Road" center from the consensu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ound, promote the connectivity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between strategy and planning,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network,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jointly build the trading systemalong the line, and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think－tanks, aiming to harvest early results.

(2) "Two legs and one lap": Xi Jinping's new strategy for great powers

Zheng Yongnian

In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formed the strategy of "two legs andone circle", with the first leg beingthe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the second leg being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one circle for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new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is the Sino US relations, which will affe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resident Trump's ruling represents good "uncertainty" for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s fundamentall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will affect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for China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whereChina has mastered the initiative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needs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China have enough method to tackle the issue of Taiwan,, if improper handling the problem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ill become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China.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 "free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eal well with the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emancipate the mind, actively strive for the status of big powers and do a good job for a new type of power.

(3)To memorize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Li Xiaoxi and Lin Yongsheng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from the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s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the role of the market, Chinese marketization reform,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market economy,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actively integrates into globalization. China is an on - going market economy, demonstratedmainly in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that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emphasizes the us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China's continuously promotion of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the thirdis the gradually improv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marketization; the fourth is that China integrates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more and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4)The layout and policy trends of the US Internet industry

Li Li and Li Yongjian

As a strategic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has strong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arries out a large number of layout 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the release of national policy in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fields,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technical standards in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the Internet of energyand other aspects, to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smart city, networking and other Internet related field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set up a policy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which has a goo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5)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ing support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Zhang Jidong

During th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need efficient, convenient, stable, sustainable, diversified and a full ran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At present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lagging or insufficient in developing overseas layout, optimizing product structure,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ability. Based on traditional financing suppor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epen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form the joint financing support,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ng produc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redit services, establish the long - term coopera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system, and

provide long－term, stable, and sustainable financing support for the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risk control.

(6)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and the judgment of reformdirection

Liu Xiangdo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middle－high growth stage and a critical period of cross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China economy has many irreconcilabl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ncreasingly showing the irreversibl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lying more on domestic demand especially the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structurally transforming to more modern dominant service industry, emphasizingmore on the role of innovation－driven on economic growth. To adapt to and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eform trend is to emphasize more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create a market－oriented policy environment,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lac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t the center, and steadi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7)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Lu Xinsheng, Li Xiaotong and Zhang Wenqiang

As a typical financial derivative, stock index futur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llocating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Chinese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started late,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ket is not sufficient. In order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based on goods trade frequency data of yields 500 and SSE 50 index of every 5 minutes, between 14:00 16 April 2015 to 14:00 16 June 2015, by using unit root test, (G) ARCH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weak for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basic suggestions: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epen the market reform to clarify property rights; (2) investors should b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3) stock index futures categories should be enriched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threshold should be lowered; (4) the supervision of listed companie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Editor: Huang Yongfu